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 中德俄英多语种珍藏版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恩格斯
著



以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权威译文为基础



收录《共产党宣言》传播史上
最具代表性的

德文本
(1848)
影印本

俄文本
(1882)
影印本

英文本
(1888)
影印本

中文本
(1920)
影印本



附赠

马克思家庭的《自白》游戏卡片
《共产党宣言》主题纪念卡片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璇
责任编辑
王琳
执行编辑
闻睿
书籍设计
左左工作室

ISBN 978-7-5117-3055-8



9 787511 730558 >

定价：298.00 元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 中德俄英多语种珍藏版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恩格斯 著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一译
列 宁 斯大林

MARX & ENGEL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产党宣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多语种珍藏版 / (德) 马克思, (德) 恩格斯著 ;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117-3055-8

I. ① 共…

II. ① 马… ② 恩… ③ 中…

III. ① 《共产党宣言》

IV. ① A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1333 号

共产党宣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多语种珍藏版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王 琳

执行编辑：闻 睿

责任校对：闻 睿 景淑娥 王 晶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环球画印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8.75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奕赵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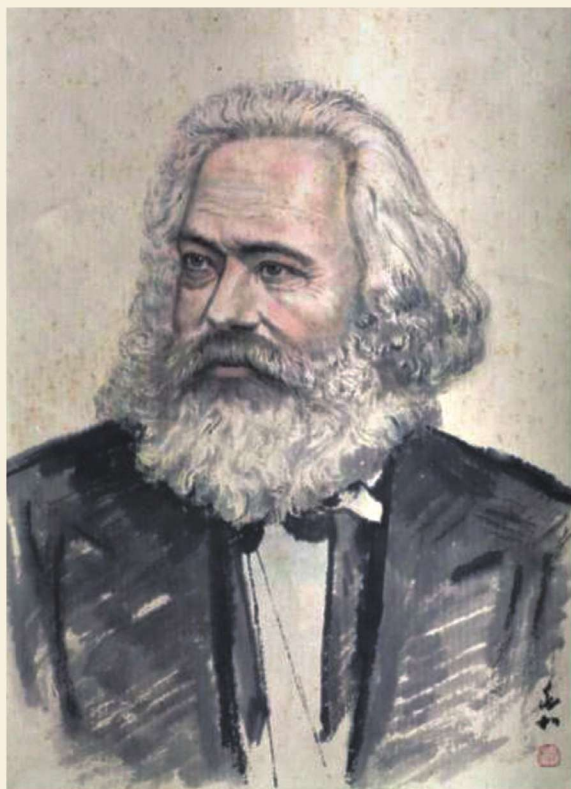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



马克思画像
蒋兆和 1954 年作

Karl Marx

马克思签名



恩格斯画像
蒋兆和 1954 年作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written in a dark brown or gold color on a light beige background. The signature is highly stylized and fluid, starting with a large, sweeping initial 'F' and ending with a long, horizontal flourish that curves downwards at the end.

恩格斯签名

Handwritten manuscript in German, likely related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text is dense and written in cursive. At the top, there is a date: "10. November 1848". A stamp with the initials "S/G" is visible. The handwriting is in dark ink on aged paper. At the bottom, there is a printed or typed line: "Karl Marx: Entwurf z. Communist. Manifesto".

马克思手迹

《共产党宣言》手稿的一页，头两行为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手迹



目 录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872 年德文版序言	· 003
1882 年俄文版序言	· 007
1883 年德文版序言	· 011
1888 年英文版序言	· 013
1890 年德文版序言	· 021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	· 029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 033
共产党宣言	· 037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 038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 051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 062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 062
(甲) 封建的社会主义	• 062
(乙)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064
(丙)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 066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069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071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 074
注释	• 077



1848 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	• 099
------------------	-------



1882 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	• 125
------------------	-------



1888 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 187
------------------	-------



1920 年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 219
------------------	-------



世界各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封面精选	• 277
--------------------	-------



出版后记	• 284
------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¹



1872 年 德文版序言²



共产主义者同盟³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⁴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12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⁵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现在有人在

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 60 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 25 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⁶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 19 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 1847 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 1847 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

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
年6月24日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文
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18卷翻译



1882 年 俄文版序言⁷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①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②中

① 应是1869年。——编者注

② 《宣言》最后一章的标题应是《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编者注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⁸，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①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

^①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1月21日

载于1882年2月5日《民意》杂志第8—9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1883 年

德文版序言⁹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本身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6月2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①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转载该序言时在此处加了一个注：“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编者注

1888 年

英文版序言¹⁰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³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 1848 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 年 11 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 1848 年 1 月用德文写成，并在 2 月 24 日的法国革命⁴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 1848 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 1850 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还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

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 18 个月监禁之后于 1852 年 10 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¹¹ 从 10 月 4 日一直继续到 11 月 12 日；被捕者中有七人被判处三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时，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¹²。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¹³，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¹⁴ 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15} 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

① 派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 1862—1864 年期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¹⁶的确，《宣言》的原则在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①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出版；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¹⁷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¹⁸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¹⁹。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²⁰至于德文的

① 应是1869年。——编者注

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 12 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 1847 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²¹和法国的傅立叶派²²，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²³，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²⁴。可见，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²⁵，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

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问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 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

① 《1844 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8 年纽约—伦敦拉弗尔出版社版，威·里夫斯发行。

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 1872 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述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 1848 年以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⁶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伦敦 1871 年特鲁拉夫版第 15 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 1847 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

生翻译的。我们共同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8年1月30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
《共产党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并参
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第21卷翻译



1890 年

德文版序言²⁶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①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¹⁷，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²⁷，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① 指 1883 年德文版序言，见本书第 11—12 页。——编者注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①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⁸，而俄

^① 应是1869年。——编者注

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①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②。

①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随后又于 1885 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 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¹⁹。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²⁰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 8 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 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 1888 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1888 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 185 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

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它就被那随着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失败⁵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 1852 年 11 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¹¹，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⁴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¹²。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¹³，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¹⁴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15}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 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 1864 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

① 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国家帮助派和自助派。

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 1887 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代表大会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¹⁶ 而在 1887 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1848 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 1847 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²¹ 和法国的傅立叶派²²，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²³，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²⁴。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²⁵，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 42 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 年 9 月 28 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 1889 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²⁸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 年 5 月 1 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 1890 年 5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90 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
《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 22 卷翻译



1892 年

波兰文版序言²⁹



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①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

①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因此，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10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³⁰，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的大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

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2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
第3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22卷翻译



1893 年

意大利文版序言³¹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 1848 年 3 月 18 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³²，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 年 3 月 18 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 1848—1871 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

克思所说，那些镇压 1848 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³³。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立，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 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 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 45 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 1848 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 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 45 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

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 1300 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 年 2 月 1 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 1893 年 2 月 1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93 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22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0 年法文版第 1 卷翻译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

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①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③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① 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 1847 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民族的真实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中加以探讨。”——编者注

③ 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编者注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①。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②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③，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④；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⑤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

① “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作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编者注

③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

④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⑤ “等级君主国”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国”。——编者注

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³⁴和十字军征讨³⁵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

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① “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

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

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³⁶，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①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

① “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编者注

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

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①；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②；他们联合起

① 这句话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

②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

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³⁷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① “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编者注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

①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编者注

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

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①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②；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① “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

② “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①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

①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

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

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者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①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编者注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惟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

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

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①，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① “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①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

^① “信仰领域”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知识领域”。——编者注

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①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①逐步消灭^②。
10.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③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

① “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编者注

③ “联合起来的个人”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①，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³⁸和英国的改革运动³⁹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

① “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①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⁴⁰和“青年英国”⁴¹，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

① 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指的不是 1660—1689 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 1814—1830 年法国的复辟时期。”——编者注

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屈尊拾取金苹果^①，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②。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

① “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编者注

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

时又是空想的。

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①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

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

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齷齪的、令人萎靡的文献。^①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① 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1848 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能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真实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① 指《共产党宣言》第1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编者注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①

① 这段话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①、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②即袖珍版

① “城乡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编者注

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派²¹反对宪章派⁴²，在法国，有傅立叶派²²反对改革派⁴³。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⁴⁴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①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

①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

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⁴⁵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 17 世纪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编者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
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
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
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
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底

原文是德文

1848 年 2 月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
出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第 4 卷翻译

注释



1 《共产党宣言》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科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宣言》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见本书第 53 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本书第 60 页）《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本书第 62 页）《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见本书第 52 页）《宣言》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些流派的界限，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宣言》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第 50 页）“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者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

中文第 2 版第 2 卷第 8 页)

1847 年 11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会经过辩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底用德文写成了《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2 月底，《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宣言》一问世便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在 1848 年的各个版本中作者没有署名。1850 年英国宪章派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登载《宣言》的英译文时，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1872 年《宣言》出版了新的德文版。这一版以及后来出版的 1883 年和 1890 年德文版，书名改用《共产主义宣言》。

《共产党宣言》曾有多种中译本。《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 年 8 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30 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了华岗翻译的中译本；1938 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成仿吾、徐冰翻译的中译本；1943 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博古校译的中译本；1949 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版的中译本；197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仿吾的中译本。—— 1。

2 《1872 年德文版序言》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合写的第一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见本书第 4 页）。他们还谈到，由于情况的变化，

由于有了法国二月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考虑到《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对内容未作修改。

《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由《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这一版只对个别用词作了改动。——3。

3 共产主义者同盟

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下旬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3、13。

4 二月革命

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

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 3、25。

5 1848 年六月起义

指 1848 年 6 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 月 22 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 月 23—26 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 月 25 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398 页）—— 3、25。

6 巴黎公社

是 1871 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无产者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28 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废除官僚制度代之以民主选举产生的、对选民负责的、受群众监督的公职人员。公社没收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并颁布一系列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令。5 月 28 日，巴黎公社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打击下遭到失败，总共只存在了 72 天。—— 18。

7 《1882年俄文版序言》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俄译本合写的序言。该译本由格·普列汉诺夫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强调：“《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见本书第8页）他们通过对俄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分析，论证了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无产阶级运动不断扩大的趋势，指出俄国已经从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变成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并对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前途提出这样的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见本书第9页）

这篇序言最初于1882年2月5日在俄国民意党人的《民意》杂志第8—9期用俄译文发表。附有这篇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单行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之一出版。1882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准备发表这篇序言，因找不到德文原稿，只好请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将俄译文再转译成德文，于1882年4月13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全文引用了他本人由俄文转译成德文的这篇序言，个别地方与德文原稿略有差别。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篇序言的德文手稿才被重新发现。193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首次按德文原文发表了这篇序言。——7。

8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因害怕民意党人采取新的恐怖行动，终日藏匿在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

纳行宫内，因而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加特契纳的俘虏”。—— 8、22。

9 《1883年德文版序言》

是恩格斯为 1883 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三个德文版写的序言，该版本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第一个德文本。序言明确表述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见本书第 11—12 页）恩格斯的这一表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11。

10 《1888年英文版序言》

是恩格斯为 1888 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由赛·穆尔翻译，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了一些注释。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指出：“《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见本书第 16 页）恩格斯重申了 1883 年德文版序言所表述的《宣言》的基本思想，并强调“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见

本书第 17 页)。他还引录了 1872 年德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 13。

11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 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11 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讯, 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 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 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 14、25。

12 国际工人协会

简称国际, 后通称第一国际, 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建, 是它的实际领袖, 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 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流派, 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1876 年 7 月 15 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 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

中文第 2 版第 36 卷第 290 页)。—— 14、25。

13 英国工联

即英国工会。1824 年英国工人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工联遂在英国普遍建立起来。工联是按行业组织的，加入工联的人必须是满师的技术工人，须缴纳很高的会费；工联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工联的任务是维护本行业熟练工人的经济利益。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许多工联组织曾经加入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同工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即工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4、25。

14 蒲鲁东派

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信徒。蒲鲁东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对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4、25。

15 拉萨尔派

是 19 世纪 60—70 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冯·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 1863 年 5 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

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75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4、25。

16

1887年9月5—12日在英国斯旺西举行了工联年度代表大会，即斯旺西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单独的工人政党等项决议。恩格斯提到的这句话引自斯旺西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在大会上的发言，比万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这篇发言载于1887年9月17日伦敦《公益》周刊。——15、26。

17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文本的译者不是维·查苏利奇，而是格·瓦·普列汉诺夫。恩格斯于1894年曾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9页）。——15、21。

18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丹麦文译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删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因而不够完备；有些译文也不太确切。恩格斯在《宣

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点（见本书第21页）。——15。

19

劳·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刊登在1885年8月29日—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1886年在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15、24。

20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过单行本。——15、24。

21 欧文派

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拥护者。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社会的一切罪恶。他曾在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移民区，实行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最后宣告失败。欧文反对宪章运动，不主张工人开展政治斗争。认为靠知识的传播可以消除社会弊病，解决社会矛盾，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16、26、74。

22 傅立叶派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拥护者。傅立叶认为，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与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动的场所称做法伦斯泰尔

(Phalanstere)。傅立叶派在法国和美国都曾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这些实验均以失败告终。—— 16、26、74。

23

埃·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类最严重的错误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宣传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卡贝在 1840 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 16、26。

24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 1842 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 16、26。

25

关于“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一思想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226 页）—— 16、26。

26 《1890年德文版序言》

是恩格斯为1890年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之一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是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宣言》第四个德文本。它除了发表恩格斯的新序言外，还收入了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也摘要刊登了这篇新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再次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不仅全文引录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而且援引了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21。

27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序言是他亲自从俄文翻译成德文的，个别地方同德文原稿有细微差别。参看注9。——21。

28 日内瓦代表大会

是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60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指示》几乎逐点加以反对。经过辩论，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

是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3名代表。大会主席是前巴黎公社委员爱·瓦扬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李卜克内西。这次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27。

29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是恩格斯为1892年由波兰社会党人的《黎明》杂志出版社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见本书第29页）他还指出，波兰的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欧洲其余国家的工人也像波兰工人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和复兴，因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做主的时候才能实现”（见本书第30页）。这篇序言发表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29。

30 会议桌上的波兰

指沙皇俄国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所并吞的波兰领土。维也纳会议后，波兰再度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沙皇俄国吞并了

大部分波兰国土，成立了波兰王国，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王。会议桌上的波兰或俄罗斯的波兰，即指这部分波兰领土。—— 30。

31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是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请求，用法文为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由蓬·贝蒂尼翻译，序言由屠拉梯翻译，于1893年由社会党理论刊物《社会评论》杂志社在米兰出版。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1848年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民族取得统一和独立的进程，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见本书第34页）—— 33。

32

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

同一天，柏林人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迫使国王宣布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撤出城内驻军，改组政府。—— 33。

33

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1859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34。

34 民族大迁徙

指公元3—7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及其他部落向罗马帝国的大规模迁徙。4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因遭到匈奴人的进攻侵入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西哥特人于5世纪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也相继在欧洲和北非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民族大迁徙对摧毁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和推动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41。

35 十字军征讨

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1。

3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曾经使用“出卖劳动”、“劳动价格”这些概念。马克思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工人出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08—709页）。——45。

37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14—330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48。

38 七月革命

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

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62。

39 改革运动

指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议会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同土地贵族争夺政治权力，在19世纪20年代末提出了改革议会选举制度的要求，经过几年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英国议会于1832年6月通过了选举法改革法案。这次改革削弱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62。

40 正统派

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63。

41 “青年英国”

是由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及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蛊惑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63。

42 宪章派

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74。

43 改革派

又称《改革报》派，是聚集在法国《改革报》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其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74。

44 北美土地改革派

即全国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

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 74。

45


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在 1846 年 2 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的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 1815 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 2 月 22 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 1846 年 3 月初被镇压。1846 年 11 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 75。



1848 年德文版 《共产党宣言》

正文完成于 1848 年

1872 年在莱比锡正式出版



M a n i f e s 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London.

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von J. E. Burghard.

46, 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

M a n i f e s 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von J. C. Burghard.

46, 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zjagd gegen dies Gespenst verbündet, der Papst und der Czar, Metternich und Guizot, französische Radikale und deutsche Polizisten.

Wo ist die Oppositionspartei, die nicht von ihren regierenden Gegnern als kommunistisch verschrien worden wäre, wo die Oppositionspartei, die den fortgeschritteneren Oppositionsleuten sowohl, wie ihren reaktionären Gegnern den brandmarkenden Vorwurf des Kommunismus nicht zurückgeschleudert hätte?

Zweierlei geht aus dieser Thatsache hervor.

Der Kommunismus wird bereits von allen europäischen Mächten als eine Macht anerkannt.

Es ist hohe Zeit daß die Kommunisten ihre Anschauungsweise, ihre Zwecke, ihre Tendenzen vor der ganzen Welt offen darlegen, und den Mährchen vom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ein Manifest der Partei selbst entgegenstellen.

Zu diesem Zweck haben sich Kommunisten der verschiedensten Nationalität in London versammelt und das folgende Manifest entworfen, das in englischer, französischer, deutscher, italienischer, flämischer und dänischer Sprache veröffentlicht wird.

I.

Bourgeois und Proletarier.

Die Geschichte all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 ist die Geschichte von Klassenkämpfen.

Freier und Sklave, Patrizier und Plebejer, Baron und Leibeigener, Junfbürger und Gesell, kurz, Unterdrücker und Unterdrückte standen in stetem Gegensatz zu einander, führten einen ununterbrochenen, bald versteckten bald offenen Kampf, einen Kampf, der jedesmal mit einer revolutionären Umgestaltung der ganzen Gesellschaft endete, oder mit dem gemeinsamen Untergang der kämpfenden Klassen.

In den früheren Epochen der Geschichte finden wir fast überall eine vollständige Gliederung der Gesellschaft in verschiedene Stände, eine mannichfaltige Abstuf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tellungen. Im alten Rom haben wir Pa-

trizier, Ritter, Mebejer, Sklaven; im Mittelalter Feudalherren, Vasallen, Zunftbürger, Gesellen, Leibeigene, und noch dazu in fast jeder dieser Klassen wieder besondere Abstufungen.

Die aus dem Untergange der feudalen Gesellschaft hervorgegangene 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hat die Klassengegensätze nicht aufgehoben. Sie hat nur neue Klassen, neue Bedingungen der Unterdrückung, neue Gestaltungen des Kampfes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gesetzt.

Unsere Epoche, die Epoche der Bourgeoisie, zeichnet sich jedoch dadurch aus, daß sie die Klassengegensätze vereinfacht hat. Die ganze Gesellschaft spaltet sich mehr und mehr in zwei große feindliche Lager, in zwei große einander direkt gegenüberstehende Klassen—Bourgeoisie und Proletariat.

Aus den Leibeigenen des Mittelalters gingen die Pfahlbürger der ersten Städte hervor; aus dieser Pfahlbürgerschaft entwickelten sich die ersten Elemente der Bourgeoisie.

Die Entdeckung Amerika's, die Umschiffung Afrika's schufen der aufkommenden Bourgeoisie ein neues Terrain. Der ostindische und chinesische Markt, die Kolonisierung von Amerika, der Austausch mit den Kolonien, die Vermehrung der Tauschmittel und der Waaren überhaupt gaben dem Handel, der Schifffahrt, der Industrie einen niegekannten Aufschwung, und damit dem revolutionären Element in der zerfallenden feudalen Gesellschaft eine rasche Entwicklung.

Die bisherige feudale oder zünftige Betriebsweise der Industrie reichte nicht mehr aus für den mit den neuen Märkten anwachsenden Bedarf. Die Manufaktur trat an ihre Stelle. Die Zunftmeister wurden verdrängt durch den industriellen Mittelstand; die Theilung der Arbeit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en Corporationen verschwand vor der Theilung der Arbeit in der einzelnen Werkstatt selbst.

Aber immer wuchsen die Märkte, immer stieg der Bedarf. Auch die Manufaktur reichte nicht mehr aus. Da revolutionirten der Dampf und die Maschinerie die industrielle Produktion. An die Stelle der Manufaktur trat die moderne große Industrie, an die Stelle des industriellen Mittelstandes traten die industriellen Millionäre, die Chefs ganzer industriellen Armeen, die modernen Bourgeois.

Die große Industrie hat den Weltmarkt hergestellt, den die Entdeckung Amerika's vorbereitetete. Der Weltmarkt hat dem Handel, der Schifffahrt, den Landkommunikationen eine unermessliche Entwicklung gegeben. Diese hat wieder auf die Ausdehnung der Industrie zurückgewirkt, und in demselben Maße, worin Industrie, Handel, Schifffahrt, Eisenbahnen sich ausdehnten, in demselben Maße entwickelte sich die Bourgeoisie, vermehrte sie ihre Kapitalien, drängte sie alle vom Mittelalter her überlieferten Klassen in den Hintergrund. Wir sehen also wie die moderne Bourgeoisie selbst das Produkt eines langen Entwicklungsganges, einer Reihe von Umwälzungen in der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weise ist.

Jede dieser Entwicklungsstufen der Bourgeoisie war begleitet von einem entsprechenden politischen Fortschritt. Unterdrückter Stand unter der Herrschaft der Feudalherren, bewaffnete und sich selbst verwaltende Associationen in der Commune, hier unabhängige städtische Republik, dort dritter steuerpflichtiger Stand der Monarchie, dann zur Zeit der Manufaktur Gegengewicht gegen den Adel in der ständischen oder in der absoluten Monarchie und Hauptgrundlage der großen Monarchien überhaupt, erkämpfte sie sich endlich seit der Herstellung der großen Industrie und des Weltmarktes im modernen Repräsentativstaat die ausschließliche politische Herrschaft. Die moderne Staatsgewalt ist nur ein Ausschuß, der die gemeinschaftlichen Geschäfte der ganzen Bourgeois-Klasse verwaltet.

Die Bourgeoisie hat in der Geschichte eine höchst revolutionäre Rolle gespielt. Die Bourgeoisie, wo sie zur Herrschaft gekommen, hat alle feudalen, patriarchalischen, idyllischen Verhältnisse zerstört. Sie hat die buntscheckigen Feudalbande, die den Menschen an seinen natürlichen Vorgesetzten knüpften, unbarbarisch zerrissen, und kein anderes Band zwischen Mensch und Mensch übrig gelassen, als das nackte Interesse, als die gefühllose „baare Zahlung.“ Sie hat die heiligen Schauer der frommen Schwärmerei, der ritterlichen Begeisterung, der spießbürgerlichen Behemuth in dem eiskalten Wasser egoistischer Berechnung ertränkt. Sie hat die persönliche Würde in den Tauschwerth aufgelöst, und an die Stelle der zahllosen verbrieften und wohlverordneten Freiheiten die Eine gewissenlose Handelsfreiheit gesetzt. Sie hat, mit einem Wort, an die Stelle der mit religiösen und politischen Illusionen verhäulten Ausbeutung die offene, unverschämte, direkte, dürre Ausbeutung gesetzt.

Die Bourgeoisie hat alle bisher ehrwürdigen und mit frommer Scheu betrachteten Thätigkeiten ihres Heiligenscheins entkleidet. Sie hat den Arzt, den Juristen, den Pfaffen, den Poeten, den Mann der Wissenschaft in ihre bezahlten Lohnarbeiter verwandelt.

Die Bourgeoisie hat dem Familienverhältniß seinen rührend-sentimentalen Schleier abgerissen und es auf ein reines Geldverhältniß zurückgeführt.

Die Bourgeoisie hat enthüllt wie die brutale Kraftäuserung, die die Reaktion so sehr am Mittelalter bewundert, in der trügsten Värenhütereii ihre passende Ergänzung fand. Erst sie hat bewiesen was die Thätigkeit der Menschen zu Stande bringen kann. Sie hat ganz andere Wunderwerke vollbracht als egyptische Pyramiden, römische Wasserleitungen und gothische Kathedralen, sie hat ganz andere Jüge ausgeführt, als Völkerverwanderungen und Kreuzzüge.

Die Bourgeoisie kann nicht existiren ohne die Produktionsinstrumente, also die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also sämtliche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fortwährend zu revolutioniren. Unveränderte Beibehaltung der alten Produktionsweise war dagegen die erste Existenzbedingung aller früheren industriellen Klassen. Die fortwährende Umwälzung der Produktion, die ununterbrochene Erschütterung aller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 die ewige Unsicherheit und Bewegung zeichnet die Bourgeois-Epoche vor allen früheren aus. Alle festen, eingeroseten Verhältnisse mit ihrem Gefolge von altehrwürdigen Vorstellungen und Anschauungen werden aufgelöst, alle neugebildeten veralten, ehe sie veränderten können. Alles Ständische und Stehende verdampft, alles Heilige wird entweiht, und die Menschen sind endlich gezwungen, ihre Lebensstellung, ihre gegenseitigen Beziehungen mit nüchternen Augen anzusehen.

Das Bedürfniß nach einem stets ausgedehnteren Absatz für ihre Produkte jagt die Bourgeoisie über die ganze Erdfugel. Ueberall muß sie sich einmisten, überall anbauen, überall Verbindungen herstellen.

Die Bourgeoisie hat durch die Exploitation des Weltmarkts die Produktion und Konsumtion aller Länder kosmopolitisch gestaltet. Sie hat zum großen Bedauern der Reaktionäre den nationalen Boden der Industrie unter den Füßen weggezogen. Die uralten nationalen Industrien sind vernichtet worden und werden noch täglich vernichtet. Sie werden verdrängt durch neue Industrien, deren Einführung eine Lebensfrage für alle civilisirte Nationen wird, durch Industrien, die nicht mehr einheimische Rohstoffe, sondern den entlegensten Zonen angehörige Rohstoffe verarbeiten, und deren Fabrikate nicht nur im Lande selbst, sondern in allen Welttheilen zugleich verbraucht werden.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durch Landeserzeugnisse befriedigten Bedürfnisse treten neue, welche die Produkte der entferntesten Länder und Klimate zu ihrer Befriedigung erheischen.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lokalen und nationalen Selbstgenügsamkeit und Abgeschlossenheit tritt ein allseitiger Verkehr, eine allseitige Abhängigkeit

der Nationen von einander. Und wie in der materiellen, so auch in der geistigen Produktion. Die geistigen Erzeugnisse der einzelnen Nationen werden Gemeingut. Die nationale Einseitigkeit und Beschränktheit wird mehr und mehr unmöglich, und aus den vielen nationalen und lokalen Literaturen bildet sich eine Weltliteratur.

Die Bourgeoisie reißt durch die rasche Verbesserung aller Produktions-Instrumente, durch die unendlich erleichterten Kommunikationen alle, auch die barbarischsten Nationen in die Civilisation. Die wohlfeilen Preise ihrer Waaren sind die schwere Artillerie, mit der sie alle chinesischen Mauern in den Grund schießt, mit der sie den hartnäckigsten Fremdenhaß der Barbaren zur Kapitulation zwingt. Sie zwingt alle Nationen die Produktionsweise der Bourgeoisie sich anzueignen, wenn sie nicht zu Grunde gehen wollen; sie zwingt sie die sogenannte Civilisation bei sich selbst einzuführen, d. h. Bourgeois zu werden. Mit einem Wort, sie schafft sich eine Welt nach ihrem eigenen Bilde.

Die Bourgeoisie hat das Land der Herrschaft der Stadt unterworfen. Sie hat enorme Städte geschaffen, sie hat die Zahl der städtischen Bevölkerung gegenüber der ländlichen in hohem Grade vermehrt, und so einen bedeutenden Theil der Bevölkerung dem Idiotismus des Landlebens entrißen. Wie sie das Land von der Stadt, hat sie die barbarischen und halbbarbarischen Länder von den civilisirten, die Bauernvölker von den Bourgeoisvölkern, den Orient vom Occident abhängig gemacht.

Die Bourgeoisie hebt mehr und mehr die Zerspaltung der Produktionsmittel, des Besitzes und der Bevölkerung auf. Sie hat die Bevölkerung agglomerirt, die Produktionsmittel centralisirt und das Eigenthum in wenigen Händen concentrirt. Die nothwendige Folge hiervon war die politische Centralisation. Unabhängige, fast nur verbündete Provinzen mit verschiedenen Interessen, Gesetzen, Regierungen und Zöllen wurden zusammengedrängt in Eine Nation, Eine Regierung, Ein Gesetz, Ein nationales Klasseninteresse, Eine Douanelinie.

Die Bourgeoisie hat in ihrer kaum hundertjährigen Klassenherrschaft massenhaftere und kolossalere Produktionskräfte geschaffen als alle vergangenen Generationen zusammen. Unterjochung der Naturkräfte, Maschinerie, Anwendung der Chemie auf Industrie und Ackerbau, Dampfschiffahrt, Eisenbahnen, elektrische Telegraphen, Urbarmachung ganzer Welttheile, Schiffbarmachung der Flüsse, ganze aus dem Boden hervorgestampfte Bevölkerungen—welch früheres Jahrhundert ahnte, daß solche Produktionskräfte im Schooß der gesellschaftlichen Arbeit schlummerten.

Wir haben aber gesehen: Die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mittel, auf deren Grundlage sich die Bourgeoisie herabgebildet, wurden in der feudalen Gesellschaft erzeugt. Auf einer gewissen Stufe der Entwicklung dieser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mittel entsprachen die Verhältnisse, worin die feudale Gesellschaft producirte und austauschte, die feudale Organisation der Agrikultur und Manufaktur, mit einem Wort die feudalen Eigenthums-Verhältnisse den schon entwickelten Produktivkräften nicht mehr. Sie hemmten die Produktion statt sie zu fördern. Sie verwandelten sich in eben so viele Fesseln. Sie mußten gesprengt werden, sie wurden gesprengt.

An ihre Stelle trat die freie Konkurrenz mit der ihr angemessenen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Konstitution, mit der ökonomischen und politischen Herrschaft der Bourgeois-Klasse.

Unter unsren Augen geht eine ähnliche Bewegung vor. Die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 die bürgerlichen Eigenthums-Verhältnisse, die 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ie so gewaltige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mittel hervorgezaubert hat, gleicht dem Herrenmeister, der die unterirdischen Gewalten nicht mehr zu beherrschen vermag, die er herauf beschwor.

Seit Dezzennien ist die Geschichte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nur noch die Geschichte der Empörung der modernen Produktivkräfte gegen die modern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gegen die Eigenthums-Verhältnisse, welche die Lebens-Bedingungen der Bourgeoisie und ihrer Herrschaft sind. Es genügt die Handelskrisen zu nennen, welche in ihrer periodischen Wiederkehr immer drohenden die Existenz der ganzen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Frage stellen. In den Handelskrisen wird ein großer Theil nicht nur der erzeugten Produkte, sondern sogar der bereits geschaffenen Produktivkräfte regelmäßig vernichtet. In der Krisen bricht eine gesellschaftliche Epidemie aus, welche allen früheren Epochen als ein Widersinn erschienen wäre—die Epidemie der Ueberproduktion. Die Gesellschaft findet sich plötzlich in einen Zustand momentaner Barbarei zurückversetzt; eine Hungersnoth, ein allgemeiner Verwüstungskrieg scheinen ihr alle Lebensmittel abgeschnitten zu haben; die Industrie, der Handel scheinen vernichtet, und warum? Weil sie zu viel Civilisation, zu viel Lebensmittel, zu viel Industrie, zu viel Handel besitzet. Die Produktivkräfte, die ihr zur Verfügung stehen, dienen nicht mehr zur Beförderung der bürgerlichen Civilisation und der bürgerlichen Eigenthums-Verhältnisse; im Gegentheil, sie sind zu gewaltig für diese Verhältnisse geworden, sie werden von ihnen gehemmt, und so bald sie dies Hemmuß überwinden, bringen sie die ganz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Unordnung, gefährden sie die Existenz des bürgerlichen Eigenthums. Die bürgerlichen Verhältnisse sind zu eng geworden um den von ihnen erzeugten Reichtum zu fassen.—Wodurch überwindet die Bourgeoisie die Krisen? Einerseits durch die erzwungene Vernichtung einer Masse von Produktivkräften; andererseits durch die Eroberung neuer Märkte, und die gründlichere Ausbeutung der alten Märkte. Wodurch also? Dadurch, daß sie allseitigere und gewaltigere Krisen vorbereitet und die Mittel, den Krisen vorzubeugen, vermindert.

Die Waffen, womit die Bourgeoisie den Feudalismus zu Boden geschlagen hat, richten sich jetzt gegen die Bourgeoisie selbst.

Aber die Bourgeoisie hat nicht nur die Waffen geschmiedet, die ihr den Tod bringen; sie hat auch die Männer gezeugt, die diese Waffen führen werden—die modernen Arbeiter, die Proletarier.

In demselben Maße, worin sich die Bourgeoisie, d. h. das Kapital entwickelt, in demselben Maße entwickelt sich das Proletariat, die Klasse der modernen Arbeiter, die nur so lange leben als sie Arbeit finden, und die nur so lange Arbeit finden, als ihre Arbeit das Kapital vermehrt. Diese Arbeiter, die sich stückweis verkaufen müssen, sind eine Waare wie jeder andre Handelsartikel, und daher gleichmäßig allen Wechselfällen der Konkurrenz, allen Schwankungen des Marktes ausgesetzt.

Die Arbeit der Proletarier hat durch die Ausdehnung der Maschinerie und die Theilung der Arbeit allen selbstständigen Charakter und damit allen Reiz für den Arbeiter verloren. Er wird ein bloßes Zubehör der Maschine, von dem nur der einfachste, eintönigste, am leichtesten erlernbare Handgriff verlangt wird. Die Kosten die der Arbeiter verursacht, beschränken sich daher fast nur auf die Lebensmittel, die er zu seinem Unterhalt und zur Fortpflanzung seiner Race bedarf. Der Preis einer Waare, also auch der Arbeit ist aber gleich ihren Produktionskosten. In demselben Maße, in dem die Widerwärtigkeit der Arbeit wächst, nimmt daher der Lohn ab. Noch mehr, in demselben Maße wie Maschinerie und Theilung der Arbeit zunehmen, in demselben Maße nimmt auch die Masse der Arbeit zu, sei es durch Vermehrung der Arbeitsstunden, sei es durch Vermehrung der in einer gegebenen Zeit geforderten Arbeit, beschleunigten Lauf der Maschinen u. s. w.

Die moderne Industrie hat die kleine Werkstube des patriarchalischen Meisters in die große Fabrik des industriellen Kapitalisten verwandelt. Arbeiter:

Massen in der Fabrik zusammengedrängt, werden soldatisch organisiert. Sie werden als gemeine Industriegoldaten unter die Aufsicht einer vollständigen Hierarchie von Unteroffizieren und Offizieren gestellt. Sie sind nicht nur Knechte der Bourgeoisieklasse, des Bourgeoisstaates, sie sind täglich und stündlich geknechtet von der Maschine, von dem Aufseher, und vor Allem von dem einzelnen fabrizierenden Bourgeois selbst. Diese Despotie ist um so kleinlicher, gehässiger, erbitternder, je offener sie den Erwerb als ihren letzten Zweck proklamirt.

Je weniger die Handarbeit Geschicklichkeit und Kraftäußerung erheischt, d. h. je mehr die moderne Industrie sich entwickelt, desto mehr wird die Arbeit der Männer durch die der Weiber und Kinder verdrängt. Geschlechts- und Altersunterschiede haben keine gesellschaftliche Geltung mehr für die Arbeiterklasse. Es gibt nur noch Arbeitsinstrumente, die je nach Alter und Geschlecht verschiedene Kosten machen.

Ist die Ausbeutung des Arbeiters durch den Fabrikanten so weit beendigt, daß er seinen Arbeitslohn baar ausgezahlt erhält, so fallen die andern Theile der Bourgeoisie über ihn her, der Hausbesitzer, der Krämer, der Pfandverleiher u. s. w.

Die bisherigen kleinen Mittelstände, die kleinen Industriellen, Kaufleute und Rentiers, die Handwerker und Bauern, alle diese Klassen fallen ins Proletariat hinab, theils dadurch, daß ihr kleines Kapital für den Betrieb der großen Industrie nicht ausreicht, und der Konkurrenz mit den größeren Kapitalisten erliegt, theils dadurch, daß ihre Geschicklichkeit von neuen Produktionsweisen entwerthet wird. So rekrutirt sich das Proletariat aus allen Klassen der Bevölkerung.

Das Proletariat macht verschiedene Entwicklungsstufen durch. Sein Kampf gegen die Bourgeoisie beginnt mit seiner Existenz.

Im Anfang kämpfen die einzelnen Arbeiter, dann die Arbeiter einer Fabrik, dann die Arbeiter eines Arbeitszweiges an einen Ort gegen den einzelnen Bourgeois, der sie direkt ausbeutet. Sie richten ihre Angriffe nicht nur gegen die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sie richten sie gegen die Produktions-Instrumente selbst; sie vernichten die fremden konkurrierenden Waaren, sie zerschlagen die Maschinen, sie stecken die Fabriken in Brand, sie suchen sich die untergegangene Stellung des mittelalterlichen Arbeiters wieder zu erringen.

Auf dieser Stufe bilden die Arbeiter eine über das ganze Land zerstreute und durch die Konkurrenz zersplitterte Masse. Massenhafteres Zusammenhalten der Arbeiter ist noch nicht die Folge ihrer eigenen Vereinigung, sondern die Folge der Vereinigung der Bourgeoisie, die zur Erreichung ihrer eigenen politischen Zwecke das ganze Proletariat in Bewegung setzen muß und es einstweilen noch kann. Auf dieser Stufe bekämpfen die Proletarier also nicht ihre Feinde, sondern die Feinde ihrer Feinde, die Reste der absoluten Monarchie, die Grundeigentümer, die nicht industriellen Bourgeois, die Kleinbürger. Die ganze geschichtliche Bewegung ist so in den Händen der Bourgeoisie konzentriert; jeder Sieg, der so errungen wird, ist ein Sieg der Bourgeoisie.

Aber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 vermehrt sich nicht nur das Proletariat; es wird in größeren Massen zusammengedrängt, seine Kraft wächst und es fühlt sie mehr. Die Interessen, die Lebenslagen innerhalb des Proletariats gleichen sich immer mehr aus, indem die Maschinerie mehr und mehr die Unterschiede der Arbeit verwischt und den Lohn fast überall auf ein gleich niedriges Niveau herabdrückt. Die wachsende Konkurrenz der Bourgeois unter sich und die daraus hervorkehenden Handelskrisen machen den Lohn der Arbeiter immer schwankender; die immer rascher sich entwickelnde, unaufhörliche Verbesserung der Maschinerie macht ihre ganze Lebensstellung immer unsicherer; immer mehr nehmen die Kollisionen zwischen dem einzelnen Arbeiter und dem einzelnen Bourgeois den Charakter von Kollisionen zweier Klassen an. Die Arbeiter beginnen

damit, Coalitionen gegen die Bourgeois zu bilden; sie treten zusammen zur Behauptung ihres Arbeitslohns. Sie stiften selbst dauernde Associationen, um sich für diese gelegentlichen Empörungen zu verproviantiren. Stellenweis bricht der Kampf in Emeuten aus.

Von Zeit zu Zeit siegen die Arbeiter, aber nur vorübergehend. Das eigentliche Resultat ihrer Kämpfe ist nicht der unmittelbare Erfolg, sondern die immer weiter um sich greifende Vereinigung der Arbeiter. Sie wird befördert durch die wachsenden Kommunikationsmittel, die von der großen Industrie erzeugt werden und die Arbeiter der verschiedenen Lokalitäten mit einander in Verbindung setzen. Es bedarf aber blos der Verbindung, um die vielen Lokalkämpfe von überall gleichem Charakter, zu einem nationalen, zu einem Klassenkampf zu centralisiren. Jeder Klassenkampf aber ist ein politischer Kampf. Und die Vereinigung, zu der die Bürger des Mittelalters mit ihren Vicinalwegen Jahrhunderte bedurften, bringen die modernen Proletarier mit den Eisenbahnen in wenigen Jahren zu Stande.

Diese Organisation der Proletarier zur Klasse, und damit zur politischen Partei, wird jeden Augenblick wieder gesprengt durch die Konkurrenz unter den Arbeitern selbst. Aber sie erhebt immer wieder, stärker, fester, mächtiger. Sie erzwingt die Anerkennung einzelner Interessen der Arbeiter in Gesetzesform, indem sie die Spaltungen der Bourgeoisie unter sich benützt. So die Zehnstundenbill in England.

Die Kollisionen der alten Gesellschaft überhaupt fördern mannichfach den Entwicklungsengang des Proletariats. Die Bourgeoisie befindet sich in fortwährendem Kampf; anfangs gegen die Aristokratie; später gegen die Theile der Bourgeoisie selbst, deren Interessen mit dem Fortschritt der Industrie in Widerspruch gerathen; stets gegen die Bourgeoisie aller auswärtigen Länder. In allen diesen Kämpfen sieht sie sich genöthigt an das Proletariat zu appelliren, seine Hülfe in Anspruch zu nehmen und es so in die politische Bewegung hineinzuweisen. Sie selbst führt also dem Proletariat ihre eigenen Bildungselemente, d. h. Waffen gegen sich selbst zu.

Es werden ferner, wie wir sahen, durch den Fortschritt der Industrie ganze Bestandtheile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in's Proletariat hinabgeworfen oder wenigstens in ihren Lebensbedingungen bedroht. Auch sie führen dem Proletariat eine Masse Bildungselemente zu.

In Zeiten endlich wo der Klassenkampf sich der Entscheidung nähert, nimmt der Auflösungsprozeß innerhalb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innerhalb der ganzen alten Gesellschaft, einen so heftigen, so grellen Charakter an, daß ein kleiner Theil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sich von ihr los sagt und sich der revolutionären Klasse anschließt, der Klasse, welche die Zukunft in ihren Händen trägt. Wie daher früher ein Theil des Adels zur Bourgeoisie überging, so geht jetzt ein Theil der Bourgeoisie zum Proletariat über, und namentlich ein Theil der Bourgeois- Ideologen, welche zum theoretischen Verständniß der ganzen 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sich hinaufgearbeitet haben.

Von allen Klassen welche heutzutage der Bourgeoisie gegenüber stehen, ist nur das Proletariat eine wirklich revolutionäre Klasse. Die übrigen Klassen verkommen und gehen unter mit der großen Industrie, das Proletariat ist ihr einziges Produkt.

Die Mittelstände, der kleine Industrielle, der kleine Kaufmann, der Handwerker, der Bauer, sie Alle bekämpfen die Bourgeoisie, um ihre Existenz als Mittelstände, vor dem Untergang zu sichern. Sie sind also nicht revolutionär, sondern konservativ. Noch mehr, sie sind reaktionär, denn sie suchen das Rad der Geschichte zurückzudrehen. Sind sie revolutionär, so sind sie es im Hinblick auf den ihnen bevorstehenden Uebergang ins Proletariat, so vertheidigen

sie nicht ihre gegenwärtigen, sondern ihre zukünftigen Interessen, so verlassen sie ihre eigenen Standpunkt um sich auf den des Proletariats zu stellen.

Das Lumpenproletariat, diese passive Versaulung der untersten Schichten der alten Gesellschaft, wird durch ein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stellenweise in die Bewegung hineingeschleudert, seiner ganzen Lebenslage nach wird es bereitwilliger sein sich zu reaktionären Umtrieben erkaufen zu lassen.

Die Lebensbedingungen der alten Gesellschaft sind schon vernichtet in den Lebensbedingungen des Proletariats. Der Proletarier ist eigenthumslos; sein Verhältniß zu Weib und Kindern hat nichts mehr gemein mit dem bürgerlichen Familienverhältniß; die moderne industrielle Arbeit, die moderne Unterjochung unter das Kapital, dieselbe in England wie in Frankreich, in Amerika wie in Deutschland, hat ihm allen nationalen Charakter abgestreift. Die Gesetze, die Moral, die Religion sind für ihn eben so viele bürgerliche Vorurtheile, hinter denen sich eben so viele bürgerliche Interessen verstecken.

Alle früheren Klassen, die sich die Herrschaft eroberten, suchten ihre schon erworbene Lebensstellung zu sichern, indem sie die ganze Gesellschaft den Bedingungen ihres Erwerbs unterwarfen. Die Proletarier können sich die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vkräfte nur erobern, indem sie ihre eigene bisherige Aneignungsweise und damit die ganze bisherige Aneignungsweise abschaffen. Die Proletarier haben Nichts von dem Uebrigen zu sichern, sie haben alle bisherige Privatbesitzer und Privatversicherungen zu zerstören.

Alle bisherigen Bewegungen waren Bewegungen von Minoritäten oder im Interesse von Minoritäten. Die proletarische Bewegung ist die selbstständige Bewegung der ungeheuren Mehrzahl im Interesse der ungeheuren Mehrzahl. Das Proletariat, die unterste Schichte der jetzigen Gesellschaft, kann sich nicht erheben, nicht aufrichten, ohne daß der ganze Ueberbau der Schichten, die die offizielle Gesellschaft bilden, in die Luft gesprengt wird.

Obgleich nicht dem Inhalt, ist der Form nach der Kampf des Proletariats gegen die Bourgeoisie zunächst ein nationaler. Das Proletariat eines jeden Landes muß natürlich zuerst mit seiner eigenen Bourgeoisie fertig werden.

Indem wir die allgemeinsten Phasen der Entwicklung des Proletariats zeichneten, verfolgten wir den mehr oder minder versteckten Bürgerkrieg innerhalb der bestehenden Gesellschaft bis zu dem Punkt, wo er in eine offene Revolution ausbricht und durch den gewaltsamen Sturz der Bourgeoisie das Proletariat seine Herrschaft begründet.

Alle bisherige Gesellschaft beruhte, wie wir gesehen haben, auf dem Gegensatz unterdrückender und unterdrückter Klassen. Um aber eine Klasse unterdrücken zu können, müssen ihr Bedingungen gesichert sein innerhalb deren sie wenigstens ihre knechtische Existenz fristen kann. Der Leibeigne hat sich zum Mitglied der Kommune in der Leibeigenschaft herangearbeitet, wie der Kleinbürger zum Bourgeois unter dem Joch des feudalistischen Absolutismus. Der moderne Arbeiter dagegen, statt sich mit dem Fortschritt der Industrie zu heben, sinkt immer tiefer unter die Bedingungen seiner eignen Klasse herab. Der Arbeiter wird zum Pauper, und der Pauperismus entwickelt sich noch rascher als Bevölkerung und Reichthum. Es tritt hiermit offen hervor, daß die Bourgeoisie unfähig ist noch länger die herrschende Klasse der Gesellschaft zu bleiben und die Lebensbedingungen ihrer Klasse der Gesellschaft als regelndes Gesetz aufzuzwingen. Sie ist unfähig zu herrschen, weil sie unfähig ist ihrem Sklaven die Existenz selbst innerhalb seiner Sklaverei zu sichern, weil sie gezwungen ist ihn in eine Lage herabsinken zu lassen, wo sie ihn ernähren muß, statt von ihm ernährt zu werden. Die Gesellschaft kann nicht mehr unter ihr leben, d. h. ihr Leben ist nicht mehr verträglich mit der Gesellschaft.

Die wesentlichste Bedingung für die Existenz und für die Herrschaft der Bour-

geoisiklasse ist die Anhäufung des Reichthums in den Händen von Privaten, die Bildung und Vermehrung des Kapitals. Die Bedingung des Kapitals ist die Lohnarbeit. Die Lohnarbeit beruht ausschließlich auf der Konkurrenz der Arbeiter unter sich. Der Fortschritt der Industrie, dessen willenloser und widerstandsloser Träger die Bourgeoisie ist, setzt an die Stelle der Isolirung der Arbeiter durch die Konkurrenz ihre revolutionäre Vereinigung durch die Association.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roßen Industrie wird also unter den Füßen der Bourgeoisie die Grundlage selbst weggezogen worauf sie produziert und die Producte sich aneignet. Sie produziert vor Allem ihre eignen Todtengräber. Ihr Untergang und der Sieg des Proletariats sind gleich unvermeidlich.

II.

Proletarier und Kommunisten.

In welchem Verhältniß stehen die Kommunisten zu den Proletariern überhaupt?

Die Kommunisten sind keine besondere Partei gegenüber den andern Arbeiterparteien.

Sie haben keine von den Interessen des ganzen Proletariats getrennten Interessen.

Sie stellen keine besondern Prinzipien auf, wonach sie die proletarische Bewegung modeln wollen.

Die Kommunisten unterscheiden sich von den übrigen proletarischen Parteien nur dadurch, daß einerseits sie in den verschiedenen nationalen Kämpfen der Proletarier die gemeinsamen, von der Nationalität unabhängigen Interessen des gesammten Proletariats hervorheben und zur Geltung bringen, andererseits dadurch, daß sie in den verschiedenen Entwicklungs-Stufen, welche der Kampf zwischen Proletariat und Bourgeoisie durchläuft, stets das Interesse der Gesamtbewegung vertreten.

Die Kommunisten sind also praktisch der entschiedenste immer weiter treibende Theil der Arbeiterparteien aller Länder, sie haben theoretisch vor der übrigen Masse des Proletariats die Einsicht in die Bedingungen, den Gang und die allgemeinen Resultate der Proletarischen Bewegung voraus.

Der nächste Zweck der Kommunisten ist derselbe wie der aller übrigen proletarischen Parteien: Bildung des Proletariats zur Klasse, Sturz der Bourgeoisieherrschaft, Eroberung der politischen Macht durch das Proletariat.

Die theoretischen Sätze der Kommunisten beruhen keineswegs auf Ideen, auf Prinzipien, die von diesem oder jenem Weltverbesserer erfunden oder entdeckt sind. Sie sind nur allgemeine Ausdrücke thatsächlicher Verhältnisse eines existirenden Klassenkampfes, einer unter unsern Augen vor sich gehenden 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Die Abschaffung bisheriger Eigenthumsverhältnisse ist nichts den Kommunismus eigenthümlich Bezeichnendes.

Alle Eigenthumsverhältnisse waren einem beständigen geschichtlichen Wechsel, einer beständigen geschichtlichen Veränderung unterworfen.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z. B. schaffte das Feudal-Eigenthum zu Gunsten des bürgerlichen ab.

Was den Kommunismus auszeichnet, ist nicht die Abschaffung des Eigenthums überhaupt, sondern die Abschaffung des bürgerlichen Eigenthums.

Aber das moderne bürgerliche Privateigenthum ist der letzte und vollendeteste Ausdruck der Erzeugung und Aneignung der Producte, die auf Klassengegensätzen, die auf der Ausbeutung der Einen durch die Andern beruht.

In diesem Sinn können die Kommunisten ihre Theorie in dem einen Ausdruck: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hums zusammenfassen.

Man hat uns Kommunisten vorgeworfen, wir wollten das persönlich erworbene, selbstarbeitete Eigentum abschaffen; das Eigentum, welches die Grundlage all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 Thätigkeit und Selbstständigkeit bilde.

Erarbeitetes, erworbenes, selbstverdientes Eigentum! Sprecht Ihr von dem kleinbürgerlichen, kleinbäuerlichen Eigentum, welches dem bürgerlichen Eigentum vorberging? Wir brauchen es nicht abzuschaffen, die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 hat es abgeschafft und schafft es täglich ab.

Oder sprecht Ihr vom modernen bürgerlichen Privateigentum?

Schafft aber die Lohnarbeit, die Arbeit des Proletariers ihm Eigentum? Keineswegs. Sie schafft das Kapital, d. h. das Eigentum, welches die Lohnarbeit ausbeutet, welches sich nur unter der Bedingung vermehren kann, daß es neue Lohnarbeit erzeugt, um sie von Neuem auszubeuten. Das Eigentum in seiner heutigen Gestalt bewegt sich in dem Gegensatz von Kapital und Lohnarbeit. Betrachten wir die beiden Seiten dieses Gegensatzes. Kapitalist sein heißt nicht nur eine reinpersönliche, sondern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ellung in der Produktion einnehmen.

Das Kapital ist ein gemeinschaftliches Produkt und kann nur durch eine gemeinsame Thätigkeit vieler Mitglieder, ja in letzter Instanz nur durch die gemeinsame Thätigkeit aller Mitglieder der Gesellschaft in Bewegung gesetzt werden.

Das Kapital ist also keine persönliche, es ist eine gesellschaftliche Macht.

Wenn also das Kapital in gemeinschaftliches, allen Mitgliedern der Gesellschaft angehöriges Eigentum verwandelt wird, so verwandelt sich nicht persönliches Eigentum in gesellschaftliches. Nur der gesellschaftliche Charakter des Eigentums verwandelt sich. Es verliert seinen Klassen-Charakter.

Kommen wir zur Lohnarbeit.

Der Durchschnittspreis der Lohnarbeit ist das Minimum des Arbeitslohnes, d. h. die Summe der Lebensmittel, die nothwendig sind, um den Arbeiter als Arbeiter am Leben zu erhalten. Was also der Lohnarbeiter durch seine Thätigkeit sich aneignet, reicht bloß dazu hin, um sein nacktes Leben wieder zu erzeugen. Wir wollen diese persönliche Aneignung der Arbeitsprodukte zur Wiedererzeugung des unmittelbaren Lebens keineswegs abschaffen, eine Aneignung, die keinen Reinertrag übrig läßt, der Macht über fremde Arbeit geben könnte. Wir wollen nur den elenden Charakter dieser Aneignung aufheben, worin der Arbeiter nur lebt, um das Kapital zu vermehren, nur so weit lebt, wie es das Interesse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erheischt.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st die lebendige Arbeit nur ein Mittel, die aufgehäufte Arbeit zu vermehren. In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 ist die aufgehäufte Arbeit nur ein Mittel, um den Lebensprozeß der Arbeiter zu erweitern, zu bereichern, zu befördern.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herrscht also die Vergangenheit über die Gegenwart, in der kommunistischen die Gegenwart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st das Kapital selbstständig und persönlich, während das thätige Individuum unselbstständig und unpersönlich ist.

Und die Aufhebung dieses Verhältnisses nennt die Bourgeoisie Aufhebung der Persönlichkeit und Freiheit! Und mit Recht. Es handelt sich allerdings um die Aufhebung der Bourgeois-Persönlichkeit, Selbstständigkeit und Freiheit.

Unter Freiheit versteht man innerhalb der jetzigen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den freien Handel, den freien Kauf und Verkauf.

Fällt aber der Schacher, so fällt auch der freie Schacher. Die Lebensarten vom freien Schacher, wie alle übrigen Freiheitsbravaden unserer Bourgeois haben überhaupt nur einen Sinn gegenüber dem gebundenen Schacher, gegenüber dem geknechteten Bürger des Mittelalters, nicht aber gegenüber der kom-

munifischen Aufhebung des Schachers, der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und der Bourgeoisie selbst.

Ihr entsetzt Euch darüber, daß wir das Privateigenthum aufheben wollen. Aber in Eurer bestehenden Gesellschaft ist das Privateigenthum für 9 Zehntel ihrer Mitglieder aufgehoben; es existirt gerade dadurch, daß es für 9 Zehntel nicht existirt. Ihr werft uns also vor, daß wir ein Eigenthum aufheben wollen, welches die Eigenthumslosigkeit der ungeheuren Mehrzahl der Gesellschaft als nothwendige Bedingung voraussetzt.

Ihr werft uns mit Einem Wort vor, daß wir Euer Eigenthum aufheben wollen. Allerdings das wollen wir.

Von dem Augenblick an, wo die Arbeit nicht mehr in Kapital, Geld, Grundrente, kurz, in eine monopolisirbare gesellschaftliche Macht verwandelt werden kann, d. h. von dem Augenblick, wo das persönliche Eigenthum nicht mehr in bürgerliches umschlagen kann, von dem Augenblick an erklärt Ihr die Person sei aufgehoben.

Ihr gesteht also, daß Ihr unter der Person Niemanden anders versteht, als den Bourgeois, den bürgerlichen Eigenthümer. Und diese Person soll allerdings aufgehoben werden.

Der Kommunismus nimmt keinem die Macht sich 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e anzueignen, er nimmt nur die Macht sich durch diese Aneignung fremde Arbeit zu unterjochen.

Man hat eingewendet, mit der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hums werde alle Thätigkeit aufhören und eine allgemeine Faulheit einreißen.

Hiernach müßte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längst an der Trägheit zu Grunde gegangen sein; denn die in ihr arbeiten, erwerben nicht, und die in ihr erwerben, arbeiten nicht. Das ganze Bedenken läuft auf die Tautologie hinaus, daß es keine Lohnarbeit mehr gibt, sobald es kein Kapital mehr gibt.

Alle Einwürfe die gegen die kommunistische Aneignungs- und Produktionsweise der materiellen Produkte gerichtet werden, sind eben so auf die Aneignung und Produktion der geistigen Produkte ausgedehnt worden. Wie für den Bourgeois das Aufhören des Klasseneigenthums das Aufhören der Produktion selbst ist, so ist für ihn das Aufhören der Klassenbildung identisch mit dem Aufhören der Bildung überhaupt.

Die Bildung, deren Verlust er bedauert, ist für die enorme Mehrzahl die Heranbildung zur Maschine.

Aber streitet nicht mit uns, indem Ihr an Euren bürgerlichen Vorstellungen von Freiheit, Bildung, Recht u. s. w. die Abschaffung des bürgerlichen Eigenthums messt. Eure Ideen selbst sind Erzeugnisse der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 und Eigenthums-Verhältnisse, wie Euer Recht nur der zum Gesetz erhobene Wille Eurer Klasse ist, ein Wille, dessen Inhalt gegeben ist in den materiellen Lebensbedingungen Eurer Klasse.

Die interessirte Vorstellung, worin Ihr Eure Produktions- und Eigenthums-Verhältnisse aus geschichtlichen, in dem Lauf der Produktion vorübergehenden Verhältnissen in ewige Natur und Vernunftgesetze verwandelt, theilt Ihr mit allen untergegangenen herrschenden Klassen. Was Ihr für das antike Eigenthum begreift, was Ihr für das feudale Eigenthum begreift, dürft Ihr nicht mehr begreifen für das bürgerliche Eigenthum.

Aufhebung der Familie! Selbst die Radikalsten eifern sich über diese schändliche Absicht der Kommunisten.

Worauf beruht die gegenwärtige, die bürgerliche Familie? Auf dem Kapital, auf dem Privatwerb. Vollständig entwickelt existirt sie nur für die Bourgeoisie; aber sie findet ihre Ergänzung in der erzwungenen Familienlosigkeit der Proletarier und der öffentlichen Prostitution.

Die Familie des Bourgeois fällt natürlich weg, mit dem Wegfallen dieser ihrer Ergänzung und beide verschwinden mit dem Verschwinden des Kapitals.

Werft Ihr uns vor, daß wir die Ausbeutung der Kinder durch ihre Eltern aufheben wollen? Wir gestehen dies Verbrechen ein. Aber sagt Ihr, wir heben die trauesten Verhältnisse auf, indem wir an die Stelle der häuslichen Erziehung die gesellschaftliche setzen.

Und ist nicht auch eure Erziehung durch die Gesellschaft bestimmt? Durch die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innerhalb deren Ihr erzieht, durch die direktere oder indirektere Einmischung der Gesellschaft vermittelt der Schule u. s. w.? Die Kommunisten erfinden nicht die Einwirkung der Gesellschaft auf die Erziehung; sie verändern nur ihren Charakter, sie entreißen die Erziehung dem Einfluß einer herrschenden Klasse.

Die bürgerlichen Nebensarten über Familie und Erziehung über das traute Verhältniß von Eltern und Kindern werden um so ekelhafter, je mehr in Folge der großen Industrie alle Familienbände für die Proletarier zerrissen und die Kinder in einfache Handelsartikel und Arbeitsinstrumente verwandelt werden.

Aber Ihr Kommunisten wollt die Weibergemeinschaft einführen, schreit uns die ganze Bourgeoisie im Chor entgegen.

Der Bourgeois sieht in seiner Frau ein bloßes Produktions-Instrument. Er hört, daß die Produktions-Instrumente gemeinschaftlich ausgebeutet werden sollen und kann sich natürlich nicht anders denken, als daß das Loos der Gemeinschaftlichkeit die Weiber gleichfalls treffen wird.

Er ahnt nicht, daß es sich eben darum handelt, die Stellung der Weiber als bloßer Produktions-Instrumente aufzuheben.

Uebrigens ist nichts lächerlicher als das hochmoralische Entsetzen unserer Bourgeois über die angebliche officiële Weibergemeinschaft der Kommunisten. Die Kommunisten brauchen die Weibergemeinschaft nicht einzuführen, sie hat fast immer existirt.

Unsre Bourgeois nicht zufrieden damit, daß ihnen die Weiber und Töchter ihrer Proletarier zur Verfügung stehen, von der officiellen Prostitution gar nicht zu sprechen, finden ein Hauptvergnügen darin ihre Ehefrauen wechselseitig zu verführen.

Die bürgerliche Ehe ist in Wirklichkeit die Gemeinschaft der Ehefrauen. Man könnte höchstens den Kommunisten vorwerfen, daß sie an der Stelle einer heuchlerisch versteckten, eine officiële, offenherzige Weibergemeinschaft einführen wollen. Es versteht sich übrigens von selbst, daß mit Aufhebung der jetzig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auch die aus ihnen hervorgehende Weibergemeinschaft, d. h. die officiële und nicht officiële Prostitution verschwindet.

Den Kommunisten ist ferner vorgeworfen worden, sie wollten das Vaterland, die Nationalität abschaffen.

Die Arbeiter haben kein Vaterland. Man kann ihnen nicht nehmen, was sie nicht haben. Indem das Proletariat zunächst sich die politische Herrschaft erobert, sich zur nationalen Klasse erhebt, sich selbst als Nation konstituiren muß, ist es selbst noch national, wenn auch keineswegs im Sinne der Bourgeoisie.

Die nationalen Absonderungen und Gegensätze der Völker verschwinden mehr und mehr schon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Bourgeoisie, mit der Handelsfreiheit, dem Weltmarkt, der Gleichförmigkeit der industriellen Produktion und der ihr entsprechenden Lebensverhältnisse.

Die Herrschaft des Proletariats wird sie noch mehr verschwinden machen. Bereinigte Aktion wenigstens der civilisirten Länder ist eine der ersten Bedingungen seiner Befreiung.

In dem Maße wie die Exploitation des einen Individuums durch das andere aufgehoben wird, wird die Exploitation einer Nation durch die andre aufgehoben.

Mit dem Gegensatz der Klassen im Innern der Nationen fällt die feindliche Stellung der Nationen gegen einander.

Die Anklagen gegen den Kommunismus, die von religiösen, philosophischen und ideologischen Gesichtspunkten überhaupt erhoben werden, verdienen keine ausführlichere Erörterung.

Bedarf es tiefer Einsicht um zu begreifen, daß mit den Lebensverhältnissen der Menschen, mit ihren gesell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mit ihrem 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 auch ihre Vorstellungen, Anschauungen und Begriffe, mit einem Worte auch ihr Bewußtsein sich ändert?

Was beweist die Geschichte der Ideen anders, als daß die geistige Produktion sich mit der materiellen umgestaltet. Die herrschenden Ideen einer Zeit waren stets nur die Idee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Man spricht von Ideen, welche eine ganze Gesellschaft revolutioniren; man spricht damit nur die Thatsache aus, daß sich innerhalb der alten Gesellschaft die Elemente einer neuen gebildet haben, daß mit der Auflösung der alten Lebensverhältnisse die Auflösung der alten Ideen gleichen Schritt hält.

Als die alte Welt im Untergehen begriffen war, wurden die alten Religionen von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besiegt. Als die christlichen Ideen im 18. Jahrhundert den Aufklärungs-Ideen unterlagen, rang die feudale Gesellschaft ihren Tobekampf mit der damals revolutionären Bourgeoisie. Die Ideen der Gewissens- und Religionsfreiheit sprachen nur die Herrschaft der freien Konkurrenz auf dem Gebiet des Gewissens aus.

Aber wird man sagen, religiöse, moralische, philosophische, politische, rechtliche Ideen n. s. w. modificirten sich allerdings im Lauf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ie Religion, die Moral, die Philosophie, die Politik, das Recht, erhielten sich stets in diesem Wechsel.

Es gibt zudem ewige Wahrheiten wie Freiheit, Gerechtigkeit u. s. w., die all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n gemeinsam sind. Der Kommunismus aber schafft die ewigen Wahrheiten ab, er schafft die Religion ab, die Moral, statt sie neu zu gestalten, er widerspricht also allen bisherigen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en.

Worauf reducirt sich diese Anklage? Die Geschichte der ganzen bisherigen Gesellschaft bewegte sich in Klaffengegensätzen, die in den verschiedenen Epochen verschieden gestaltet waren.

Welche Form sie aber auch immer angenommen, die Ausbeutung des einen Theils der Gesellschaft durch den andern ist eine allen vergangenen Jahrhunderten gemeinsame Thatsache. Kein Wunder daher, daß das gesellschaftliche Bewußtsein aller Jahrhunderte aller Mannigfaltigkeit und Verschiedenheit zum Trotz, in gewissen gemeinsamen Formen sich bewegt, Formen, Bewußtseinsformen, die nur mit dem gänzlichen Verschwinden des Klaffengegensatzes sich vollständig auflösen.

Die kommunistische Revolution ist das radikalste Brechen mit den überliefert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n, kein Wunder, daß in ihrem Entwicklungs gange am radikalsten mit den überlieferten Ideen gebrochen wird.

Doch lassen wir die Einwürfe der Bourgeoisie gegen den Kommunismus. Wir sahen schon oben, daß der erste Schritt in der Arbeiter-Revolution die Erhebung des Proletariats zur herrschenden Klasse, die Erkämpfung der Demokratie ist.

Das Proletariat wird seine politische Herrschaft dazu benutzen der Bourgeoisie nach und nach alles Kapital zu entreißen, alle Produktions-Instrumente in den Händen des Staats, d. h. des als herrschende Klasse organisirten Proletariats zu centralisiren und die Masse der Produktionskräfte möglichst rasch zu vermehren.

Es kann dies natürlich zunächst nur geschehen vermittelst despotischer Eingriffe in das Eigenthumsrecht und in die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durch Maaßregeln also, die ökonomisch unzureichend und unhaltbar erscheinen, die aber im Lauf der Bewegung über sich selbst hinaus treiben und als Mittel zur Umwälzung der ganzen Produktionsweise unvermeidlich sind.

Diese Maaßregeln werden natürlich je nach de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verschieden sein.

Für die fortgeschrittensten Länder werden jedoch die folgenden ziemlich allgemein in Anwendung kommen können:

- 1) Expropriation des Grundeigenthums und Verwendung der Grundrente zu Staatsausgaben.
- 2) Starke Progressiv-Steuer.
- 3) Abschaffung des Erbrechts.
- 4) Konfiskation des Eigenthums aller Emigranten und Rebellen.
- 5) Centralisation des Credits in den Händen des Staats durch eine Nationalbank mit Staatskapital und ausschließlichem Monopol.
- 6) Centralisation alles Transportwesens in den Händen des Staats.
- 7) Vermehrung der Nationalfabriken, Produktions-Instrumente, Urbarmachung und Verbesserung der Ländereien nach einem gemeinschaftlichen Plan.
- 8) Gleicher Arbeitszwang für Alle, Errichtung industrieller Armeen besonders für den Ackerbau.
- 9) Vereinigung des Betriebs von Ackerbau und Industrie, Hinwirken auf die allmähliche Beseitigung des Gegensatzes von Stadt und Land.
- 10) Öffentliche und unentgeltliche Erziehung aller Kinder. Beseitigung der Fabrikarbeit der Kinder in ihrer heutigen Form. Vereinigung der Erziehung mit der materiellen Produktion u. s. w., u. s. w.

Sind im Laufe der Entwicklung die Klassenunterschiede verschwunden, und ist alle Produktion in den Händen der associirten Individuen concentrirt, so verliert die öffentliche Gewalt den politischen Charakter. Die politische Gewalt im eigentlichen Sinn ist die organisirte Gewalt einer Klasse zur Unterdrückung einer andern. Wenn das Proletariat im Kampfe gegen die Bourgeoisie sich nothwendig zur Klasse vereint, durch eine Revolution sich zur herrschenden Klasse macht, und als herrschende Klasse gewaltsam die alt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aufhebt, so hebt es mit dies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die Existenz-Bedingungen des Klassegegensatzes der Klassen überhaupt, und damit seine eigene Herrschaft als Klasse auf.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mit ihren Klassen und Klassen-Gegegensätzen tritt eine Association, worin die freie Entwicklung eines Jeden, die Bedingung für die freie Entwicklung Aller ist.

III.

Soz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Literatur.

1) Der reaktionaire Socialismus.

a) Der feudale Socialismus.

Die französische und englische Aristokratie war ihrer geschichtlichen Stellung nach dazu berufen, Pamphlete gegen die 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zu schreib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Julirevolution von 1830, in der englischen Reformbewegung war sie noch einmal dem verhassten Emporkömmling erlegen. Von einem ersten politischen Kampfe konnte nicht mehr die Rede sein. Nur der

literarische Kampf blieb ihr übrig. Aber auch auf dem Gebiete der Literatur waren die alten Redensarten der Restaurationszeit unmöglich geworden. Um Sympathie zu erregen, mußte die Aristokratie scheinbar ihre Interessen aus den Augen verlieren und nur noch im Interesse der exploitirten Arbeiterklasse ihren Anklageakt gegen die Bourgeoisie formuliren. Sie bereitete sich so die Genugthuung vor, Schmähslieder auf ihren neuen Herrscher singen und mehr oder minder unheilswangere Prophezeiungen ihm in's Ohr raunen zu dürfen.

Auf diese Art entstand der feudalistische Socialismus, halb Klage lied, halb Pasquill, halb Rückhall der Vergangenheit, halb Dräuen der Zukunft, mitunter die Bourgeoisie in's Herz treffend durch bitteres, geistreich zerreisendes Urtheil, stets komisch wirkend durch gänzliche Unfähigkeit den Gang der modernen Geschichte zu begreifen.

Den proletarischen Bettlersack schwenkten sie als Fahne in der Hand, um das Volk hinter sich her zu versammeln. So oft es ihnen aber folgte, erblickte es auf ihrem Hintern die alten feudalen Wappen und verlief sich mit lautem und unerbittlichem Gelächter.

Ein Theil der französischen Legitimisten und das junge England gaben dies Schauspiel zum Besten.

Wenn die Feudalen beweisen, daß ihre Weise der Ausbeutung anders gestaltet war als die bürgerliche Ausbeutung, so vergessen sie nur, daß sie unter gänzlich verschiedenen und jetzt überlebten Umständen und Bedingungen ausbeuteten. Wenn sie nachweisen, daß unter ihrer Herrschaft nicht das moderne Proletariat existirt hat, so vergessen sie nur, daß eben die moderne Bourgeoisie ein notwendiger Sprößling ihrer Gesellschaftsordnung war.

Uebrigens verheimlichen sie den reaktionären Charakter ihrer Kritik so wenig, daß ihre Hauptanklage gegen die Bourgeoisie eben darin besteht, unter ihrem Regime entwickelte sich eine Klasse, welche die ganze alte Gesellschaftsordnung in die Luft sprengen werde.

Sie werfen der Bourgeoisie mehr noch vor, daß sie ein revolutionäres Proletariat, als daß sie überhaupt ein Proletariat erzeugt.

In der politischen Praxis nehmen sie daher an allen Gewaltmaßregeln gegen die Arbeiterklasse Theil, und im gewöhnlichen Leben bequemen sie sich, allen ihren aufgeblähten Redensarten zum Trotz, die goldenen Äpfel aufzufressen, und Treue, Liebe, Ehre mit dem Schacher in Schaafswolle, Munkelkräuben und Schnapps zu vertauschen.

Wie der Pfaffe immer Hand in Hand ging mit dem Feudalen, so der pfäffische Socialismus mit dem feudalistischen.

Nichts leichter als dem christlichen Ascetismus einen socialistischen Anstrich zu geben. Hat das Christenthum nicht auch gegen das Privateigenthum, gegen die Ehe, gegen den Staat geirret? Hat es nicht die Wohlthätigkeit und den Bettel, das Cölibat und die Fleischesertödtung, das Zellenleben und die Kirche an ihre Stelle gepredigt? Der heitige Socialismus ist nur das Weihwasser, womit der Pfaffe den Kerger des Aristokraten einsegnet.

11) Kleinbürgerlicher Socialismus.

Die feudale Aristokratie ist nicht die einzige Klasse, welche durch die Bourgeoisie gestürzt wurde, deren Lebensbedingungen in der modernen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erkümmerten und abstarben. Das mittelalterliche Pfahlbürgerthum und der kleine Bauernstand waren die Vorläufer der modernen Bourgeoisie. In den weniger industriell und kommerziell entwickelten Ländern vegetirt diese Klasse noch fort neben der aufkommenden Bourgeoisie.

In den Ländern, wo sich die moderne Civilisation entwickelt hat, hat sich eine neue Kleinbürgerschaft gebildet, die zwischen dem Proletariat und der Bourgeoisie schwebt und als ergänzender Theil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stets von Neuem sich bildet, deren Mitglieder aber beständig durch die Konkurrenz in's Proletariat hinabgeschleudert werden, ja selbst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roßen Industrie einen Zeitpunkt herannahen sehen, wo sie als selbstständiger Theil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gänzlich verschwinden, und im Handel, in der Manufaktur, in der Agrikultur durch Arbeitsaufseher und Domestiken ersetzt werden.

In Ländern wie in Frankreich, wo die Bauernklasse weit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Bevölkerung ausmacht, war es natürlich, daß Schriftsteller, die für das Proletariat gegen die Bourgeoisie auftraten, an ihre Kritik des Bourgeoisregime's den kleinbürgerlichen und kleinbäuerlichen Maaßstab anlegten und die Partei der Arbeiter vom Standpunkt des Kleinbürgertums ergriffen. Es bildete sich so der kleinbürgerliche Socialismus. Sismondi ist das Haupt dieser Literatur nicht nur für Frankreich sondern auch für England.

Dieser Socialismus zergliederte höchst scharfsinnig die Widersprüche in den modern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Er enthüllte die gleisnerischen Beschönigungen der Defonomen. Er wies unwiderleglich die zerstörenden Wirkungen der Maschinerie und der Theilung der Arbeit nach, die Koncentration der Kapitalien und des Grundbesitzes, die Ueberproduktion, die Krisen, den notwendigen Untergang der kleinen Bürger und Bauern, das Elend des Proletariats, die Anarchie in der Produktion, die schreienden Mißverhältnisse in der Verteilung des Reichthums, den industriellen Vernichtungskrieg der Nationen unter einander, die Auflösung der alten Sitten, der alten Familien-Verhältnisse, der alten Nationalitäten.

Seinem positiven Gehalte nach will jedoch dieser Socialismus entweder die alten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mittel wiederherstellen und mit ihnen die alt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 und die alte Gesellschaft, oder er will die modernen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mittel in den Rahmen der alt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 die von ihnen gesprengt werden, gesprengt werden mußten, gewaltsam wieder einsperren. In beiden Fällen ist er reaktionär und utopisch zugleich.

Zunfswesen in der Manufaktur und patriarchalische Wirtschaft auf dem Lande, das sind seine letzten Worte.

In ihrer weiteren Entwicklung hat sich diese Richtung in einen feigen Ragenjammer verlaufen.

c) Der deutsche oder der wahre Socialismus.

Die soc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Literatur Frankreichs, die unter dem Druck einer herrschenden Bourgeoisie entstand und der literarische Ausdruck des Kampfs gegen diese Herrschaft ist, wurde nach Deutschland eingeführt zu einer Zeit, wo die Bourgeoisie so eben ihren Kampf gegen den feudalen Absolutismus begann.

Deutsche Philosophen, Halbphilosophen und Schöngeister bemächtigten sich gierig dieser Literatur und vergaßen nur, daß bei der Einwanderung jener Schriften aus Frankreich die französischen Lebensverhältnisse nicht gleichzeitig nach Deutschland eingewandert waren. Den deutschen Verhältnissen gegenüber verlor die französische Literatur alle unmittelbar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nahm ein rein literarisches Aussehen an. Als müßige Spekulation über die wahre Gesellschaft, über die Verwirklichung des menschlichen Wesens mußte sie erscheinen. So hatten für die deutschen Philosophen des 18. Jahrhunderts die Forderungen der ersten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nur den Sinn, Forderungen der „prak-

tischen Vernunft" im Allgemeinen zu sein und die Willensäußerung der revolutionären französischen Bourgeoisie bedeuteten in ihren Augen die Befehle des reinen Willens, des Willens wie er sein muß, des wahrhaft menschlichen Willens.

Die ausschließliche Arbeit der deutschen Literaten bestand darin, die neuen französischen Ideen mit ihrem alten philosophischen Gewissen in Einklang zu setzen, oder vielmehr von ihrem philosophischen Standpunkt aus die französischen Ideen sich anzueignen.

Diese Aneignung geschah in derselben Weise, wodurch man sich überhaupt eine fremde Sprache aneignet, durch die Uebersetzung.

Es ist bekannt wie die Mönche Manuscripte, worauf die klassischen Werke der alten Heidenzeit verzeichnet waren, mit abgeschmackten katholischen Heiligengeschichten überschrieben. Die deutschen Literaten gingen umgekehrt mit der profanen französischen Literatur um. Sie schrieben ihren philosophischen Unsinn hinter das französische Original. Z. B. hinter die französische Kritik der Gelbverhältnisse schrieben sie „Entäußerung des menschlichen Wesens“, hinter die französische Kritik des Bourgeoisstaats schrieben sie „Aufhebung der Herrschaft des abstrakt Allgemeinen“ u. s. w.

Die Unterschiebung ihrer philosophischen Redensarten unter die französischen Entwicklungen taufte sie „Philosophie der That,“ „wahrer Socialismus,“ „Deutsche Wissenschaft des Socialismus,“ „Philosophische Begründung des Socialismus u. s. w.

Die französisch-socialistisch-kommunistische Literatur wurde so förmlich entmannt. Und da sie in der Hand des Deutschen aufhörte, den Kampf einer Klasse gegen die andere auszudrücken, so war der Deutsche sich bewußt, die französische Einseitigkeit überwunden, statt wahrer Bedürfnisse, das Bedürfnis der Wahrheit, und statt die Interessen des Proletariats die Interessen des menschlichen Wesens, des Menschen überhaupt vertreten zu haben, des Menschen, der keiner Klasse, der überhaupt nicht der Wirklichkeit, der nur dem Dunstbimmel der philosophischen Phantasie angehört.

Dieser deutsche Socialismus, der seine unbeholfene Schulübungen so ernst und feierlich nahm und so marktschreierisch ausposaunte, verlor indeß nach und nach seine pedantische Unschuld.

Der Kampf der deutschen namentlich der preussischen Bourgeoisie gegen die Feudalen und das absolute Königthum, mit einem Wort, die liberale Bewegung wurde ernsthafter.

Dem wahren Socialismus war so erwünschte Gelegenheit geboten, der politischen Bewegung die socialistischen Forderungen gegenüber zu stellen.

Die überlieferten Anatheme gegen den Liberalismus, gegen den Repräsentativstaat, gegen die bürgerliche Konkurrenz, bürgerliche Pressfreiheit, bürgerliches Recht, bürgerliche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zu schleudern und der Volksmasse vorzupredigen, wie sie bei dieser bürgerlichen Bewegung nichts zu gewinnen, vielmehr Alles zu verlieren habe. Der deutsche Socialismus vergaß rechtzeitig, daß die französische Kritik, deren geistloses Echo er war, die 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mit den entsprechenden materiellen Lebensbedingungen und der angemessenen politischen Konstitution voraussetzt, lauter Voraussetzungen, um deren Erkämpfung es sich erst in Deutschland handelte.

Er diente den deutschen absoluten Regierungen mit ihrem Gefolge von Pfaffen, Schulmeistern, Krautjüngern und Bürokraten als erwünschte Vogel-scheuche gegen die drohend auftretende Bourgeoisie.

Er bildete die süßliche Ergänzung zu den bitteren Peitschenhieben und Flintenlugeln, womit dieselben Regierungen die deutschen Arbeiter-Aussände bearbeiteten.

Ward der wahre Socialismus dergestalt eine Waffe in der Hand der Regierungen gegen die deutsche Bourgeoisie, so vertrat er auch unmittelbar ein reactionäres Interesse, das Interesse der deutschen Pfahlbürgererschaft. In Deutschland bildet das vom sechzehnten Jahrhundert her überlieferte und seit der Zeit in verschiedener Form hier immer neuwieder auftauchende Kleinbürgertum die eigentliche gesellschaftliche Grundlage der bestehenden Zustände.

Seine Erhaltung ist die Erhaltung der bestehenden deutschen Zustände. Von de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Herrschaft der Bourgeoisie fürchtet es den sichern Untergang, einer Seits in Folge der Koncentration des Kapitals, anderer Seits durch das Aufkommen eines revolutionären Proletariats. Der wahre Socialismus schien ihm beide Fliegen mit einer Klappe zu schlagen. Er verbreitete sich wie eine Epidemie.

Das Gewand, gewirkt aus spekulativem Spinnweb, überstekt mit schöngeistigen Redebäumen, durchtränkt von liebeschwülen Gemüthsthan, dies überschwängliche Gewand, worin die deutschen Socialisten ihre paar knöchernen ewigen Wahrheiten einhüllten, vermehrte nur den Absatz ihrer Waare bei diesem Publikum.

Seiner Seits erkannte der deutsche Socialismus immer mehr seinen Verus, der hochtrabende Vertreter dieser Pfahlbürgererschaft zu sein.

Er proklamirte die deutsche Nation als die normale Nation und den deutschen Spießbürger als den Normal-Menschen. Er gab jeder Niedertracht desselben einen verborgenen höheren socialistischen Sinn, worin sie ihr Gegentheil bedeutete. Er zog die letzte Konsequenz, indem er direkt gegen die rohdestruktive Richtung des Kommunismus auftrat, und seine unparteiische Erhabenheit über alle Klassenkämpfe verkündete. Mit sehr wenigen Ausnahmen gehören alles, was in Deutschland von angeblich soc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Schriften cirkulirt, in den Bereich dieser schmutzigen entnervenden Literatur.

2) Der konservative oder Bourgeois-Socialismus.

Ein Theil der Bourgeoisie wünscht den socialen Mißständen abzuhelfen, um den Bestand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zu sichern.

Es gehören hierher, Oekonomisten, Philantropen, Humanitäre, Verbesserer der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Wohlthätigkeits-Organisierer, Abschaffer der Thierquälerei, Mäßigkeits-Bereinstifter, Winkelreformer der buntscheckigsten Art. Und auch zu ganzen Systemen ist dieser Bourgeois-Socialismus angearbeitet worden.

Als Beispiel führen wir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an.

Die socialistischen Bourgeois wollen die Lebensbeding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ohne die nothwendig daraus hervorgehenden Kämpfe und Gefahren. Sie wollen die bestehende Gesellschaft mit Abzug der sie revolutionirenden und sie auflösenden Elemente. Sie wollen die Bourgeoisie ohne das Proletariat. Die Bourgeoisie stellt sich die Welt, worin sie herrscht, natürlich als die beste Welt vor. Der Bourgeois-Socialismus arbeitet diese tröstliche Vorstellung zu einem halben oder ganzen System aus. Wenn er das Proletariat auffordert seine Systeme zu verwirklichen, um in das neue Jerusalem einzugehen, so verlangt er im Grunde nur, daß es in der jetzigen Gesellschaft stehen bleibe, aber seine gehässigen Vorstellungen von derselben abstreife.

Eine zweite, weniger systematische und mehr praktische Form des Socialismus suchte der Arbeiterklasse jed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zu verleiden, durch den Nachweis, wie nicht diese oder jene politische Veränderung, sondern nur eine Veränderung der materiellen Lebensverhältnisse, der ökonomischen Ver-

hältnisse ihr von Nutzen sein könne. Unter Veränderung der materiellen Lebensverhältnisse versteht dieser Socialismus aber keineswegs Abschaffung der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die nur auf revolutionärem Wege möglich ist, sondern administrative Verbesserungen, die auf dem Boden dies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vor sich gehen; also an dem Verhältniß von Kapital und Lohnarbeit nichts ändern, sondern im besten Fall der Bourgeoisie die Kosten ihrer Herrschaft vermindern und ihren Staatshaushalt vereinfachen.

Seinen entsprechenden Ausdruck erreicht der Bourgeois-Socialismus erst da, wo er zur bloßen rednerischen Figur wird.

Freier Handel! im Interess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Schutzzölle! im Interess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Zellengefängnisse! im Interess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das ist das letzte, das einzig ernst gemeinte Wort des Bourgeois-Socialismus.

Ihr Socialismus besteht eben in der Behauptung, daß die Bourgeois Bourgeois sind—im Interess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3) Der kritisch-utopistische Soc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Wir reden hier nicht von der Literatur, die in allen großen modernen Revolutionen die Forderungen des Proletariats aussprach (Schriften Babeus u. s. w.).

Die ersten Versuche des Proletariats in einer Zeit allgemeiner Aufregung, in der Periode des Umsturzes der feudalen Gesellschaft direkt sein eigenes Klasseninteresse durchzusetzen, scheiterten nothwendig an der unentwickelten Gestalt des Proletariats selbst, wie an dem Mangel der materiellen Bedingungen seiner Befreiung, die eben erst das Produkt der bürgerlichen Epoche sind. Die revolutionäre Literatur, welche diese ersten Bewegungen des Proletariats begleitete, ist dem Inhalt nach nothwendig reaktionär. Sie lehrt einen allgemeinen Ascetismus und eine rohe Gleichmacherei.

Die eigentlich soc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Systeme, die Systeme St. Simons, Fourriers, Owens u. s. w. tauchen auf in der ersten unentwickelten Periode des Kampfs zwischen Proletariat und Bourgeoisie, die wir oben dargestellt haben. (S. Bourgeoisie und Proletariat.)

Die Erfinder dieser Systeme sehen zwar den Gegensatz der Klassen, wie die Wirksamkeit der auflösenden Elemente in der herrschenden Gesellschaft selbst. Aber sie erblicken auf der Seite der Proletariats keine geschichtliche Selbstthätigkeit, keine ihm eigenthümliche politische Bewegung.

Da die Entwicklung des Klassen Gegensatzes gleichen Schritt hält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 finden sie eben so wenig die materiellen Bedingungen zur Befreiung des Proletariats vor, und suchen nach einer socialen Wissenschaft, nach socialen Gesetzen, um diese Bedingungen zu schaffen.

An die Stel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Thätigkeit muß ihre persönlich erfinderische Thätigkeit treten, an die Stelle der geschichtlichen Bedingungen der Befreiung phantastische, an die Stelle der allmählig vor sich gehenden Organisation des Proletariats zur Klasse eine eigens ausgebeutete Organisation der Gesellschaft. Die kommende Weltgeschichte löst sich für sie auf in die Propaganda und die praktische Ausführung ihrer Gesellschaftspläne.

Sie sind sich zwar bewußt in ihren Plänen hauptsächlich das Interess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als der leidendsten Klasse zu vertreten. Nur unter diesem Gesichtspunkt der leidendsten Klasse existirt das Proletariat für sie.

Die unentwickelte Form des Klassenkampfes, wie ihre eigene Lebenslage bringen es aber mit sich, daß sie weit über jenen Klassen Gegensatz erhaben zu sein glauben. Sie wollen die Lebenslage aller Gesellschaftsglieder, auch

der bestgestellten verbessern. Sie appelliren daher fortwährend an die ganze Gesellschaft ohne Unterschied, ja vorzugsweise an die herrschende Klasse. Man braucht ihr System ja nur zu verstehen, um es als den bestmöglichen Plan der bestmöglichen Gesellschaft anzuerkennen.

Sie verwerfen daher alle politische, namentlich alle revolutionäre Aktion, sie wollen ihr Ziel auf friedlichem Wege erreichen und versuchen durch kleine natürlich, fehlschlagende Experimente, durch die Macht des Beispiels dem neuen gesellschaftlichen Evangelium Bahn zu brechen.

Diese phantastische Schilderung der zukünftigen Gesellschaft entspricht in einer Zeit, wo das Proletariat noch höchst unentwickelt ist, also selbst noch phantastisch seine eigene Stellung auffaßt, seinem ersten ahnungsvollen Drängen nach einer allgemeinen Umgestaltung der Gesellschaft.

Die soc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Schriften bestehen aber auch aus kritischen Elementen. Sie greifen alle Grundlagen der bestehenden Gesellschaft an. Sie haben daher höchst werthvolles Material zur Aufklärung der Arbeiter geliefert. Ihre positiven Sätze über die zukünftige Gesellschaft, z. B., Aufhebung des Gegensatzes von Stadt und Land, der Familie, des Privatwerbes, der Lohnarbeit, die Verkünd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Harmonie, die Verwandlung des Staats in eine bloße Verwaltung der Produktion—alle diese ihre Sätze drücken bloß das Wegfallen des Klassengegensatzes aus, der eben erst sich zu entwickeln beginnt, den sie nur noch in seiner ersten gestaltlosen Unbestimmtheit kennen. Diese Sätze selbst haben daher noch einen rein utopistischen Sinn.

Die Bedeutung des kritischen utopistischen Soc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steht im umgekehrten Verhältnis zu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In demselben Maße, worin der Klassenkampf sich entwickelt und gestaltet, verliert diese phantastische Erhebung über denselben, diese phantastische Bekämpfung desselben, allen praktischen Werth, alle theoretische Berechtigung. Waren daher die Urheber dieser Systeme auch in vieler Beziehung revolutionär, so bilden ihre Schüler jedes Mal reaktionäre Sekten. Sie halten die alten Anschauungen der Meister fest gegenüber der geschichtlichen Fortentwicklung des Proletariats. Sie suchen daher konsequent den Klassenkampf wieder abzustumpfen und die Gegensätze zu vermitteln. Sie träumen noch immer die versuchsweise Verwirklichung ihrer gesellschaftlichen Utopien, Stiftung einzelner Phalanxere, Gründung von home-Colonien, Errichtung eines kleinen Scariens,—Duodez-Ausgabe des neuen Jerusalems—und zum Aufbau aller dieser spanischen Schlösser müssen sie an die Philantropie der bürgerlichen Herzen und Geldsäcke appelliren. Allmählig fallen sie in die Kategorie der oben geschilderten reaktionären oder konservativen Socialisten, und unterscheiden sich nur mehr von ihnen durch mehr systematische Pedanterie, durch den fanatischen Aberglauben an die Wunderwirkungen ihrer socialen Wissenschaft.

Sie treten daher mit Erbitterung aller politischen Bewegung der Arbeiter entgegen, die nur aus blindem Unglauben an das neue Evangelium hervorgehen konnte.

Die Owenisten in England, die Fourieristen in Frankreich, reagiren dort gegen die Chartisten, hier gegen die Reformisten.

IV.

Stellung der Kommunisten zu den verschiedenen oppositionellen Parteien.

Nach Abschnitt 2 versteht sich das Verhältnis der Kommunisten zu den bereits konstituirten Arbeiterparteien von selbst, also ihr Verhältnis zu den Chartisten in England und den agrarischen Reformern in Nordamerika.

Sie kämpfen für die Erreichung der unmittelbar vorliegenden Zwecke und Interessen der Arbeiterklasse, aber sie vertreten in der gegenwärtigen Bewegung zugleich die Zukunft der Bewegung. In Frankreich schließen sich die Kommunisten an die sozialistisch-demokratische Partei an gegen die konservative und radikale Bourgeoisie, ohne darum das Recht aufzugeben sich kritisch zu den aus der revolutionären Ueberlieferung herrührenden Phrasen und Illusionen zu verhalten.

In der Schweiz unterstützen sie die Radikalen, ohne zu verkennen, daß diese Partei aus widersprechenden Elementen besteht, theils au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ten im französischen Sinn, theils aus radikalen Bourgeois.

Unter den Polen unterstützen die Kommunisten die Partei, welche eine agrarische Revolution zur Bedingung der nationalen Befreiung macht. Dieselbe Partei, welche die Krakauer Insurrektion von 1846 in's Leben rief.

In Deutschland kämpft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sobald die Bourgeoisie revolutionär auftritt, gemeinsam mit der Bourgeoisie gegen die absolute Monarchie, das feudale Grundeigenthum und die Kleinbürgerei.

Sie unterläßt aber keinen Augenblick bei den Arbeitern ein möglichst klares Bewußtsein über den feindlichen Gegensatz von Bourgeoisie und Proletariat herauszuarbeiten, damit die deutschen Arbeiter sogleich die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Bedingungen, welche die Bourgeoisie mit ihrer Herrschaft herbeiführen muß, als eben so viele Waffen gegen die Bourgeoisie kehren können, damit, nach dem Sturz der reaktionären Klassen in Deutschland, sofort der Kampf gegen die Bourgeoisie selbst beginnt.

Auf Deutschland richten die Kommunisten ihre Hauptaufmerksamkeit, weil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einer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steht, und weil es diese Umwälzung unter fortgeschritteneren Bedingungen der europäischen Civilisation überhaupt, und mit einem viel weiter entwickelten Proletariat vollbringt als England im siebzehnten und Frankreich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die deutsch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also nur das unmittelbare Vorspiel ein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sein kann.

Mit einem Wort, die Kommunisten unterstützen überall jed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gegen die bestehenden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Zustände.

In allen diesen Bewegungen heben sie die Eigenthumsfrage, welche mehr oder minder entwickelte Form sie auch angenommen haben möge, als die Grundfrage der Bewegung hervor.

Die Kommunisten arbeiten endlich überall an der Verbindung und Verständigung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aller Länder.

Die Kommunisten verschmähen es, ihre Ansichten und Absichten zu verheimlichen. Sie erklären es offen, daß ihre Zwecke nur erreicht werden können durch den gewaltsamen Umsturz all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sordnung. Mögen die herrschenden Klassen vor einer kommunistischen Revolution zittern. Die Proletarier haben nichts in ihr zu verlieren als ihre Ketten. Sie haben eine Welt zu gewinnen.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Diese originalgetreue Reproduktion
der Erstausgabe
des Manifest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wurde vom
DIETZ VERLAG BERLIN
anlässlich seines 20jährigen Bestehens
im Juli 1965 herausgegeben
und im Lichtdruck von der
Druckerei C.G. Röder in Leipzig
hergestellt

Dietz Verlag Berlin
Printed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Lizenznummer 1



1882 年俄文版 《共产党宣言》

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

由俄国民主革命者普列汉诺夫翻译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par Karl MARX et Fr. ENGELS

РУССКАЯ СОЦІАЛЬНО-РЕВОЛЮЦІОННАЯ ВИБЛІОТЕКА

Книги Третья

МАНИФЕСТ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и Фр. Энгельса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ИЗДАВАНІЯ 1872.

СЪ ПРЕДИСЛОВІЕМЪ АВТОРОВЪ

Prix 1 Fr.

ЖЕНЕВА

Вольная Рус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ія.

1882

РУССКАЯ СОЦІАЛЬНО-РЕВОЛЮЦІОННАЯ БІБЛІОТЕКА

Книга Третья

— □ # □ —

МАНИФЕСТ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и Фр. Энгельса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ИЗДАВАНІЯ 1872.

СЪ ПРЕДИСЛОВІЕМЪ АВТОРОВЪ

ЖЕНЕВА

Вольная Рус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ія.

1882

НѢКОЛЬКО СЛОВЪ ОТЪ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Имена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и Фридриха Энгельса — пользуются у насъ такою громкою и почетною извѣстностью, что говорить о научныхъ достоинствахъ „Манifest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 значитъ повторять всею извѣстную истину. Въмѣстѣ съ другими сочиненіями его авторовъ, „Манifestъ“ открываетъ новую эпоху въ исторі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эпоху безпощадной кри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труда къ капиталу и чуждаго всякихъ утопій, научнаго обоснованія социализма. Едва ли нужно, поэтому, объяснять мотивы, побудившіе „Русскую Соціально-Револуціонную Библиотеку“ издать „Манifestъ“ на русскомъ языкѣ.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ышедшій въ шестидесятыхъ годахъ русскій переводъ ег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ъ собою теперь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ую рѣдкость, въ полномъ смыслѣ этого слова. Кромя того, въ переводъ этотъ закралось, какъ намъ кажется, нѣсколько неточностей, мѣшавшихъ правильному пониманію мыслей авторовъ. Мы рѣшились сдѣлать новый переводъ этого великаго, хотя и не объемиста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ія, которое разошлось въ огромномъ количествѣ экземпляровъ во всехъ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хъ странахъ, и несомнѣнно получило бы еще больше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іе, если бы 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хъ классовъ продолжали интересоваться наукой даже въ томъ случаѣ, когда выводы ея противорѣчатъ ихъ интересамъ и предразсудкамъ.

Намъ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изданіе русскаго перевода „Манifest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не только полезно, но 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русс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іе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уже выступило на путь открытой борьбы съ абсолютизмомъ, и вопросъ о значеніи и задачах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ѣ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шей парті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жгучимъ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ъ вопросомъ. Взаимн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связ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ъ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ъ интересовъ трудящихся указаны въ „Манifestѣ“ съ полною

ясностью. Авторы его сочувствуют „всякому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му движенію противъ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Но, отстаивая ближайші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я цѣли всякаго революціоннаго движенія, они въ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е упускаютъ изъ виду его „будущ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Манифестъ“ можетъ предостеречь русскихъ социалстовъ отъ двухъ одинаково печальныхъ крайностей: отрицательнаго отношенія к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ѣятельности съ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забвенія будущихъ интересовъ партій—съ другой. Люди, склонные къ первой изъ упомянутыхъ крайностей, убѣдятся въ томъ, что „всякая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есть борьб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что отказываться отъ активной борьбы съ современнымъ русскимъ абсолютизмомъ значитъ косвеннымъ образомъ его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Съ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Манифестъ“ показываетъ, что успехъ борьбы всякаго класса вообще, а рабочаго въ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зависитъ отъ объединенія этого класса и яснаго сознанія имъ своихъ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ъ интересовъ. Отъ организаціи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и непрестаннаго выясненія ему „враждебной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и“ его интересовъ съ интересами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хъ классовъ—зависитъ будущность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ія, которую,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иносить въ жертву интересамъ данной минуты.

Основанія этой организаціи русскаго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могутъ быть заложены уже въ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усс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іе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ся уже предѣлами того слоя, который принято называть учащеюся молодежью, мыслящимъ пролетариатомъ и т. п. Рабочіе нашихъ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ъ центровъ, въ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ачинаютъ „мыслить“ и стремиться къ своему освобожденію.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сѣ преслѣдовані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тайны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ія организаціи рабочихъ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разрушаются, но принимаютъ все болѣе широкіе размѣры. Възрѣтъ съ этимъ расширяетс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растетъ спросъ на популярныя брошюры, излагающія основныя положенія социализма. Было бы очень желательно, чтобы имѣющая возникнуть рус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ставила себя задачей популяризацию ученій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минуя окольные пути болѣе или менѣе искаженнаго прудонизма.

Правда, у насъ до сихъ поръ еще довольно сильн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о убѣжденіе въ томъ, что задачи русскихъ социалстовъ су-

ественно отличаются от задач их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товарищей. Но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 томъ, чт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ая цель должна быть одинакова дл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ъ всехъ странъ,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іе нашихъ социалистовъ къ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ъ русска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возможно лишь при правильномъ понимані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развитія. Сочиненія же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ъ собою незамѣнимый источникъ для изучені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Запада.

Скажемъ теперь нѣсколько словъ о „приложеніяхъ“, помѣщенныхъ нами въ концѣ книги. Въ своемъ предисловіи къ немецкому изданію 1872 года, авторы „Манифеста“ указываютъ на опытъ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показавшей, что рабочій классъ не можетъ просто овладѣть готов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ашиной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ею для своихъ собственныхъ цѣлей.“ При этомъ они ссылаются на брошюру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о Франціи“, въ которой вопросъ о развитіи и значені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раз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подробно. Въ виду того, что русское изданіе этой брошюры теперь уже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азошлось, мы рѣшились приложить къ „Манифесту“ переводъ указанного авторами мѣста изъ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во Франціи“.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Уста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ъ, то мы считали его интереснымъ дополненіемъ къ Манифест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знаменит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ъ собою въ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плодотворный опытъ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іи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на началахъ, впервые развитыхъ въ Манифестѣ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Рабочихъ сдѣлало свое дѣло, скрѣпивши „братскими узлами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ія партіи всего міра.

Г. Плехановъ.

ПРЕДИСЛОВІЕ АВТОРОВЪ

къ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ію.

Первое русское изданіе „Манифес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въ переводѣ Бакунина, появилось въ началѣ шестидесятыхъ годовъ, въ типографіи „Колокола“. Въ то время русское изданіе манифеста могло казаться на Западѣ не болѣе, какъ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ъ курьезомъ. Въ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такой взглядъ былъ бы уже невозможенъ. До к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область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ія имѣло, въ періодъ перваго появленія манифеста (Декабрь 1847 г.), движеніе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лучше всего показываетъ послѣдняя его глава: „Отношеніе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къ различнымъ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мъ партіямъ въ различныхъ странахъ.“ Въ ней недостаетъ именно Россіи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ъ Штатовъ. Это был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Россія являлась послѣднимъ большимъ резервомъ всей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еакціи. Эмиграція въ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поглощала излишекъ силъ европейскаг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Обѣ эти страны снабжали Европу сырьемъ и служили въ тоже время рынкомъ для сбыта ея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ъ произведеній. Обѣ онѣ являлись,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такъ или иначе, оплотомъ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строя Европы.

До к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измѣнилось это теперь! Именно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ія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а колосса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ію земледѣлія въ Сѣверной Америкѣ, которое, своей конкуренціей, колеблетъ крупное и мелкое европейское землевладѣніе въ самыхъ его основаніяхъ. Она

УП

дала, кромѣ того, Соединеннымъ Штатамъ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зяться за эксплуатацію ихъ богатыхъ источниковъ промышленнаго развитія въ такихъ размѣрахъ и съ такою энергіей, которые въ короткое время должны положить конецъ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монополіи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Оба эт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воздѣйствуютъ, въ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мъ смыслѣ, и на Америку. Мелкая и средняя поземель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фермеровъ, основа всего е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го строя, побѣждается мало по малу конкуренціей громаднхъ фермъ; въ тоже время въ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ъ округахъ впервы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й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и баснословная концентрація капиталовъ.

Перейдемъ къ Россіи. Въ періодъ революціи 1848—49 года не только европейскіе монархи, но и европейскіе буржуа находили въ русскомъ вмѣшательствѣ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спасеніе противъ только-что собравшагося съ силам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Царя провозгласили главою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еакціи. Теперь онъ—содержащійся въ Гатчинѣ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й революціи, и Россі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ъ собою передовой отрядъ революціоннаго движенія въ Европѣ.

Задаче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го манифеста было провозгласить неизбежно—предстоящее разложені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о, рядомъ съ быстро развивающейс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горячкой и только теперь образующейся буржуазной поземе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ю, мы находимъ въ Россіи большую половину земли въ общинномъ владѣніи крестьянъ.

Спрашивается теперь: можетъ ли русская община—эта, правда, сильно уже разрушенная форма первобытнаго коллективнаго владѣнія землею—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ерейти въ высшую,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ую форму зем-

VIII

длевладнія? Или, напротив, она должна пройти сначала тот же процесс разложения, который определил собо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Запада?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возможный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твет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м. Есл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послужит сигналом рабоче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 Западе, так что обе они пополня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то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усск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 может явиться исходным пункт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арль Марксъ. Фридрихъ Энгельсъ.

Лондонъ, 21 Января 1882 г.

ПРЕДИСЛОВІЕ АВТОРОВЪ

къ нѣмецкому изданію 1872 года.

„Союзъ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рабоч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оторая при тогдашнихъ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ъ, разумѣется, могла быть только тайной, поручила нижеподписавшимся, на Лондонскомъ конгрессѣ въ Ноябрь 1847, написать подробную,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ую для опубликовані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и практическ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партіи.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появился слѣдующій ниже манифестъ, рукопись котораго была отправлена въ Лондонъ для напечатанія за нѣсколько недель до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і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й сначала по-нѣмецки, онъ выдержалъ на этомъ языкѣ, по крайней мѣрѣ, двѣнадцать различныхъ изданій въ Германіи, Англіи и Америкѣ. На англійскомъ языкѣ онъ появился сначала въ 1850 году въ Лондонскомъ Red Republican, въ переводѣ миссъ Елены Макферленъ (Macfarlane), и затѣмъ въ 1871 году, по меньшей мѣрѣ, въ трехъ различныхъ переводахъ въ

Америкѣ.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мъ языкѣ онъ появился въ первый разъ въ Парижѣ, незадолго до Юньскаго возстанія 1848 года, потомъ въ Нью-Йоркскомъ изданіи *Le Socialiste*. Теперь готовится новый переводъ. По польски онъ былъ напечатанъ вскорѣ послѣ перваго нѣмецкаго изданія. По русски — въ шестидесятыхъ годахъ въ Женевѣ. Датскій переводъ вышелъ въ свѣтъ тоже вскорѣ послѣ его появленія.

Хот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я отношені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измѣнились въ теченіе послѣдняго 25-лѣтія, но развитія въ этомъ Манифестѣ общія положенія, въ цѣломъ, сохранили все свое значеніе и 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ѣкоторыя же частности нуждались бы въ поправкахъ.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примѣненіе этихъ общихъ положеній, какъ гласитъ самъ манифестъ, должно всегда и вездѣ находиться въ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ъ исторически-сложившихся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ъ. Поэтому не нужно придавать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го значенія предлагаемымъ въ концѣ II-ой главы революціоннымъ мѣрамъ. Это мѣсто должно бы было, въ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змѣнить во многихъ отношеніяхъ. Въ виду громаднаго развитія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ъ последнее двадцатипятилѣтіе и связанныхъ съ нимъ успѣховъ организаціи рабочаго сословія въ особую партію; въ виду практическаго опыта, во первыхъ,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іи и еще болѣе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 гдѣ въ первый разъ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ласть была, въ продолженіе двухъ мѣсяцевъ, въ руках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 упомянутая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мѣстами уже устарѣла. Именно Парижская Коммуна доказала, что „рабочій классъ не можетъ просто овладѣть готов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ашиной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ею для своихъ собственныхъ цѣлей“. (См.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во Франціи“, отчетъ Генеральнаго Совѣ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Рабочей Ассоціаціи, 19 стр. нѣмецкаго изданія, гдѣ это развито подробнѣе*). Далѣе,

*) Смотр. Приложені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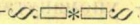
само собою разумеется, что критик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еполна для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такъ какъ она доходитъ лишь до 1847 года.

Точно также и замѣчания объ отношені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къ различнымъ оппозиціоннымъ партіямъ (глава IV), и теперь еще вѣрныя въ общемъ, въ подробностяхъ своихъ уже потому оказываются устарѣвшими, ч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ія отношенія теперь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змѣнились, и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перечисленныхъ тамъ партій самимъ ходомъ историческаго развитія устранена съ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арены.

Но „Манифестъ“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ъ собою историческій документъ, измѣнять который мы не считаемъ уже себя въ правѣ. Быть можетъ, къ слѣдующему изданію его будетъ прибавлено введеніе, обнимающее промежутокъ отъ 1847 года до настояща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этотъ разъ изданіе его было предпринято слишкомъ неожиданно для насъ, чтобы мы могли имѣ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для этого время.

Карль Марксъ. Фридрихъ Энгельсъ.

Лондонъ, 24 Июня 1872 г.



МАНИФЕСТ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Въ Европѣ появился страшный призракъ — призракъ коммунизма. Всѣ силы старой Европы — папа и царь, Меттернихъ и Гизо, французскіе радикалы и нѣмецкіе полицейскіе — соединились между собою для священной травли этого призрака.

Существуетъ-ли хоть одна оппозиціонная партія, которую не обозвали б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 стоящіе у власти—ея противники? Существуетъ-ли хоть одна оппозиціонная партія, которая, въ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е посылала бы упрека въ коммунизмъ какъ болѣе передовымъ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ъ оппозиціи, такъ и реакціоннымъ своимъ противникамъ?

Изъ этог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вытекаетъ два вывода.

Коммунизмъ признается уже силою со стороны всѣхъ прочи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силъ Европы.

Давно уже пора коммунистамъ передъ цѣлымъ міромъ, открыто изложить свой образъ мыслей, свои цѣли и стремленія, и сказкамъ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ъ призракѣ—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ть манифестъ сам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Съ этою цѣлью коммунисты различныхъ національностей собрались въ Лондонѣ и составили слѣдующій манифестъ, для опубликованія его на англійскомъ, французскомъ, нѣмецкомъ, италіянскомъ, фламандскомъ и датскомъ языкахъ.

Буржуа и Пролетаріи

Исторія всѣхъ донинѣ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ъ обществъ есть исторія борьбы классовъ.

Свободный и рабъ, патрицій и плебей, средневѣковый баронъ и крѣпостной, цеховой мастеръ и подмастерье, угнетатель и угнетаемый — находились въ вѣчной враждѣ другъ съ другѣмъ, вели непрерывную, то скрытую, то явную борьбу, всегда кончавшуюся революціоннымъ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омъ все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зданія, или совмѣстною гибелью борющихся классовъ.

Въ историческія эпохи,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ія нашей, мы находимъ почти повсюду полное расчлененіе общества на различныя сословія, — цѣлую лѣстницу различны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положеній. Въ древнемъ Римѣ мы встречаемъ патриціевъ, всадниковъ, плебеевъ и рабовъ. Въ Средніе Вѣка появляются сюзерены, вассалы, цеховые мастера, подмастерья и крѣпостные. И въ каждомъ изъ этихъ классовъ существуютъ еще особыя подраздѣленія.

Выросшее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ъ феодализм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е уничтожило различія классовъ. Оно поставило только новые классы на мѣсто старыхъ, выработало новые способы угнетенія и новые виды борьбы.

Впрочемъ наша эпоха, эпоха буржуазіи, отличается тѣмъ, что она упростила различі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положеній. Общество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раздѣляется на два большіе враждебные лагеря, на два большіе стоящіе другъ противъ друга класса: буржуазію 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Изъ средневѣковыхъ крѣпостныхъ образовалось мѣщанское населеніе первыхъ городовъ; изъ этого мѣщанства развились первые элементы буржуазіи.

Открытіе Америки и морскаго пути вокругъ Африки

создало новое поприще для растущей буржуазіи. Ост-индскій и китайскій рынки, колонизація Америки, торговля съ колоніями, увеличеніе количества орудій обращенія (драгоцѣнныхъ металловъ) и вообще товаровъ, — дали неслыханный до тѣхъ поръ толчекъ торговлѣ, мореплаванію,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ѣмъ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скорили развитіе революціоннаго элемента въ разлагавшемся феодальномъ обществѣ.

Тогдашній феодальный, или цеховой способ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е въ состояніи былъ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ь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ъ новыхъ рынковъ. Мѣсто его заняла мануфактура. Цеховые мастера вытѣснены были промышленнымъ среднимъ сословіемъ; раздѣленіе труда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корпораціями исчезло передъ раздѣленіемъ труда внутри самой мастерской.

Но рынокъ все болѣе расширялся, спросъ постоянно увеличивался. Мануфактурный способ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ъ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оказался неуд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ьнымъ. Тогда паръ и машины произвели революцію въ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Мѣсто мануфактуры заняла нынѣшняя круп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мѣсто средняго сословія — миллионеры-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и, предводители цѣлыхъ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ъ армій,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буржуа.

Круп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оздала всемірный рынокъ,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открытіемъ Америки. Всемірный рынокъ вызвалъ громадное развитіе торговли, мореплаванія и средствъ сухопутнаго сообщенія. Это снова повліяло на развиті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въ той же пропорціи въ какой росл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торговля, мореплаваніе и желѣзныя дороги,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буржуазія, увеличивались ея капиталы, и она отодвигала на задній планъ все классы стараго, средневѣков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Мы видимъ,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что буржуазія сама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ъ длиннаго хода развитія, цѣлаго ряда переворотовъ въ способах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обмѣна. Каждая изъ этихъ ступеней развитія буржуазіи сопровождалась соотвѣтствующими 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завоеваніями. Буржуазія, которая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собою то угнетенное подъ игомъ феодаловъ сословіе, то вооруженную

и самоуправляющуюся ассоціацію въ городской комунѣ, здѣсь независимую городск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тамъ третье, податное сословіе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вившаяся, затѣмъ, противовѣсомъ дворянству въ монархіи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ли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сословнымъ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мъ — буржуазія, вообще послужившая главной основой большихъ монархій, завоевала себя, наконецъ, съ появленіемъ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всемірнаго рынка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ласть въ новѣйшемъ конституціонно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ѣ.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есть не болѣе, какъ комитетъ, выбранный для завѣдывані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дѣлами буржуазіи.

Буржуазія играла въ исторіи въ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революціонную роль.

Всюду, гдѣ она достигла господства, буржуазія разрушила все старыя, патріархально-идиллическія отношенія. Она безжалостно разорвала пестрыя феодальныя нити, связывавшія человека съ его повелителями, и не оставила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никакой связи, кромѣ голаго интереса, безсердечнаго „чистогана“. Въ холодной водѣ эгоистическаго разчета потопила она порывы набожной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и, рыцарскаго воодушевленія и мѣщанской санти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Она превратила въ мѣновую стоимость личн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человека, и на мѣсто безчисленнаго множества видовъ благопріобрѣтенной и патентованной свободы, поставила одну, чуждую идеальныхъ соображеній, свободу торговли. Словомъ, эксплуатацію, прикрытую религіозным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иллюзіями, она замѣнила эксплуатаціей прямой, открытой, сухой и безстыдной.

Буржуазія лишила обаянія все тѣ роды дѣ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которые до тѣхъ поръ смотрѣли съ благоговѣйнымъ почтеніемъ. Врачъ, юристъ, священникъ, поэтъ, человекъ науки — сдѣлались ея наемными работниками.

Буржуазія сорвала съ семей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ихъ нѣжно-сантиментальный покровъ и превратила ихъ въ дѣло простаго денежнаго разчета.

Буржуазія разоблачила ту лѣнливую неподвиж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составлял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дополненіе грубаго средневѣковаго проявленія силы, до сихъ поръ воехнщающаго реакціонеровъ. Только она показала, какіе плоды можетъ приносить человѣческая дѣятельность. Чудеса ея искусств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отличаются отъ египетскихъ пирамидъ, римскихъ водопроводовъ и готическихъ соборовъ, ея завоеванія не имѣютъ ничего общаго съ переселеніями народовъ и крестовыми походами.

Буржуазія не можетъ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не вызывая постоянныхъ переворотовъ въ орудіях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ъ его организаціи, а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во всѣ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яхъ. Неизмѣнное сохраненіе старыхъ способов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было, напротивъ, первымъ условіемъ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всѣхъ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хъ 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ъ классовъ. Постоянные перевороты в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ѣ, непрерывное потрясеніе всѣ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вѣчное движеніе и вѣчная неуверенность — отличаютъ буржуазную эпоху отъ всѣхъ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хъ. Всѣ прочныя, окаменѣлыя отношенія, съ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имъ, изстари установившимися воззрѣніями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ями, — разрушаются, всѣ вновь образовавшіяся оказываются устарѣлыми прежде, чѣмъ успѣваютъ окостенѣть. Все сословное и недвижимое исчезаетъ, все священное оскверняется, и люди приходятъ, наконецъ, къ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взглянуть трезвыми глазами на свои взаимныя отношенія и свое жизн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іе.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ъ постоянно возрастающемъ сбытѣ для ея продуктовъ заставляетъ буржуазію обѣгать весь земной шаръ. Она должна проникать, вѣдраться и заводить сношенія повсюду.

Своей эксплуатаціей всемірнаго рынка буржуазія преобразовала въ косм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ъ духѣ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потребленіе всѣхъ странъ. Къ великому огорченію реакціонеровъ, она лишил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національной почвы. Старыя національныя отрасл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уничтожаются или уничтожаются съ каждымъ днемъ. Они вытѣсняются новыми отраслям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веде-

ніе которыхъ является вопросомъ жизни для всѣхъ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хъ націй, тѣми отраслям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ыя обрабатываютъ не мѣстные только сырые продукты, но произведенія самыхъ отдаленныхъ странъ. Въ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фабричные продукты этой н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потребляю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но и во всѣхъ частяхъ свѣта. Прежнія, удовлетворявшіяся съ помощью мѣстныхъ продуктовъ,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замѣнились новыми, для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ія которыхъ необходимы произведенія отдаленнѣйшихъ странъ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ѣйшихъ климатовъ. Прежняя національная замкнутость и самодовольство уступаютъ мѣсто всестороннему обмѣну 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й взаим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народовъ. Этотъ всесторонній обмѣнъ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также и на произведенія уметвеннаго труда. Плоды уметвенной дѣятельности отдѣльныхъ націй становятся общимъ достояніемъ.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односторонность и 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ь становятся теперь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невозможными, и изъ многихъ національных и мѣстныхъ литературъ образуется одна всемі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ыстрымъ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іемъ оруді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безконечно облегчен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сообщенія буржуазія толкаетъ на путь цивилизаціи всѣ, даже самые варварскіе, народы. Низкія цѣны товаровъ являются въ ея рукахъ тою тяжелой артиллеріей, съ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ой разрушаетъ она всѣ китайскія стѣны и принуждаетъ къ капитуляціи самую упорную ненависть варваровъ къ иностранцамъ. Она заставляетъ всѣ націи принять буржуазные способ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одъ угрозой полнаго ихъ раззоренія; она заставляетъ ихъ усвоить такъ называемую цивилизацію, т. е. сдѣлаться буржуа. Словомъ, она творитъ новый міръ, по своему образу и подобию.

Буржуазія подчинила деревню господству города. Она вызвала къ жизни огромные города, въ высокой степени увеличила городское населені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съ сельскимъ, и вырвала,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часть жителей страны изъ отупляюще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деревни. И рядомъ съ этимъ подчиненіемъ деревни городу, она

поставила варварскія и полуварварскія страны въ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ъ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хъ, крестьянскіе народы—отъ народовъ буржуазныхъ, Востокъ—отъ Запада.

Буржуазія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уничтожаетъ раздробленіе имущества, населенія и средств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Она стеснила населеніе,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ла средств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л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въ немногихъ рукахъ. Необходимымъ слѣдствіемъ этого был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трализація. Независимыя, едва связанная между собою провинціи, съ различ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законами, управленіемъ и таможеннымъ тарифомъ, — сплотились въ одну націю, съ единымъ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ъ, однообразнымъ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ъ, однимъ національнымъ классовымъ интересомъ и одною таможенною линіей.

Менѣе чѣмъ во сто лѣтъ свое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буржуазія создала болѣе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ыя и болѣе грандіозны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я силы, чѣмъ все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ія поколѣнія, вмѣстѣ взятыя. Подчиненіе человѣку силъ природы, машины, примѣненіе химіи къ земледѣлю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пароходы, желѣзныя дороги, электрическіе телеграфы, эксплуатація пѣлыхъ частей свѣта,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іе рѣкъ для судоходства, пѣлья, какъ бы изъ земли выросшія населенія... въ какомъ изъ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хъ столѣтій могли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подобны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я силы таятся въ нѣдрахъ общественаго труда?

Резюмируемъ сказанное. Средств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сообщенія, которыя послужили основаніемъ для могущества буржуазіи, получили начало еще въ феодальномъ обществѣ. На извѣстной ступени развитія этихъ средств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сообщенія, условия,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ъ совершалос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обменъ въ феодальномъ обществѣ, феод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ія земледѣлія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ловомъ, феодальныя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я отношенія оказались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вызваннымъ къ жизн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мъ силамъ. Эти отношенія стѣснял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а не облегчали его. Они сдѣлались его пѣнями. Ихъ нужно было неспровергнуть, и они были неспровергнуты.

Мѣсто ихъ заняла свободная конкуренція съ соотвѣтствующимъ е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ъ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ъ строемъ, съ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ъ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ъ господствомъ буржуазіи.

На нашихъ глазахъ совершается подобное это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і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съ его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ми отношеніями, съ его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обмѣна, какъ бы волшебствомъ создавшее такія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ыя средств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сообщенія, это общество находится въ положеніи волшебника, который не въ состояніи справиться съ вызванными его заклинаніями подземными силами. Вотъ уже нѣ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илѣтій, исторі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ъ собою исторію возмущені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ъ силъ противъ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тивъ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этихъ условій жизни для буржуазіи и ея господства. Чтобы пояснить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назвать торговые кризисы, которые, возвращаясь періодически,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угрожаютъ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ю всего буржуазн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 время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ъ кризисовъ постоянно уничтожае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не только готовыхъ уже продуктовъ, но и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ъ распоряженіи общества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ъ силъ. Во время кризисовъ появляется эпидемія, которая во всѣ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ія эпохи показала бы нелѣпностью—эпидемія излишня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Общество вдругъ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на нѣ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въ варварское состояніе; можно подумать, что голодъ или всеобщая истребительная война лишили его всѣхъ жизненныхъ средствъ;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 какъ бы уничтожаются, и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бщество слишкомъ цивилизова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о имѣетъ слишкомъ много жизненныхъ средствъ, потому, что торговля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его развиты слишкомъ высоко. Находящаяся въ его распоряжені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я силы не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ъ уже сохраненію буржуазныхъ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напротивъ, онѣ стали слишкомъ велики для эти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онѣ встрѣчаютъ въ

нихъ препятствіе, а когда имъ удастся одолѣть это послѣднее, онѣ приводятъ въ разстройство все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угрожаютъ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ю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Буржуазныя отношенія оказываются слишкомъ узкими, чтобы вмѣстить созданное ими богатство. К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устраиваетъ буржуазія кризисы? Съ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утемъ уничтоженія пѣдой массы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ъ силъ; съ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посредствомъ завоеванія новыхъ, и болѣе широкой эксплуатаціи старыхъ—рынковъ.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ничѣмъ другимъ, какъ подготовленіемъ болѣе широкихъ и сильныхъ кризисовъ и уменьшеніемъ средствъ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имъ.

Оружіе, которымъ буржуазія на смерть поразила феодализмъ, направляется теперь противъ самой буржуазіи.

Но она не только выковала оружіе, которое нанесетъ ей смертельный ударъ, она породила также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ятъ это оружіе —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работниковъ, пролетаріевъ.

Въ той же самой степени, въ какой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буржуазія, т. е. капиталъ,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классъ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работниковъ, которые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и могутъ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когда находятъ работу, а находятъ ее только до тѣхъ поръ, пока трудъ ихъ приноситъ прибыль капиталу. Эти работники, вынужденные продавать себя поштучн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ъ собою такой же товаръ, какъ и всякій другой предметъ торговли, а потому находятся въ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ъ всѣхъ случайностей конкуренціи, отъ всѣхъ колебаній рынка.

Работа этихъ пролетаріевъ, благодаря машинамъ и раздѣленію труд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лишилас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и потеряла, поэтому, всякую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для трудящихся.

Работникъ сдѣлался простымъ придаткомъ къ машинѣ, отъ котораго требуется лишь рядъ самыхъ простыхъ, самыхъ однообразныхъ, легче всего изучаемыхъ движеній. Издержк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 на покупку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ся, поэтому, стоимостью содержанія работника и поддержанія его расы. Извѣстно, что пѣ-

на всякого товара, а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и труда равняется издержкамъ е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оэтому, чѣмъ болѣе уменьшается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работы, тѣмъ болѣе падаетъ и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Даже болѣе: въ той же пропорціи, въ которой возрастаетъ примѣненіе машинъ и раздѣленіе труда, возрастаетъ и количество его, затрачиваемое работникомъ; это достигается благодаря удлинению рабочаго дня, или путемъ увеличенія напряженія, требуемаго отъ рабочаго въ данное время, путемъ ускоренія движенія машинъ и т. д.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превратила маленькую мастерскую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аго ремесленника въ большую фабрику капиталиста. Скученные на фабрикахъ массы рабочихъ организуются по-солдатеки. Какъ рядовы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арміи, ставятся они подъ надзоръ цѣлой іерархіи унтеръ-офицеровъ и офицеровъ. Они — рабы не только цѣлаго класса буржуазіи, буржуазн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ежедневно и ежечасно порабощаются они машиной, надсмотрщиками, 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азумѣется, самимъ буржуа-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мъ. И тѣмъ мелочнѣе, тѣмъ ненавистнѣе становится этотъ деспотизмъ, тѣмъ болѣе оставляетъ онъ горечи, чѣмъ откровеннѣе провозглашается нажива его послѣднею цѣлью.

Чѣмъ менѣе ловкости и силы требуетъ ручной трудъ, т. е. чѣмъ болѣ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тѣмъ болѣе вытѣсняется мужской трудъ женскимъ. Различія пола и возраста не имѣютъ болѣе никак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значенія, по отношенію къ рабочему классу.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 видитъ передъ собой только рабочі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цѣна которыхъ измѣняется сообразно съ возрастомъ и поломъ.

Когда фабриканты выжимаютъ все, что можно, изъ рабочихъ, и послѣдніе получаютъ, наконецъ, свою заработную плату, на нихъ набрасываются другія части буржуазіи: домовладѣльцы, лавочники, ростовщики и т. д.

Низшіе слои средняго сословія, мелкіе 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и, купцы и рантье, ремесленники и крестьяне, всѣ эти слои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переходятъ въ ряды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частью потому, что ихъ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капиталъ не-

достаточенъ для крупна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етъ конкуренціи большихъ капиталовъ, частью же потому, что ихъ техническіе приемы теряютъ свое значеніе при новыхъ способах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акъ рекрутируетс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изъ всѣхъ классовъ населені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проходитъ черезъ различныя степеня развитія. Его 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начинается съ самымъ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емъ.

Сначала рабочіе борются по-одиночкѣ, потомъ сплачиваются рабочіе одной фабрики, далѣе — одной отрасл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ъ извѣстной мѣстности, противъ отдѣльныхъ,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ихъ эксплуатирующихъ буржуа. Они нападаютъ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буржуазныя услові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о и на самыя орудія труда; они разбираютъ машины, уничтожаютъ иностранныя товары, конкуренціи которыхъ лишаетъ ихъ заработка, поджигаютъ фабрики, стараются поддержать клонящееся къ упадку положеніе средневѣковаго работника.

На этой ступени развитія, рабочі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ъ собою разбѣянную по всей странѣ и разьединенную конкуренціей массу. Массовыя движенія рабочихъ не являются тогда слѣдствіемъ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го ихъ сплоченія, но вызываются буржуазіей, которая, для достиженія своихъ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ъ цѣлей, должна и еще можетъ приводить въ движеніе весь рабочій классъ. На этой ступени рабочіе борются,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не съ своимъ собственнымъ непріателемъ, они побиваютъ враговъ своихъ враговъ, — остатки абсолютной монархіи, поземельныхъ собственниковъ, непромышленную буржуазію, мелкихъ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средняго сословія. Вс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іе концентрируется,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въ рукахъ буржуазіи. Каждая побѣда, которую удается одержать, есть побѣда буржуазіи.

Но съ развитіемъ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численный состав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онъ группируется въ большія массы, сила его растетъ, и онъ болѣе сознаетъ ея присутствіе. Интересы и жизн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іе рабочихъ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приводятся къ одному уровню, между тѣмъ какъ машинное производ-

ство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стираетъ различіе между всеми отраслями труда и почти повсюду низводитъ рабочую плату до одинаково низкой степени. Усиливающаяся конкуренці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и вызываемые ею торговые кризисы обусловливаютъ болѣе сильныя колебанія заработной платы; съ возрастающей быстротой развивающееся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іе машинъ дѣлаетъ жизн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іе рабочихъ все менѣе и менѣе обезпеченнымъ; столкновенія между отдѣльными рабочими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принимаютъ характеръ столкновеній двухъ классовъ общества. Рабочіе начинаютъ устраивать стачки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й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 совокупными силами отстаиваютъ они свою заработную плату. Они устраиваютъ даже постоянныя ассоціаціи, которыя бы могл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ихъ въ минуты активной борьбы. Мѣстами борьба эта переходитъ въ открытыя возстанія.

Иногда рабочіе остаются побѣдителями, но не на долго.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ъ результатомъ ихъ борьбы является н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успѣхъ, но все болѣе возрастающее сплачиваніе ихъ между собою. Ему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ъ вызываемое развитіемъ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улучшеніе средствъ сообщенія, которое приводитъ въ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іе работниковъ различныхъ мѣстностей.

Только эт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іе и нужно, чтобы борьбу рабочихъ отдѣльныхъ мѣстностей, повсюду носящую одинъ и тотъ же характеръ, превратить въ классовую борьбу цѣлаго народа. Но каждая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есть борьб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объединеніе, для котораго средневѣковымъ горожанамъ, съ ихъ проселочными дорогами, нужны были столѣтія, совершается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рабочими, благодаря желѣзнымъ дорогамъ, въ немногіе годы.

Эта организація пролетаріевъ въ отдѣльный классъ, а вмѣстѣ съ тѣмъ и въ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партію, ежеминутно разбивается конкуренціей рабочихъ между собою. Но она возникаетъ снова и снова, каждый разъ крѣпче, сильнѣе,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ѣе. Пользуясь взаимны-

ми несогласіями различныхъ слое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она добивается признанія нѣкоторыхъ интересовъ рабочихъ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кона. Такъ было съ десятичасовымъ билдемъ въ Англіи.

Несогласія внутри стар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сегда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ъ, такъ или иначе, развитію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Буржуазія ведетъ постоянную борьбу; сначала—противъ аристократіи, потомъ — противъ тѣхъ слоевъ своего класса, интересамъ которыхъ противорѣчитъ развитіе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борьба ея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друг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ся. Въ каждомъ изъ этихъ случаевъ она вынуждена обращаться к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у, просить его помощи и толкать его,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на пу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ъ движеній. Она сообщаетъ,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у св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іе, т. е. вручаетъ ему оружіе противъ самой себя.

Кромѣ того, по мѣрѣ развитія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цѣлыя слои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го класса переходятъ, какъ мы видѣли, въ ряды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или, по крайней мѣрѣ,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опасности потерять св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іе. Они также являются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ымъ элементомъ въ средѣ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Наконецъ, въ тѣ періоды, когда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ъ близится къ развязкѣ, процессъ разложенія въ средѣ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го класса, внутри всего стар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достигаетъ такой си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что нѣкоторая часть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го сословія отдѣляется отъ него и примыкаетъ къ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му классу, несущему знамя будущаго. Какъ часть дворянства соединилась нѣкогда съ буржуазіей, такъ переходитъ теперь к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у часть буржуазіи, именно буржуа-идеологи, которые возвысились д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го пониманія всего ход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го движенія.

Изъ всѣхъ классовъ, которы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ъ теперь буржуазіи, тольк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ъ собою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еволюціонный классъ. Всѣ прочіе классы приходятъ въ упадокъ и уничтожаются съ развитіемъ

емъ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же именно ею и создается.

Средніе слои, мелкіе купцы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и, ремесленники и крестьяне — все они борются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чтобы отстоять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е, какъ среднихъ слоевъ.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ни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 Еще того болѣе, они реакціонны, они стремятся повернуть назадъ колесо исторіи. Если они имѣютъ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е значеніе, то лишь постольку, поскольку имъ предстоитъ переходъ въ ряды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и защищаютъ н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о будущіе свои интересы,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и покидаютъ свою точку зрѣнія 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на точку зрѣні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оборванцевъ“, (Lumpenproletariat*) этотъ пассивный продуктъ разложенія самыхъ низшихъ слоевъ стар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мѣстами вовлекается въ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е движеніе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но по всей своей жизнен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ѣ онъ гораздо болѣе склоненъ продавать себя для реакціонныхъ козней.

Жизненные условія стараго общества уже теперь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существуютъ дл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Пролетарій не имѣетъ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его отношенія къ женщинамъ и дѣтямъ не имѣютъ болѣе ничего общаго съ буржуазными семейными отношеніям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трудъ,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иго капитала, одинаковое какъ въ Англіи, такъ и во Франціи, какъ въ Америкѣ, такъ и въ Германіи, уничтожило въ немъ всякій наці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ъ. Законы, мораль, религія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него не болѣе, какъ буржуазными предразсудками, подъ которыми скрываются тѣ или другіе буржуаз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Все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іе пролетаріату классы, достигая господства, старались упрочить уже пріобрѣтенное им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іе, ставя все общество въ усло-

*) Нѣмецкое слово Lumpenproletariat болѣе или менѣе подходитъ подъ наше русское выраженіе „босая команда“, но такъ какъ это выраженіе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только въ нѣкоторыхъ южно-русскихъ городахъ, то мы и не рѣшили въставить его въ текстъ. Примѣч. Перев.

вія, найбільше благопріятныя для ихъ обогащенія. Пролетаріи же могутъ овладѣ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ми силами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они уничтожатъ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а вмѣстѣ съ нимъ и вс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способы пріобрѣтенія имущества. Пролетаріямъ нечего упрочивать, они должны, напротивъ, разрушить все упрочившіяся способы частнаго обогащенія и частнаго обезпеченія.

Все до сихъ поръ возникавшія движенія были движеніями меньшинства или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въ интересахъ меньшинства.

Движеніе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ес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іе огромна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въ интересахъ огромна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самый низшій слой современн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е можетъ подняться, не можетъ выпрямиться, не уничтоживъ въ прахъ всю возвышающуюся надъ нимъ надстройку изъ слоевъ, образующихъ офици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Если не по сущности, то по формѣ, борьба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ест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борьба національна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долженъ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окончить съ буржуазіей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Все до нынѣ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іе виды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устроитва основывались, какъ мы видѣли, на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и угнетаемымъ и угнетающихъ классовъ. Но, чтобы угнетать извѣстный классъ, нужно создать условія, среди которыхъ онъ могъ бы, по крайней мѣрѣ,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свое подневольн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е. Подъ гнетомъ лежавшаго на немъ, ига крѣпостной возвысился однако до степени члена коммуны,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ъ горожанинъ выросъ до буржуа, не смотря на гнетъ феодальна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Напротивъ, современнй рабочій, вмѣ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улучшать свое положеніе съ прогрессомъ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пускается все ниже и ниже. Рабочі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ищимъ, и нищет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быстрее, чѣмъ населеніе и богатство буржуазныхъ странъ. Все болѣ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чевиднымъ, что буржуазія не способна оставаться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ей

щимъ классомъ, и возводитъ условія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въ норму, регулирующую вес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Она не способна къ господств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не можетъ обезпечить своему рабу даже его рабака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вынуждена была довести его до такого состоянія, въ которомъ она должна кормить его, вмѣ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на его счетъ. Общество не можетъ болѣе жить подъ ея властью, другими словами, жизнь буржуазіи несовмѣстима болѣе съ жизнью общества.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услові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и господства буржуазнаго класса есть накопленіе богатства въ рукахъ частныхъ лицъ, образованіе и умноженіе капиталовъ; услові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капитала есть наемный трудъ. Наемный трудъ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на конкуренціи рабочихъ между собою. Прогрессъ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оситель которой не можетъ не быть буржуазіи, ставитъ на мѣсто разъединенія рабочихъ, посредствомъ конкуренціи, —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іе ихъ посредствомъ ассоціаціи. Съ развитіемъ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ырывается,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изъ подъ ногу буржуазіи самое основаніе, на которомъ она производитъ и присвоиваетъ себѣ продукты. Она производитъ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воихъ собственныхъ могильщиковъ. Ея пораженіе и побѣда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 одинаково неизбежны.

Пролетаріи и Коммунисты

Въ какомъ отношеніи стоятъ коммунисты къ пролетаріямъ вообще?

Коммунисты не составляютъ какой либо особой парті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щей другимъ рабочимъ партіямъ.

У нихъ нѣтъ интересовъ, не совпадающихъ съ интересами всег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Они не высказывают никаких особ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под которые они хотели бы подвести движение пролетариевъ.

Коммунисты отличаются от других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только тѣмъ, что, съ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въ движеніи пролетаріевъ различныхъ націй они выдѣляютъ и отстаиваютъ общіе,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отъ національности, интересы всег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съ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 тѣмъ, что на различныхъ стадіяхъ развитія, черезъ которыя проходитъ борьба пролетаріевъ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они всегда защищаютъ общіе интересы движенія, въ его цѣломъ.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коммунисты, на практикѣ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ъ самую рѣшительную, всегда впередъ стремящуюся часть рабочихъ партий всѣхъ странъ, въ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ъ отношеніи, они имѣютъ передъ остальной массой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т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что понимаютъ условія, ходъ и общі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бочаго движенія. Ближайшая цѣль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та-же, что и другихъ рабочихъ партий: организація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сверженіе господства буржуазіи, завоеваніе пролетаріатом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ія положені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ни въ какомъ случаѣ не 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на идеяхъ и принципахъ, открытымъ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мъ тѣмъ или другимъ всемірнымъ реформаторомъ.

Он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ъ собою лишь общее выражені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нынѣ борьбы классовъ, совершающагося на нашихъ глазахъ историческаго движенія.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старыхъ формъ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ъ собою стремленія, свойственнаг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коммунистамъ.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я отношенія всегда подлежали постоян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мѣнѣ, постояннымъ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ъ измѣненіямъ.

Такъ напримѣръ,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революція уничтожила феодальную форму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ъ пользу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буржуазной.

Характерическою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коммунизма — является не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ообще, но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соб-

ственности буржуазной. Н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част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есть послѣднее и самое полное выраженіе того способ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присвоенія продуктовъ, въ основаніи котораго лежитъ антагонизмъ классовъ — эксплуатація однихъ другими.

Въ этомъ смыслѣ коммунисты могутъ выразить свою теорію словами: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асъ,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упрекали въ томъ, что мы хотимъ, будто бы, уничтожи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иобретенную личнымъ трудомъ;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служащую основаніемъ личной свободы, самодѣтельности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иобретенная личнымъ трудомъ! Говорите ли вы о мелкой мѣщанской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ая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л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буржуазной? Намъ нечего уничто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іе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уже уничтожило ее, или уничтожаетъ ежедневно.

Или говорите вы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о развѣ наемные рабочіе приобретаютъ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благодаря своему труду? Никогда. Ихъ трудъ создаетъ капиталы, т. е.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эксплуатирующую наемный трудъ,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ъ умножаться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она создаетъ новый наемный трудъ, чтобы вновь его эксплуатировать. Въ ея теперешнемъ видѣ,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и между капиталомъ и наемнымъ трудомъ. Разсмотримъ эту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съ обѣихъ сторонъ.

Быть капиталистомъ значитъ занимать, по отношенію к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не только личное, но и извѣстн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іе. Капиталъ есть продуктъ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труда и можетъ быть употребленъ въ дѣло лишь совокупными усиліями многихъ членовъ, въ послѣднемъ счетѣ — всѣхъ членовъ общества.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капиталъ есть не личная, 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сила.

Если, поэтому, капиталъ будетъ обращенъ въ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всѣмъ гражданамъ принадлежащую собет-

вещность, то это не будет превращением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Изменится тольк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Она потеряет свой классовый характер.

Перейдемъ къ наемному труду.

Средняя цѣна наемнаго труда есть минимумъ заработной платы, т. е. сумма жизненныхъ средствъ, непревышающая того,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ія жизни рабочихъ.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того, что приобретаетъ рабочій своею дѣятельностью, едва хватаетъ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ія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Мы вовсе не хотимъ уничтожать этого личнаго присвоенія продуктовъ труда, необходимыхъ дл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аго поддержанія жизни, этого присвоенія, которое не оставляетъ никакого чистаго дохода, дающаго власть надъ трудомъ другихъ. Мы хотимъ только уничтожить нищенскій характеръ этого присвоенія, благодаря которому рабочій живетъ лиш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увеличивать капиталъ, живетъ только до тѣхъ поръ, пока это входитъ въ интересы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хъ классовъ.

Въ буржуазномъ обществѣ живой трудъ работника есть только средство для увеличенія накопленнаго труда, т. е. капитала. В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ъ обществѣ накопленный трудъ есть только средство,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ее продолженію и удобствамъ жизни рабочаго.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въ буржуазномъ обществѣ прошедшее господствуетъ надъ настоящимъ, в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ъ — настоящее надъ прошедшимъ. Въ буржуазномъ обществѣ капиталъ обладаетъ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ю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ю, между тѣмъ какъ трудящійся индивидуумъ является не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мъ и обезличеннымъ.

И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этихъ то отношеній называетъ буржуазія уничтоженіемъ человѣ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и свободы!

И она права.

Речь идетъ,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бъ уничтоженіи буржуазной личности,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вободы.

Пр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буржуазныхъ условіях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одъ свободой понимаютъ свободу торговли, свободу купли и продажи.

Съ паденіемъ барышничества падеть, конечно, и свободное барышничество. Защита свободного барышничества, какъ и все буржуазныя выходки въ защиту свободы, имѣеть смыслъ лишь въ виду несвободнаго барышничества, въ виду подневольнаго положенія средневѣковыхъ горожанъ, а не тогда, когда рѣчь идетъ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ъ уничтоженіи барышничества, буржуазныхъ услові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самой буржуазіи.

Вы возмущаетесь тѣмъ, что мы хотимъ уничтожить частную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Но въ нашемъ теперешнемъ обществѣ она уничтожена уже для девяти десятыхъ населенія. Она существуетъ имен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ъ для этихъ девяти десятыхъ. Вы упрекаете насъ,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въ томъ, что мы хотимъ уничтожи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й посылкой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отсутствіе ея у огромна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членовъ общества.

Словомъ, вы упрекаете насъ въ томъ, что мы хотимъ уничтожить вашу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ы хотимъ сдѣлать это.

Съ той минуты, когда работа не будетъ болѣе превращаться въ капиталъ, деньги, поземельную ренту, короче, въ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силу, которая могла бы быть монополизированной, т. е. съ той минуты, когда лич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не будетъ превращаться въ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буржуазную, — съ этой минуты, заявляете вы,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личность будетъ уничтожена.

Вы сами признаете,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что подъ человеческою личностью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только буржуа, обладателя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Такая личность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олжна быть уничтожена.

Коммунизмъ никому не запрещаетъ присвоивать себѣ проду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труда, онъ устраняетъ только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этимъ присвоеніемъ для подчиненія чужаго труда.

Говорять, что съ уничтоженіемъ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

сти прекратится всякая самодѣтельность и воцарится всеобщая лѣность.

Если бы эти опасенія были основательны, то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давно уже должно было бы разрушиться, благодаря всеобщей неподвижности: вѣдь трудящіеся его члены ничего не приобретаютъ, а приобретаютъ — не трудятся.

Всѣ эти опасенія сводятся къ простой тавтологіи, гласящей, что не будетъ наемнаго труда тамъ, гдѣ не будетъ болѣе капитала.

Всѣ возраженія против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го способ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распредѣленія матеріальныхъ продуктовъ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ись также и н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распредѣленіе продуктовъ умственнаго труда.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ъ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буржуазіи уничтоженіемъ сама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акъ и уничтоженіе классова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современнаго образованія кажется ей однозначашимъ съ уничтоженіемъ образованія вообще.

Образованіе, гибель котораго она оплакиваетъ, для огромна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не болѣе, какъ обращеніемъ въ машину.

Но не спорьте же съ нами, оцѣнивая уничтоженіе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съ точки зрѣнія вашихъ понятій о свободѣ, образованіи, правѣ и т. д. Ваши идеи сами порождены буржуазными условіям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распредѣленія, точно также какъ ваше Право есть только возведенная въ законъ воля вашего класса, воля, содержаніе которой опредѣляется матеріальными условіям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вашего класса.

Пристрастіе, благодаря которому вы превращаете ваши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я отношенія и ваши услові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зъ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сложившихся, въ ходъ развитія сама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змѣняющихся отношеній, — въ вѣчные законы природы и разума, это пристрастіе вы раздѣляете со всѣми, прежде васъ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вшими классами. То что вамъ кажется понятнымъ, когда рѣчь идетъ объ античной или феода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ы не хотите понять, когда заговариваютъ о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буржуазной.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семьи! Даже самые радикальные буржуа возмущаются этим гнуснымъ намѣреніемъ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На чемъ держитс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семья? На капиталѣ, на частной наживѣ. Въ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азвитомъ видѣ она существуетъ только для буржуазіи; но она находитъ свое дополненіе въ вынужденномъ безбрачій пролетаріевъ и открытой проституціи.

Буржуазная семь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должна будетъ пасть вмѣстѣ съ паденіемъ этого ея дополненія, и объ вмѣстѣ исчезнуть съ исчезновеніемъ капитала.

Упрекнете ли вы насъ въ томъ, что мы хотимъ прекратить эксплуатацію дѣтей родителями?

Мы заранѣе сознаемся въ этомъ преступленіи.

Но вы утверждаете, что стремясь замѣнить домашнее воспитаніе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ъ, мы хотимъ уничтожить самую дорогія челоѣку отношенія.

А развѣ ваше воспитаніе не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ѣ влияніемъ общества? Развѣ не опредѣляется он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отношеніями, прямымъ или косвеннымъ вмѣшательствомъ общества, организаціей школъ и т. д. Не коммунисты выдумали воздѣйствіе общества на воспитаніе; они лишь измѣняютъ его характеръ, устраняютъ влияніе на него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го класса.

Буржуазныя разглагольствованія о семьѣ и воспитаніи, о нѣж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яхъ родителей къ дѣтямъ, внушаютъ дѣтямъ болѣе отвращенія, чѣмъ болѣе разрушаются всѣ семейныя связи въ средѣ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благодаря развитію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чѣмъ болѣе дѣти рабочихъ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въ простые товары и рабочі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Но вы, коммунисты, хотите ввести общность женъ, кричить намъ хоромъ вся буржуазія.

Буржуа смотритъ на свою жену, какъ на простое оруді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Онъ слышитъ, что оруді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ы въ общее пользованіе 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риходитъ къ тому заключенію, что и женщины подвергнутся той же участи.

Онъ и не подозреваетъ, что рѣчь идетъ объ устране-

ни того положенія женщины, въ которомъ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простымъ орудіем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прочемъ, нѣтъ ничего смѣшнѣе высоко нравственнаго ужаса нашихъ буржуа, въ виду воображаемаго намѣрені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вве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ую общность женъ. Коммунистамъ не нужно было бы вводить общность женъ,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почти всегда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Не довольствуясь тѣмъ, что въ ихъ распоряженіи находятся жены и дочери пролетаріевъ, и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бъ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роституціи, наши буржуа съ особеннымъ наслажденіемъ занимаются развращеніемъ женъ другъ у друга.

Въ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буржуазный бракъ является общностью женъ.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упрекнуть развѣ лишь въ томъ,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ъ поставить официальную общность женъ на мѣсто — лицемѣрно скрываемой. Но само собою разумѣется, что съ уничтоженіемъ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услові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счезнетъ и создаваемая ими общность женъ, т. е. официальная и неофициальная проституці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упрекаютъ далѣе въ томъ,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ъ, будто бы, уничтожить отечество, національность.

Рабочіе не имѣютъ отечества. Нельзя лишить ихъ того, чего у нихъ нѣтъ. Стремяс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завоев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господство,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ся въ одинъ національный классъ, устроиться въ предѣлахъ наці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остается національнымъ, хот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въ томъ смыслѣ, какъ понимаетъ это слово буржуазія.

Національная обособленность и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интересовъ различныхъ народовъ уже теперь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исчезаютъ благодаря развитію буржуазіи, свободѣ торговли, всемірному рынку, однообразію способов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ъ имъ жизн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Господств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еще болѣе ускоритъ ихъ исчезновеніе. Соединеніе услій, по крайней мѣрѣ,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хъ странъ есть одно изъ первыхъ условій освобождені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Въ той же степени, въ какой уничтожена будетъ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одного индивидуума другимъ, уничтожится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одной націи другою.

Вмѣстѣ съ антагонизмомъ классовъ внутри націй падутъ и враждебныя отношенія націй между собою.

Обвиненія, возводимыя на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съ точекъ зрѣнія религіозн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вообще не заслуживаютъ болѣе подробнаго разсмотрѣнія.

Трудно ли понять, что съ образомъ жизни людей, съ и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отношеніями, съ и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ъ положеніемъ — мѣняются также ихъ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я, воззрѣнія, понятія, словомъ, все ихъ міросозерцаніе?

Что же доказываетъ исторія идей, если не то, что умственная дѣ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еобразуется вмѣстѣ съ матеріальной?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ми идеями даннаго времени всегда были только идеи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го класса.

Говорятъ объ идеяхъ, которыя создаютъ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е настроеніе во всемъ обществѣ; этимъ выражаютъ только тогъ фактъ, что внутри стар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образовались элементы новаго строя, что рядомъ съ разрушеніемъ стараго образа жизни идетъ разложеніе старыхъ идей.

Когда древній міръ пришелъ въ упадокъ, древнія религіи были побѣждены христіанствомъ.

Когда христіанскія идеи уступали мѣсто просвѣтительнымъ идеямъ XVIII вѣка, феод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ело борьбу на 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 съ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й, тогда, буржуазіей. Идеи свободы совѣсти и религіи выражали собою лишь господство свобод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іи въ области знанія.

„Но, скажутъ намъ, религіозныя, нравственныя, философскія, правовыя идеи и т. д. конечно измѣнились въ ходѣ историческаго развитія, но религія,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ія, политика, право — всегда сохранялись въ этомъ непрерывномъ измѣненіи.

„Существуютъ, кромѣ того, вѣчныя истины, какъ свобода,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и т. д., которыя одинаково принадлежатъ всемъ фазисамъ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развитія. Коммунизмъ же уничтожаетъ общія истины, онъ уничтожа-

еть религію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вмѣ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ихъ; онъ противорѣчитъ,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всему ходу историческаго развитія.“

Къ чему сводится это обвиненіе? Исторія всѣхъ до нынѣ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ъ обществъ основывалась на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и классовъ, принимавшей въ различныя эпохи различныя виды.

Не смотря на различіе въ своихъ формахъ,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одной части общества другою является фактомъ, общимъ всѣмъ прошлымъ столѣтіямъ. Неудивительно, поэтому, чт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сознаніе всѣхъ вѣковъ, не смотря на всѣ различія и все свое разнообразіе, вращалось, до сихъ поръ, въ извѣстныхъ общихъ формахъ, которыя исчезнутъ совершенно лишь съ полнымъ уничтоженіемъ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и классов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ія есть самый 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азрывъ съ существующими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ми отношеніями; н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она вступаетъ въ самый радикальный разрывъ съ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и идеями.

Оставимъ, однако, возраженія буржуазіи противъ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Мы видѣли уже выше, что первымъ шагомъ рабочей революціи должно быть возвышеніе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на степень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го класса, учрежденіе демократі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воспользуется своимъ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ъ господствомъ, чтобы мало по малу отнять у буржуазіи весь капиталъ, чтобы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ть всѣ орудія труда въ рука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т. е.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аго въ качествѣ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го класса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и п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корѣе увеличить массу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ъ силъ.

Конечно, сначала это можетъ совершиться только путемъ деспотическихъ вторженій въ право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въ буржуазныя услові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путемъ мѣропріятій, которыя, съ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ѣнія, кажутся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и и маловажными, но которыя, въ ходѣ движенія, переростутъ самихъ себя, и неизбежны, какъ средства для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ія всего способ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Эти мѣропріятія будутъ, конечно, различны въ различныхъ странахъ.

Въ самыхъ передовыхъ странахъ могли бы, однако,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слѣдующія общія мѣры:

- 1) Экспроприация поземе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обращеніе поземельной ренты на покрыт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расходовъ.
- 2) Высокій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подоходный налогъ.
- 3) Уничтоженіе права наслѣдства.
- 4) Конфискація имущества всѣхъ эмигрантовъ и бунтовщиковъ.
- 5) Централизція кредита въ рука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редствомъ національнаго банка, съ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ъ капиталомъ 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монополіей.
- 6) Централизція перевозочныхъ средствъ въ рука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7) Увеличеніе числ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фабрикъ и оруді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оздѣлываніе и улучшеніе полей по общему плану.
- 8) Одинакова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сть труда для всѣхъ, учрежденіе армій труда, въ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ля земледѣлія.
- 9) Соединеніе земледѣльческаго труда съ фабричнымъ, постепенное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различія между городомъ и деревней.
- 10)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и даровое воспитаніе всѣхъ дѣтей. Устраненіе фабричной работы дѣтей въ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ея формѣ. Соединеніе воспитанія съ матеріальным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ъ и т. д.

Когда, со временемъ, уничтожатся различія классовъ, и вс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ся въ рукахъ ассоціацій —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потеряетъ с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ій характеръ.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ласть, въ собственномъ смыслѣ этого слова, есть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ая сила извѣстнаго класса, имѣющая цѣлью подчиненіе другого класса. Есл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въ борьбѣ своей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объединяется, какъ классъ, достигаетъ путемъ революціи господства, и, какъ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ій классъ,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 уничтожаетъ буржуазныя условия произ-

водства, то этимъ онъ уничтожаетъ также и услов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антагонизма классовъ, классы— вообще, а вмѣстѣ съ тѣмъ и свое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классовое господство.

Мѣсто стараго буржуазнаго общества, съ его классами и антагонизмомъ классовъ, займетъ ассоціація, въ которой свободное развитіе каждого будетъ условіемъ свободного развитія — всѣхъ.

III

Соці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 РЕАКЦИОННЫЙ СОЦІАЛИЗМЪ

а) Феодалъный Соціализмъ.

Призваніе англійской и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аристократіи, по само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ея положенію, заключалось въ томъ, чтобы писать памфлеты противъ современнаго буржуазн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Ію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іи 1830 г. и въ англійскомъ движеніи въ пользу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она еще разъ была побѣждена ненавистнымъ ей выскочкой. О серьез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ѣ не могло быть болѣе и рѣчи. Оставалась только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борьба. Но и въ литературѣ говорить языкомъ времени реставраціи было уже не возможно. Чтобы пріобрѣсти сочувствіе, аристократія должна была сдѣлать видъ, что не заботится о своихъ собственныхъ интересахъ и составляетъ свой обвинительный актъ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лишь для защиты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маго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Она доставляла себѣ,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удовольствіе сочинять пасквили на своего новаго господина и шептать ему на ухо болѣе или менѣе грозныя пророчества.

Такъ возникъ феодалъный соціализмъ,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ій собою частью жалобу, частью пасквиль, частью

возваніе къ прошлому, частью угрозу будущему, по временамъ мѣтко поражающій буржуазію горькимъ, остроумнымъ и ѣдкимъ отзывомъ, но всегда производящій комическое впечатлѣніе полною 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понять ходъ новѣйшей исторіи.

Аристократія потрясала нищенской сумой пролетаріевъ, какъ знаменемъ, чтобы собрать вокругъ себя народъ. Но слѣдуя за нею, онъ тотчасъ же замѣчалъ на ея спинѣ старые феодальные гербы, и разбѣгался съ громкимъ, непочтительнымъ смѣхомъ.

Часть французскихъ легитимистовъ и „молодая Англія“ разыграли эту комедію наилучш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Когда феодалы утверждаютъ, что ихъ способъ эксплуатаціи имѣлъ другой видъ, чѣмъ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то они забываютъ при этомъ, что они эксплуатировали пр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ихъ, нынѣ уже вполнѣ отжившихъ, условіяхъ 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ъ. Когда они доказываютъ, что во время ихъ господства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современнаг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то они забываютъ, что именн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уржуазія была необходимымъ плодомъ и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строя.

Впрочемъ, они совсѣмъ не скрываютъ реакціонна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своей критики. Главное обвиненіе ихъ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именно въ томъ и состоитъ, что господство ея повело къ возникновенію класса, который ниспровергнетъ вес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ъ.

Они упрекаютъ буржуазію гораздо болѣе въ томъ, что она породила революціонный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чѣмъ въ томъ, что она создала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вообще.

В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ѣ они принимаютъ, поэтому, участіе во всѣхъ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ыхъ мѣрахъ против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Въ обыденной жизни, вопреки своимъ напыщеннымъ словоизверженіямъ, они не упускаютъ случая къ наживѣ, и не безъ выгоды обмѣниваютъ свою „преданность“, „любовь“, „честь“ и т. д., на шерсть, свекловицу и водку.

Какъ пошъ шель всегда рядомъ съ феодаломъ, такъ и поповскі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не отстаетъ отъ феодальнаго.

Нѣтъ ничего легче, какъ навязать христіанскому ас-

кетизм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отгънокъ. Развѣ христіанство не возставало также противъ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азвѣ не проповѣдывало оно бѣдности и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и, безбрачія и умерщвленія плоти, затворничества и т. п.? Христіанскі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есть святая вода, которою поны кропятъ озлобленіе аристократа.

б)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Не одна феодальная аристократія была классомъ низпровергнутымъ буржуазіей, классомъ положеніе котораго постоянно ухудшалось въ современномъ буржуазномъ обществѣ. Средневѣковое мѣщанство и сословіе мелкихъ крестьянъ были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ам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уржуазіи. Въ странахъ менѣе развитыхъ въ промышленномъ и торговомъ отношеніяхъ, классъ этотъ и до сихъ поръ еще прозябаетъ, рядомъ съ развивающейся буржуазіей.

Въ тѣхъ странахъ, гдѣ развилас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ія, образовалось — и, какъ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буржуазн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стоянно вновь образуется, —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е среднее сословіе, которое колеблется между пролетаріатомъ и буржуазіей. Но конкуренція постоянно сталкиваетъ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хъ къ этому классу лицъ въ ряды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и они уже начинаютъ предвидѣть приближеніе того момента, когда, съ развитіемъ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н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исчезнутъ какъ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въ торговлѣ, мануфактурахъ и земледѣліи замѣнятся надзирателями и наемными служителями.

Въ такихъ странахъ какъ Франція, гдѣ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составляетъ гораздо болѣе половины всего населені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было появленіе писателей, которые, становясь на сторону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прикладывали къ буржуазному режиму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ую и мелко-крестьянскую мѣрку, и защищали дѣло рабочихъ съ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й точки зрѣнія. Такъ возникъ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й

соціалізмъ. Сімонди стоить во главѣ этого род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е только во Франціи, но также и въ Англіи.

Этотъ соціалізмъ прекрасно умѣлъ подмѣтить противорѣчі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услові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Онъ разоблачилъ лицемерный оптимизмъ экономистовъ.

Онъ указалъ на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е дѣйствіе машинна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раздѣленія труда, на концентрацію капиталовъ и поземе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а излишне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кризисы, на неизбѣжный упадокъ мелкой буржуазіи 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на нищету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анархію в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ѣ, вопіющія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въ распредѣленіи, на раззорительную промышленную войну націй между собою, разложеніе старыхъ правовъ, старыхъ семей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и старыхъ національностей.

Положительная сторона требованій этого соціалізм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или въ возстановленіи старыхъ способов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обмѣна, а вмѣстѣ съ ними старыхъ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и стара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строя; или стремится онъ насильно удержать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способ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обмѣна въ рамкѣ старыхъ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которыя они уже разбили 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олжны были разбить. Въ обоихъ случаяхъ онъ является реакціоннымъ и утопическимъ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Цехо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і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патріархальное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являются послѣднимъ его словомъ.

Въ дальнѣйшемъ своемъ развитіи, направленіе это перешло въ трусливыя жалобы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іе дѣлъ.

в) Нѣмецкій или „истинный“ соціалізмъ. *)

Соці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зникшая подъ давленіемъ буржуазнаго

*) Мы напоминаемъ читателю, что критика соці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оходитъ въ Манифестѣ, лишь до 1847 года. Поэтому все, сказанное въ немъ о „нѣмецкомъ соціалізмѣ“, ни въ какомъ случаѣ не относится къ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ѣмецкой соціалъ-демократіи.

Прим. перев

господства и служивш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ъ выраженіемъ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ъ эт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проникла въ Германію въ т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тамошняя буржуазія только что начала свою борьбу противъ феодальна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

Нѣмецкіе мудрецы, философы и полуфилософы съ жадностью набросились на эту литературу и забыли лишь то, что французскія отношенія не были перенесены въ Германію вмѣстѣ съ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При тогдашнемъ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ъ строе Германіи, эта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шилась всякаг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а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аго значенія и приняла характеръ проста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аго теченія. Она п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явилась тамъ празднымъ умозрѣніемъ о сущности человѣка. Такъ, требованія первой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іи для нѣмецкихъ философовъ XVIII столѣтя имѣли смыслъ лишь какъ общія требованія „практическаго разума“, и стремленія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й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буржуазіи представлялись имъ законами „чистой воли“, воли, какъ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истинной человѣческой воли.

Все дѣло нѣмецкихъ литераторовъ состояло въ томъ, чтобы новыя французскія идеи согласовать съ ихъ старымъ философскимъ настроеніемъ, или вѣрнѣе въ томъ, чтобы усвоить французскія идеи, оставаясь на своей стар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точкѣ зрѣнія.

Это усвоеніе совершилось такимъ же путемъ, какимъ происходитъ усвоеніе иностраннаго языка, т. е. посредствомъ перевода.

Извѣстно, что на манускриптахъ, содержащихъ въ себѣ классическія произведенія древняго языческаго міра, монахи записывали нѣлныя исторіи католическихъ святыхъ. Нѣмецкіе писатели поступили какъ разъ наоборотъ съ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Позади французскаго оригинала они вставили свои философскія безсмыслицы. Такъ, напримѣръ, изъ з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критики денежна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у нихъ выступало „отчужденіе человѣческой сущности“, позади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критики буржуазн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расовалось „уничтоженіе господства абстрактно Всеобщаго“ и т. д.

Эту подмѣну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философ-

скими словоизверженіями они окрестили „философіей дѣла“, „истиннымъ социализмомъ“, „нѣмецкой наукой социализма“, „философскимъ обоснованіемъ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т. д.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теряла,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всякое серьезное содержаніе. И такъ какъ, въ рукахъ нѣмцевъ, она перестала выражать борьбу одного класса противъ другого, то нѣмцы и вообразили себя призванными пополнить „французскую односторонность“, и отстаивать вмѣсто истинныхъ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ъ истинѣ, вмѣсто интересов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 интересы сущности человѣка, человѣка вообще, не принадлежащаго къ какому либо классу, и существующаго, поэтому, не въ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а въ туманной област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фантазіи.

Этотъ нѣмецкій социализмъ, такъ громко и важно кричавшій о своихъ жалкихъ схоластическихъ измышленіяхъ, лишился, однако, мало по маду своей педантической невинности.

Борьба нѣмецкой, и именно прусской, буржуазіи противъ феодаловъ и королевска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 словомъ,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іе приняло болѣе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размѣры.

„Истинному“ социализму представился,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желанный случай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движенію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ія требованія, расточать традиціонныя проклятія либерализму,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ому правленію, буржуаз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іи,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вободѣ слова, буржуазному праву, буржуазной свободѣ и равенству, и проповѣдовать народной массѣ, что въ этомъ буржуазномъ движеніи она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тъ выиграть, но скорѣе рискуетъ все потерять. Нѣмецкі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весьма кетати забывалъ о томъ, что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ритика, неразумнымъ отголоскомъ которой онъ явился, имѣетъ въ виду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съ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ем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отношеніям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іей, т. е. именно тѣ общественныя условія, о завоеваніи которыхъ только еще шла рѣчь въ Германіи.

Нѣмецкимъ абсолютнымъ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ъ, со всею ихъ свитою поповъ, школьныхъ учителей, помѣщиковъ и бюрократовъ, онъ служилъ очень удобнымъ пугаломъ противъ буржуазіи, съ ея грозными требованіями.

Онъ представлялъ собою пріятное дополненіе къ не-пріятнымъ расправамъ съ помощью пуль и плетей, которыми эт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давляли возстанія нѣмецкихъ работниковъ.

Если „истин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былъ,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въ рукахъ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ружіемъ противъ нѣмецкой буржуазіи, то онъ служилъ, въ тоже врем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мъ выраженіемъ реакціонныхъ интересовъ мелкаго нѣмецкаго мѣщанства. Унаслѣдованный еще отъ XVI столѣтія, и съ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всегда умѣвшій отстоять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е въ той или другой формѣ, классъ мелкихъ горожанъ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ой основой современны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въ Германіи.

Сохраненіе этого класса равносильно сохраненію современнаго нѣмецка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строя. Онъ страшился промышленна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буржуазіи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о несомнѣнно приведетъ его къ гибели, благодаря конкуренціи капиталовъ, съ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ію класса революціоннаг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 съ другой. „Истин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былъ, по мнѣнію мелкаго мѣщанства, способенъ однимъ зарядомъ убить обоихъ зайцевъ. И онъ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ся подобно эпидеміи.

Тяжелый покровъ, въ который закутывали нѣмецкіе социалисты свои двѣ-три окостенѣвшія „вѣчныя истины“, этотъ сотканный изъ умозрительной паутины, убранный цвѣтами краснорѣчиваго мудретвованія и смоченный слезами умилевія покровъ, — 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ъ сбыту ихъ товара у подобной публики.

Съ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нѣмецкі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все болѣе сознавалъ свое призваніе — быть высокопарнымъ защитникомъ этого мѣщанства. Онъ провозгласилъ нѣмецкую націю нормальной націей, а нѣмецкаго мѣщанина нормальнымъ человѣкомъ. Въ каждой мѣщанской низости онъ видѣлъ скрытый, высші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ій смыслъ,

который обращалъ ее въ нѣч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ей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е. Послѣдовательный до конца, онъ открыто выступилъ противъ „дико-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а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го направленія, объявивши, что стоитъ выше всякой борьбы классовъ. За весьма немногими исключеніями, всѣ, циркулирующія въ Германіи, такъ называемы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і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ія сочиненія принадлежать къ области этой грязной, развращающей литературы.

2)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ИЛИ БУРЖУАЗНЫЙ СОЦІАЛИЗМЪ.

Извѣстная часть буржуазіи желаетъ устранить социальныя бѣдствія, чтобы упрочи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е буржуазн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Къ ней принадлежатъ экономисты, филантропы, гуманные люди, стремящіеся улучшить положеніе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организаторы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хъ учреждений, покровители животныхъ, учредители обществъ трезвости, крохотные реформаторы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ъ сортовъ. Этотъ буржуаз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ъ создалъ даже цѣлыя системы.

Для примѣра укажемъ на Прудоновскую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Послѣдователи эт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хотятъ сохранить всѣ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я отношенія, устранивши борьбу и опасности, составляющія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ихъ слѣдствіе. Они хотятъ имѣть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безъ революціонныхъ и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ыхъ его элементовъ. Они хотятъ буржуазіи без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Буржуазі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кажется лучшимъ изъ міровъ тотъ міръ, въ которомъ она господствуетъ. Буржуаз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возводитъ это радуж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е въ болѣе или менѣе полную систему. Предлага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у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его системы и вступитъ,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въ новый Иерусалимъ, этотъ социализмъ, въ сущности, требуетъ, чтобы рабочій продолжалъ жить въ буржуазномъ обществѣ, но пересталъ его ненавидѣть.

Другая, менѣ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и болѣе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эт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старается отвести рабочих от вся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утверждая, что не тѣ или другія политическія измѣненія, но лишь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атеріальныхъ условийъ жизн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можетъ принести пользу рабочему классу. Но подѣ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мъ матеріальныхъ условийъ жизни этотъ социализмъ понимаетъ далеко не уничтоженіе буржуазныхъ условий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озможное только путемъ революціи. Онъ имѣетъ въ виду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я улучшенія, совершающіяся на почвѣ этой же сам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і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ничего не измѣняющія въ отношеніяхъ капитала къ наемному труду, и, въ крайнемъ случаѣ, только уменьшающія для буржуазіи издержки ея господства и упрощающія е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амое подходящее для себя выраженіе буржуаз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находитъ лишь тогда, когда онъ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ъ простую риторическую фигуру.

Свобод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въ интересах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тарифъ, въ интересах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Одинокое тюремное заключеніе, въ интересах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это — послѣднее,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нелицемѣрно произнесенное, слово буржуазна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есь буржуаз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ъ повтореніи того, что буржуа сдѣлались буржуа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въ интересах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з) КРИТИЧЕСКИ-УТОПИЧЕСКІЙ СОЦИАЛИЗМЪ

и КОММУНИЗМЪ

Мы не говоримъ здѣсь о литературѣ, которая во всѣхъ большихъ революціяхъ новѣйшаго времени выражала требовані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сочиненія Бабѳа и т. п.).

Первыя попытк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достави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торжество своимъ интересамъ, эти попытки, имѣвшія мѣсто во время всеобщаго возбужденія умовъ, въ періодъ низверженія феодальнаго строя,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олжны были разбиться, благодаря неразвитому состоянию сам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недостатку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й е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условия эти с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 лишь буржуазной эпох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путствовавшая этим первым движениям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по своему содержанию необходимо являлась реакционной. Она проповедывала всеобщий аскетизм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равенства.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системы Сень-Симона, Фурье, Оуэна и т. д. появились в первый, неразвитый период борьбы между пролетариатом и буржуазией, о котором мы говорили выше (см. главу Буржуазия 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

Творцы этих систем видели уже антагонизм классов, равно как и влияние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внутри сам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е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о они не видели в пролетариате ника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никакого, свойственного ем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Так как развитие антагонизма классов идет рука об руку с развитием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то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они не могли еще найти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й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Они надбались пополнить этот недостаток открытием социальных законов, созданием нов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науки.

Мест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должна была заступить их собственная твор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ес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й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должны были занять условия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е, место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одвигающейся вперед классов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х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изобретения. Дальн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всего мира сводилась для них к пропаганд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у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их реформаторских планов.

При этом они понимали, правда, что с своими планами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выразителями интересов,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как более других страдающего. Но только в этом качестве, более дру-

тихъ и страдающаго класса и существовалъ для них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Неразвитое состояніе борьбы классовъ, равно какъ и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и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іе, приводили ихъ къ убѣжденію, что они должны стоять выше всякаго антагонизма классовъ. Они хотѣли улучшить положеніе всѣхъ членовъ общества, не исключая самыхъ высокопоставленныхъ; поэтому они обращались всегда безразлично ко всему обществу, и даж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къ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ему классу. По ихъ мнѣнію,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ло понять ихъ системы, чтобы немедленно признать ихъ наилучшими планами наилучша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Они отказывались, поэтому, отъ вся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въ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тъ всякой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й дѣятельности; они стремили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своей цѣли мирнымъ путемъ, 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ъ маленькихъ,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удавшихся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ъ, они хотѣли силою примѣра продолжить путь новом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евангелію.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ія описанія будущаго общества явились на свѣтъ въ т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находился еще въ очень неразвитомъ состояніи, и представлялъ себѣ свое положеніе еще совершенн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 Они соответвуютъ его первому, полному предчувствію, порыву къ совершенному переустройству общества.

Но въ этихъ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ъ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ъ произведеніяхъ заключаются также и критическіе элементы. Они затрогиваютъ всѣ основанія существующ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ъ этомъ отношеніи они доставили драгоцѣнный матеріалъ для просвѣщенія рабочихъ. Положительная сторона ихъ ученій о будущемъ обществѣ, напримѣръ уничтоженіе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и между городомъ и деревней, уничтожені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наемнаго труда, провозглашені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армоніи, превращені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ъ простое управлені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ъ, — всѣ эти положенія выражаютъ лишь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страненія того антагонизма классовъ, который только что начиналъ тогда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и былъ имъ извѣстенъ лишь въ

своёмъ первичномъ, неопредѣленномъ видѣ. Потому и положенія эти имѣютъ еще совершенно утопическій характеръ. Значеніе критически-утопическа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коммунизма стоитъ въ обратномъ отношеніи къ ходу историческаго развитія. Въ той же самой степени, въ какой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и принимаетъ болѣе опредѣл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ъ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ъ, лишается всяка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аго смысла и всякаг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го оправданія эт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е стремленіе возвыситься надъ нею, эт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къ ней отношеніе. Если основатели этихъ системъ и были во многихъ отношеніяхъ революціонерами, то ученики ихъ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ъ собою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еакціонныя секты. Они неизмѣнно держатся образа мыслей своихъ учителей, игнорируя весь дальнѣйшій ходъ развитія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Вслѣдствіе этого, они стараются смягчить борьбу классовъ и устранить ихъ антогонизмъ. До сихъ поръ еще пытаются они осуществить свои утопіи путемъ учрежденія отдѣльныхъ фалангетеровъ, заведені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ъ колоній, маленькихъ Икарій — этого карманнаго изданія новаго Иерусалима. Для постройки всѣхъ этихъ воздушныхъ замковъ они вынуждены взывать къ челолюбію буржуазныхъ сердецъ и кошельковъ. Мало по малу переходятъ они въ категорію описанныхъ выше реакціонныхъ и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хъ социалистовъ, отличающаго отъ нихъ только болѣ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мъ педантизмомъ и фанатическою вѣрою въ чудесное свойство свое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науки.

Вотъ почему съ такимъ ожесточеніемъ выступаютъ они противъ всяка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го движенія рабочихъ, вызываемаго, по ихъ мнѣнію, лишь слѣпымъ невѣріемъ въ новое евангеліе.

Послѣдователи Оуэна выступаютъ противъ чартистовъ въ Англіи, Фурьеристы — противъ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реформы во Франціи.

IV

Отноше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къ различнымъ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мъ партіямъ

Послѣ того, чт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во второй главѣ, отноше-
ніе коммунистовъ къ различнымъ, существующимъ уже,
рабочимъ партіямъ понятно само собою, а слѣдова-
тельно понятно, и отношеііе ихъ къ чартистамъ въ Англїи
и сторонникамъ аграрной реформы въ сѣверной Америкѣ.

Они борются во имя ближайшихъ цѣлей и интересов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но въ тоже время они отстаиваютъ
и будущность движенія. Во Франціи коммунисты при-
мыкаютъ къ соци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противъ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й и радикальной буржуазіи, при этомъ
не отказываясь, однако, отъ права критически относить-
ся къ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ъ фразамъ и иллюзіямъ. Въ Швей-
царіи он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ъ радикаловъ, помня въ тоже
время, что эта партія состоитъ изъ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хъ
элементовъ: частью изъ социаль-демократовъ во фран-
цузскомъ смыслѣ, частью изъ радикальныхъ буржуа.

Въ Польшѣ коммунисты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ъ партію, ста-
вляющую аграрную революцію необходимымъ условіемъ
національна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ія, ту самую партію, которая
вызвала краковское возстаніе 1846 года.

Въ Германі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ія идетъ рядомъ
съ буржуазіей,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а послѣдняя является рево-
люціонной, въ борьбѣ своей противъ абсолютной мо-
нархіи, противъ феодальной поземе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мелкаго мѣщанства.

Но ни на минуту не перестаетъ она вырабатывать
въ умахъ рабочихъ возможно болѣе ясное сознаніе
враждебной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и интересовъ буржуазіи
и пролетаріата. Она хочетъ, чтоб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ія условія, которыя принесетъ съ собою го-
сподство буржуазіи, могли послужить нѣмецкимъ рабо-
чимъ оружіемъ противъ той же буржуазіи, чтобы борь-

ба противъ нея началась тотчасъ же послѣ паденія реакціонныхъ классовъ въ Германіи.

На Германію коммунисты обращаютъ главное свое внимані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наканунѣ буржуазной революціи; этотъ переворотъ совершится въ ней при гораздо далѣе подвинувшихся впередъ условіяхъ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іи вообще, и застанетъ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въ гораздо болѣе развитомъ состояніи, чѣмъ былъ онъ въ Англіи XVII и во Франціи XVIII столѣтія. Нѣмецк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революція можетъ послужить,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лиш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мъ прологомъ рабочей революціи.

Словомъ, коммунисты повсюду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ъ всякое революціонное движеніе противъ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ъ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ъ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Въ каждомъ изъ этихъ движеній они выдвигаютъ на первый планъ вопросъ о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 хотя бы она и не вездѣ являлась въ одинаково развитой формѣ — какъ основной вопросъ всего движенія.

Наконецъ, коммунисты повсюду стремятся къ соединенію и соглашенію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ъ партій всѣхъ странъ.

Коммунисты считаютъ позорнымъ с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зрѣнія и намѣренія. Они открыто объявляютъ, что ихъ цѣли могутъ быть достигнуты лишь посредствомъ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го ниспроверженія вс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а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строя. Пусть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іе классы содрогаются перед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іей. Пролетаріи ничего не могутъ въ ней потерять, кромѣ своихъ цѣпей. Приобрѣтутъ же они цѣлый міръ.

Пролетаріи всѣхъ странъ соединитесь!

ПРИЛОЖЕНІЯ

Рабочій классъ не можетъ просто овладѣть готов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ашиной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ею для своихъ собственныхъ цѣлей.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съ ея вездѣущими органами — постоянной арміей, полиціей, бюрократіей, духовенствомъ, судебнымъ сословіемъ, этими органами,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ными къ іерархической и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ѣ—получила начало во времена абсолютной монархіи, когда она служила нарождавшемуся буржуазн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могучимъ оружіемъ въ борьбѣ его противъ феодализма. Развитие ея замедлялось, однако, всевозможнымъ средневѣковымъ хламомъ, въ видѣ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хъ правъ дворянства и землевладѣльцевъ, мѣстныхъ привилегій, городскихъ и цеховыхъ монополій и различныхъ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провинціаль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Исполнская метл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іи восемнадцатаго столѣтія выметъ всѣ эти остатки прошлаго и очистила,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почву отъ послѣднихъ препятствій, мѣшавшихъ окончанію современн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го зданія. Постройку этого зданія закончила первая имперія, которая, въ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была вызвана къ жизни коалиціонными войнами старой, полуфеодалной Европы противъ обновленной Франціи. При послѣдующихъ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ъ форма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была поставлена подъ парламентскій контроль, т. е. подъ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контроль имущихъ классовъ. Съ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на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тогда въ тешицу, въ которой росли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олги и раззорительные налоги, и сдѣлалась яблокомъ раздора для различныхъ авантюристовъ и фракцій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хъ классовъ, спорившихъ между собою изъ-за доходныхъ мѣстъ, чиновъ и должностей. Съ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политическій характеръ ея измѣнялс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ъ измѣненіями въ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ъ строѣ общества. Въ той же самой степени, въ какой прогрессъ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валъ, расширялъ и углублялъ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между трудомъ и капиталомъ, въ той же степен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принимала характеръ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илы, 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на угнетение труда. Дѣлалась орудіемъ классов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Послѣ каждой изъ тѣхъ революцій, которыми ознаменовалось развитие борьбы классовъ, угнетающій характеръ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дѣлался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очевиднымъ. Революція 1830 года перенесла центръ тяжест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отъ землевладѣльцевъ къ капиталистамъ, т. е. отъ болѣе отдаленныхъ къ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мъ врагамъ рабочихъ. Буржуазные республиканцы, захватившіе власть во имя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і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ею для Іюньской бойни, чтобы доказать рабочему классу, что „соціаль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означаетъ лишь социальное угнетение его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Монархически-настроенной массѣ буржуазіи и землевладѣльцевъ эти республиканцы доказали въ то же время, что она спокойно можетъ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имъ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я заботы и доходный мѣста. Послѣ этого единственнаго геройскаго ихъ подвига, буржуазнымъ республиканцамъ оставалось только отступить изъ первыхъ—въ послѣдніе ряды „партіи порядка“, этой коалиціи, образовавшейся изъ различныхъ, соперничающихъ между собою наемъ и фракцій эксплуатирующаго класса, открыто выступившаго теперь противъ класса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аго. Самой подходящей, для ихъ совмѣстнаго правленія, формой была 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съ Луи Бонапартомъ въ качествѣ президента, —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ткрытаго классова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 и умысленныхъ оскорбленій „подлой черни“ (vile multitude). Есл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 какъ сказалъ Тьеръ — наименѣе раздѣляла различныя фракціи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го класса, то она вырвала цѣлую пропасть между этимъ классомъ и всѣмъ остальнымъ обществомъ, которое стояло вѣдь его рѣдкихъ рядахъ. Ограниченія, которыя налагались прежд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власть несогласіемъ различныхъ фракцій этого класса, пали теперь сами собою. Въ виду занятаго пролетаріатомъ угрожающаго положенія,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ій классъ дерзко и беззащитно пользуется тепер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ью, какъ національнымъ орудіемъ капитала противъ труда. Но этотъ непрерывный крестовый походъ противъ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й части общества вынуждалъ его предоставлять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се большую и большую силу угнетенія; онъ заставлялъ его также лишиться всѣхъ средствъ обороны противъ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собственную свою парламентскую крѣдость —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браніе.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въ лицѣ Луи Бонапарта, разогнала это Собраніе. Вторая имперія была роднымъ дѣтищемъ республики „партіи порядка“: „док и зѣвку отъ вѣчныхъ“ Имперія, съ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ъ переворотомъ въ качествѣ свидѣтельства о рожденіи и всеобщимъ голосованіемъ, въ качествѣ законнаго его удостовѣренія, съ саблей въ качествѣ

скипетра, — увѣрила, что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крестьянъ, эту огромную массу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не принимающую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го участія въ борьбѣ между трудомъ и капиталомъ.

Она увѣрила, что спасаетъ рабочій классъ, уничтожая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змъ, а вмѣстѣ съ нимъ и открытое подчинені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мущимъ классамъ. Она увѣрила, что спасаетъ имущіе классы, поддерживая ихъ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господство надъ рабочими; наконецъ, имперія увѣрила, что примиряетъ все классы общества, оживляя обманчивый призракъ національной славы. Въ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она была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возможной формо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ъ т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буржуазія уже утратила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ть надо всею націей, а рабочій классъ еще не приобрѣлъ эт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сея мѣръ провозгласилъ ее спасительницей общества. Во время ея господства,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забавленное отъ всякихъ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ъ заботъ, достигло неожиданнаго для него самаго развитія. Ег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 возросли въ невѣроятной степени; финансовая спекуляція безпрепятственно предавалась своимъ косм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ъ оргіямъ; нищета рѣзко выдѣлялась рядомъ съ блестящей, пресыщенной и безстыдной роскошь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повидимому, высоко стоявшая надъ обществомъ, въ сущности сама была скандальнѣйшимъ изъ всехъ скандаловъ эт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чникомъ его заразы. Ея собственное разложеніе и разложеніе „спасеннаго“ ею общества было, наконецъ, разоблачено пытками Пруссіи, которая сама горѣла желаніемъ перенести центръ тяжести этого режима изъ Парижа въ Берлинъ. Имперіаламъ есть самый развращенный и, въ тоже время, послѣдній видъ т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которую вызвало къ жизни нарождающееся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какъ оружіе свое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ія отъ гнета феодализма, и которую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оживившееся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обратило въ орудіе угнетенія труда капиталомъ.

Прямою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ю имперіи была Коммуна. Крикъ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ъ социаль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съ которымъ парижскій пролетаріатъ совершилъ Февральскую революцію, выражалъ собою лишь неопредѣленное стремленіе къ та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ѣ, которая не только устранила бы монархическую форму классова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но положила бы конецъ всякому господству классовъ. Коммуна была опредѣлительнейшей формой та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арижъ, средоточіе и мѣстопробываніе стар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въ то же врем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центръ тяжести французскаго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Парижъ съ оружіемъ въ рукахъ возсталъ противъ попытки Тьера и его клики возстановить и увѣковѣчить старую, завѣщанную имперіей фор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Парижъ могъ сопротивляться толь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лѣдствіе осады, армія была распущена и мѣсто ея заняла національная гвардія, состоявшая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изъ рабо-

чихъ. Это временно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нужно было теперь обратить въ постоянное учрежденіе. Первый декретъ Коммуны предписывалъ уничтоженіе постоянной арміи и замѣну ея вооруженнымъ народомъ.

Коммуна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изъ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ъ совѣтниковъ, выбранныхъ всеобщей подачею голосовъ, во всѣхъ округахъ Парижа. Они был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ми и смѣняемыми.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хъ состояло, разумѣется, изъ рабочихъ или изъ известныхъ сторонников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Коммуна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собою не только парламентскую, но и трудящуюся корпорацію,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ую въ одно и тоже время. Полиція, бывшая до тѣхъ поръ орудіе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лишена была всѣхъ своихъ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ъ функций, и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ъ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и смѣняемое орудіе Коммуны. Также погаснула Коммуна и съ чиновниками всѣхъ другихъ отраслей управленія. Всѣ, начиная съ членовъ самой Коммуны, должны были исполня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службу за обыкновенную рабочую плату. Всѣ съ высш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исчезли и ихъ огромные оклады. Общественныя должности перестали быть привилегіей локсевъ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е только гор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іе, но и всѣ, до тѣхъ поръ исполнявшія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ъ, функціи передамы были въ руки Коммуны.

Уничтоживши постоянную армію и полицію, эти орудія матеріальной власти стара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оммуна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шла далѣе и разбила духовное орудіе угнетенія, силу поповъ. Она декретировала распущеніе и экспроприацію всѣхъ церковныхъ корпорацій, но сколько оны являлись обладающими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ю юридическими лицами. Попы должны были вернуться къ скромной частной жизни и, по примѣру своихъ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ъ - апостоловъ, питаться подаяніемъ вѣрующихъ. Всѣ учебныя заведенія были бесплатно открыты народу и избавлены отъ вмѣнательства церкв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Благодаря этому, не только школь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іе сдѣлалось доступнымъ для каждаго, но и самая наука освобождена была отъ цѣпей, наложенныхъ на нее классовыми предразсудкам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ю властью.

Судебное сословіе лишилось своей мним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которая только прикрывала собою его подчиненіе всѣмъ, сдѣдовавшимъ одно за другимъ,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мъ, которымъ оно попеременно, то присягало въ вѣрности, то измѣняло. Какъ и всѣ остальные слуги общества, судьи сдѣланы были выборным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ми и смѣняемыми.

Парижская Коммун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должна была служить образцомъ для всѣхъ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ъ центровъ Франціи. Какъ только коммуналь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введено было бы въ Парижѣ и во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хъ центрахъ, старый централистическій строй и въ провинціяхъ уступилъ бы мѣст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ію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В кратком очерке предполагавшейс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торый Коммуна не имела времени разработать подробно, прямо говорится, что коммун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ормой каждой, даже самой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деревни, и что постоянное войск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заменено в деревнях народной милицией, с самым коротким сроком службы. Деревенские общины каждого округа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оручить завывание общими веями им дьялами собраню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х в главном городе округа; это окруж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должно было посылать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х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егатов в Париж.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е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олучать строго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инструкций от своих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и могли быть отозваны ими в каждую данную минуту. Не многие, но важные функции, которая должны были бы остаться тогда в веден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е были бы уничтожены — как это заведомо ложно утверждали враги коммуны — но были бы переданы коммунальным должностным лицам. Единство нации не было бы нарушено; напротив, оно было бы организовано, благодар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му устройству; оно стало бы, наконец,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благодаря уничтожению т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ыдававшей себя за воплощение эт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которая хотела стоять выше нации и вне всяк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нее, хотя в сущности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собою лишь паразитный нарост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теле. Между тем как органы, которые служили стар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лишь для угнетения, были бы уничтожены, ее полезные функции были бы отняты у нее, как у силы, желавшей стать выше общества, и переданы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м слугам эт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один раз в период от трех до шести лет рывать, какой из членов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его класса должен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и угнетать народ в парламент, всеобщее голосование должно было служить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му в коммуны народу для того же, для чего служить каждому работодателю его право выбора: назначать работников, надсмотрщиков и бухгалтеров для ведения своего дела. И давно уже доказано, что дельцы общества, также хорошо, как и отдельные личности, умеют находить необходимых для их дела людей. Если же они иногда и ошибаются, то скоро умеют поправить свою ошибку.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ичто не могло быть более чуждым духу Коммуны, как стремление замкнуть всеобщее голосование иерархическими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Всякое нов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явление принимают, обыкновенно, за простую копию со старых или даже отживших форм общества, которая оно до известной степени напоминает собою.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 новую Коммуна,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лась отрицани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мотрели как на попытку возродить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коммуны, кото-

рыя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ли развитію этой власти и легли потомъ въ ея основу. На коммуналь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смотрѣли какъ на стремленіе замѣнить союзомъ маленьк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о которомъ мечтали Монтескье и жирондисты—то единство великихъ народовъ, которое возникло, правда, путемъ насилія, но теперь сдѣлалось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ымъ факторомъ общественна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а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между Коммуной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ью смотрѣли, какъ на отжившую форму старой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ъ крайней централизаціи.

Но мы видимъ, что въ другихъ странахъ извѣстнымъ образомъ сложившія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ія отношенія помѣшали тому класс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ію буржуазной фор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го строя, которое имѣло мѣсто во Франціи. Он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тому, что большіе централь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дошли до того, какъ это мы видимъ въ Англій, развращенными приходскими собраніями, барыничающим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ми совѣтами, свирѣпыми попечительскими о бѣдныхъ—въ городахъ, и наследственными, въ сущности, мировыми судьями, въ деревняхъ. Коммуна была одинаково далека и отъ этого строя. Въ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ему, она вернула б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организму все тѣ силы, которыя поглощала до сихъ поръ паразитный наростъ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итающійся на счетъ общества и мѣшающій его свободному развитію. Однимъ этимъ она выдвинула бы Францію на путь возрожденія.

Средній классъ провинціальныхъ городовъ видѣлъ въ Коммунахъ попытку возстановленія т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его надъ деревней, которымъ онъ пользовался при Луи Филиппѣ, и которое, при Луи Бонапартѣ, уступило мѣсто кажущемуся господству деревни надъ городомъ. Въ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же коммуналь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поставило бы деревенскихъ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подъ духов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окружныхъ городовъ, и дало бы имъ тамъ, въ лицѣ городскихъ рабочихъ,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ъ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ихъ интересовъ. Самый фактъ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Коммуны обусловилъ бы — какъ нечто само собою понятное — мѣ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іе, но уже не въ качествѣ противовѣс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которая стала бы излишней. Только какому нибудь Бисмарку могла придти мысль приписать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ахъ намѣреніе перенести во Францію прусское городск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ее собою каррикатуру стараго французскаго городск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1791 года, и производящее город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іе до степени ничтожнаго колеса въ прус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машинѣ. Уничтоживши два величайшихъ источника расходовъ, армію и чиновничество, Коммуна осуществила бы, наконецъ, дозунгъ вѣсхъ буржуазныхъ революцій, «денеж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динъ фактъ ея существованія предполагалъ уже несуществованіе монархіи, которая, по крайней мѣрѣ въ Европѣ, служитъ обычнымъ балластомъ и прикрытіемъ классов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Она строила республику на основѣ истинно-демократи-

чески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Но ни „дешев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и „истин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не были ее конечною цѣлью; и первое и второе являлись мимоходомъ и сами собой.

Разнообразіе толковъ, которые вызвала Коммуна, и разнообразіе интересовъ, которые нашли въ ней свое выраженіе, доказываютъ, что она был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растяжим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ормой. Всѣ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і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е формы были угнетающими, по своему существу. Истинное значеніе Коммуны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ъ томъ, что она был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ъ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результатомъ борьбы между эксплуатирующимъ и производящимъ классами, найденною, наконец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ормой, при которой можетъ совершитьс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освобожденіе труда.

Внѣ этого послѣдняго условия, Коммуна была бы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и обманомъ.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господство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я не можетъ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рядомъ съ увѣковѣченіемъ его социальнаго порабощенія. Коммуна должна была служить рычагомъ для низверженія т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го основанія, на которомъ держатся классы и классовое господство. Когда совершится освобожденіе труда,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ъ сдѣлается работникомъ,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й трудъ не будетъ уже классовою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Въ виду вышесказаннаго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Рабочихъ. Оно объявляетъ:

что всѣ, примыкающія къ нему общества и отдѣльныя личности принимаютъ истину,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основу своихъ отношеній ко всѣмъ людямъ,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ъ ихъ расы, религій или національности;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безъ правъ, правъ — безъ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Въ этомъ же духѣ выработанъ слѣдующій ниже Уставъ.

Ст. 1.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основа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оздать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унктъ соединенія и совмѣстнаго дѣйствія рабочихъ обществъ,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ъ въ различныхъ странахъ и стремящихся къ одной цѣли, именно: к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ѣ, развитію и полному освобожденію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Ст. 2. Эт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ъ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мъ Рабочихъ.

Ст. 3. Ежегодно собирается общій рабочій Конгрессъ, состоящій изъ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хъ отъ различныхъ вѣтвей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Конгрессъ формулируетъ общія стремленія рабочаго класса, издаетъ необходимыя для успешной дѣятельности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постановленія, и выбираетъ членовъ Главнаго Совѣта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Ст. 4. Каждый Конгрессъ назначаетъ время и мѣсто созванія слѣдующа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Къ опредѣленному имъ сроку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е собираются въ назначенномъ мѣстѣ, не дожидаясь специальныхъ приглашеній. Въ случаѣ надобности,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можетъ перемѣнить мѣсто созванія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нгрессъ опредѣляетъ ежегодно мѣстопребываніе Главнаго Совѣта и выбираетъ его членовъ. Избранный,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имѣетъ право принимать въ свою среду новыхъ членовъ. На каждомъ ежегодномъ Конгрессѣ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ъ гласный отчетъ о работахъ своихъ за истекшій годъ. Въ случаѣ крайней нужды, онъ можетъ созвать Конгрессъ ранѣе обыкновеннаго годоваго срока.

Ст. 5.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образуется изъ рабочихъ различныхъ національностей, имѣющихъ въ Товариществѣ своихъ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Онъ выбираетъ изъ своей среды членовъ необходимаго для веденія дѣлъ бюро: казначея, главнаго секретаря, особыхъ секретарей для различныхъ странъ и т. д.

Ст. 6.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долженъ дѣйствовать въ качествѣ агентуры для сношеній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національными или мѣстными вѣтвями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такъ чтобы рабочіе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всегда имѣли свѣденія о движеніи ихъ класса въ другихъ странахъ; чтобы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 по общему плану можно было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изслѣдованіе соціальнаго положенія различныхъ странъ Европы; чтобы вопросы, возбужденные одной изъ вѣтвей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но имѣющіе общій интересъ, могли обсуждаться всѣми прочими его вѣтвями; и чтобы, въ томъ

случаѣ, когда со стороны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потребуется то или друго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дѣйствіе — напр., пр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ъ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хъ, — всѣ, примыкающія къ нему, общества могли дѣйствовать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 цѣлесообразно.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можетъ, когда найдетъ это нужнымъ, обращаться съ различными предложеніями къ мѣстнымъ или національнымъ рабочимъ обществамъ. Для облегченія своихъ сношеній съ различными вѣтвями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Главный Совѣтъ будетъ печатать періодическіе отчеты.

Ст. 7. Такъ какъ успѣхъ движенія рабочихъ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можетъ быть обезпеченъ только ихъ союзомъ и единодушіемъ; такъ какъ, съ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дѣятельность Главнаго Совѣт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облегчится въ томъ случаѣ, когда онъ войдетъ въ сношенія лишь съ немногими національными центрами, а не съ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и и разрозненными мѣстными обществами, то член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ъ всѣми силами должны стремиться — каждый въ своей странѣ — къ объединенію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ъ въ ней рабочихъ обществъ въ одинъ національный союзъ, съ центральнымъ органомъ управленія. Само собою разумѣется, что исполненіе этой Статьи Устава зависитъ отъ законовъ данной страны, и что каждое мѣст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можетъ входить въ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я сношенія съ Главнымъ Совѣтомъ, если къ этому нѣтъ препятствій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кона.

Ст. 8. Каждая секція имѣетъ право, для сношеній своихъ съ Главнымъ Совѣтомъ, назначить особа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Ст. 9. Каждый, раздѣляющій и отстаивающій принцип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Рабочихъ, можетъ сдѣлаться его членомъ. Но каждая вѣть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отвѣтственна за принятая ею члена.

Ст. 10. При переселеніи изъ одной страны въ другую, каждый членъ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г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встрѣтитъ братскую поддерж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мѣстныхъ членовъ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Ст. 11. Примыкающія къ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Товариществу рабочія общества, хотя и связываются другъ съ другомъ братскими узлам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удерживаютъ тѣмъ не менѣе свойственные имъ виды организаціи.

Ст. 12. Настоящій Уставъ можетъ быть измѣненъ каждымъ Конгрессомъ, если на это согласятся двѣ трети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ихъ на немъ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хъ.

Ст. 13. Все, не предусмотрѣнное Уставомъ, будетъ пополняться особы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подлежащими контролю каждаго Конгресса.



1888 年英文版 《共产党宣言》

1888 年在伦敦出版

由赛·穆尔翻译

恩格斯校订加注

PRICE THREEPENC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AUTHORISED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REDERICK ENGELS.
1888.

London:
WILLIAM REEVES, 83 Charing Cross Road, W.C.

FIFTH EDITION.

PREFACE.

The "Manifesto" was published as the platform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a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first exclusively German, later on international, and, under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Continent before 1848, unavoidably a secret society. At a Congress of the League, held in London in November, 1847, Marx and Engels were commissioned to prepare for publication a complet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arty-programme. Drawn up in German, in January, 1848, the manuscript was sent to the printer in London a few week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February 24th. A French translation was brought out in Paris, shortly before the insurrection of June, 1848.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iss Helen Macfarlane, appeared in George Julian Harney's "Red Republican," London, 1850. A Danish and a Polish edition had also been published.

The defeat of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 1848,—the first great battle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drove again into the background, for a tim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irations of the European working-class. Thenceforth,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was again, as it had been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February, solely between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propertied class; the working class was reduced to a fight for political elbow-room, and to the position of extreme wing of the Middle-class Radicals. Wherever independent proletarian movements continued to show signs of life, they were ruthlessly hunted down. Thus the Prussian police hunted out the Central Board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then located in Cologne. The members were arrested, and, after eighteen months' imprisonment, they were tried in October, 1852. This celebrated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lasted from October 4th till November 12th; seven of the prisoners were sentenced to terms of imprisonment in a fortress, varying from three to six years. Immediately after the sentence, the League was formally dissolved by the remaining members. As to the "Manifesto," it seemed thenceforth to be doomed to oblivion.

When the European working-class had recovered sufficient strength for another attack on the ruling classes,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sprang up. But this association, formed with the express aim of welding into "one body the whole militant proletariat of Europe and America, could not at once proclaim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in the "Manifesto." The International was bound to have a programme broad

enough to be acceptable to the English Trades' Unions, to the followers of Proudhon in France, Belgium, Italy, and Spain, and to the Lasselleans (a) in Germany. Marx, who drew up this programme to the satisfaction of all parties, entirely trusted to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working-class, which was sure to result from combined action and mutual discussion. The very events and vicissitudes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Capital, the defeats even more than the victories, could not help bringing home to men's minds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ir various favourite nostrums, and preparing the way for a more complete insight into the true conditions of working-class emancipation. And Marx was right. The International, on its breaking up in 1874, left the workers quite different men from what it had found them in 1864. Proudhonism in France, Lassalleanism in Germany were dying out, and even the Conservative English Trades' Unions, though most of them had long since severed their connex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ere gradually advancing towards that point at which, last year at Swansea, their President could say in their name "Continental Socialism has lost its terrors for us." In fact: the principles of the "Manifesto" had made considerable headway among the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The Manifesto itself thus came to the front again. The German text had been, since 1850, reprinted several times in Switzerland, England and America. In 1872, it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New York, where th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From this English version, a French one was made in "Le Socialiste" of New York. Since then at least two more English translations, more or less mutilated, have been brought out in America, and one of them has been reprinted in England. The first Russian translation, made by Bakounine, was published at Herzen's "Kotokol" office in Geneva, about 1863; a second one, by the heroic Vera Zaslitch, also in Geneva, 1882. A new Danish edition is to be found in "Socialdemokratisk Bibliothek," Copenhagen, 1885; a fresh French translation in "Le Socialiste," Paris 1886. From this latter a Spanish version was prepared and published in Madrid, 1886. The German reprints are not to be counted, there have been twelve altogether at the least. An Armenian translation, which was to be published in Constantinople some months ago, did not see the light, I am told, because the publisher was afraid of bringing out a book with the name of Marx on it, while the translator declined to call it his own production. Of further translations into other languages I have heard, but have not seen them. Thus the history of the Manifesto

(a) Lassalle personally, to us, always acknowledged himself to be a disciple of Marx, and, as such, stood on the ground of the "Manifesto." But in his public agitation, 1862-64, he did not go beyond demanding co-operative workshops supported by State credit.

reflects, to a great extent,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king-class movement; at present it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wide-spread, the most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f all Socialist Literature, the common platform acknowledged by millions of working men from Siberia to California.

Yet, when it was written, we could not have called it a *Socialist Manifesto*. By Socialists, in 1847, were understood, on the one hand, the adherents of the various Utopian systems: Owenites in England, Fourierists in France, both of them already reduced to the position of mere sects, and gradually dying o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st multifarious social quacks, who, by all manners of tinkering, professed to redress, without any danger to capital and profit, all sorts of social grievances in both cases men outside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and looking rather to the "educated" classes for support. Whatever por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had become convinced of the insufficiency of mere political revolutions, and had proclaimed the necessity of a total social change, that portion, then, called itself Communist. It was a crude,⁶ rough-hewn, purely instinctive sort of Communism; still, it touched the cardinal point and was powerful enough amongst the working class to produce the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 of Cabet, and in Germany, of Weitling. Thus, Socialism was, in 1847, a middle-class movement. Communism a working class movement. Socialism was, on the Continent at least, "respectable"; Communism was the very opposite. And as our no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as tha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must be the act of the working class itself," there could be no doubt as to which of the two names we must take. Moreover, we have, ever since, been far from repudiating it.

The "Manifesto" being our joint production, I consider myself bound to state that th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which forms its nucleus, belongs to Marx. That proposition is: that in every historical epoch, the prevailing mode of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necessarily following from it, form the basis upon which is built up, and from which alone can be explained,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at epoch; that consequently the whole history of mankind (since the dissolution of primitive tribal society, holding land in common ownership) has been a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contests between exploiting and exploited, ruling and oppressed classes; that the history of these class struggles form a series of evolution in which, now-a-days, a stage has been reached where the exploited and oppressed class—the proletariat—cannot attain its emancipation from the sway of the exploiting and ruling class—the bourgeoisie—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and once and for all emancipating society at large from all exploitation, oppression, class-distinctions and class-struggles.

This proposition which, in my opinion, is destined to do for history

what Darwin's theory has done for biology, we, both of us, had been gradually approaching for some years before 1845. How far I had independently progressed towards it, is best shown by my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b) But when I again met Marx at Brussels, in spring, 1845, he had it ready worked out, and put it before me, in terms almost as clear as those in which I have stated it here.

From our joint preface to the German edition of 1872, I quote the following:—

"However much the state of things may have altered during the last 25 year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laid down in this Manifesto are, on the whole, as correct to-day as ever. Here and there some detail might be improv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will depend, as the manifesto itself states, everywhere and at all times, o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existing, and, for that reason, no special stress is laid on the revolutionary measures proposed at the end of Section II. That passage would, in many respects, be very differently worded to-day. In view of the gigantic strides of Modern Industry since 1848, and of the accompanying improved and extended organisa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gained, first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and then, still more, in the Paris Commune, where the proletariat for the first time held political power for two whole months, this programme has in some details become antiquated. One thing especially was proved by the Commune, viz., that "the working-class cannot simply lay hold of the ready-made State machinery, and wield it for its own purposes." (See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London, Truelove, 1871, p. 15, where this point is further developed). Further,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criticism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is deficient in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because it comes down only to 1847; also, that the remarks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ommunists to the various opposition-parties (Section IV.), although in principle still correct, yet in practice are antiquated, becaus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as been entirely changed, and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has swept from off the earth the greater por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re enumerated.

But then, the Manifesto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document which we have no longer any right to alter."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is by Mr. Samuel Moore, the translator of the greater portion of Marx's "Capital." We have revised it in common, and I have added a few notes explanatory of historical allusions.

London, 30th January, 1888.

FREDERICK ENGELS.

^(b)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Florence K. Wischnewetzky, New York. Lovell—London W. Reeves. 188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A SPECTRE is haunting Europe—the spectre of Communism. All the Powers of old Europe have entered into a holy alliance to exorcise this spectre; Pope and Czar, Metternich and Guizot, French Radicals and German police-spies.

Where is the party in opposition that has not been decried as communistic by its opponents in power? Where the Opposition that has not hurled back the branding reproach of Communism, against the more advanced opposition parties, as well as against its re-actionary adversaries?

Two things result from this fact.

I. Communism is already acknowledged by all European Powers to be itself a Power.

II. It is high time that Communists should openly, in the face of the whole world, publish their views, their aims, their tendencies, and meet this nursery tale of the Spectre of Communism with a Manifesto of the party itself.

To this end, Communists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have assembled in London, and sketched the following manifesto, to be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Flemish and Danish languages.

I.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 (a)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b)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Freeman and slave, patrician and plebeian, lord and serf, guild-

(a) By bourgeoisie is meant the class of modern Capitalists, owners of the means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employers of wage-labour. By proletariat, the class of modern wage-labourers who, having no means of production of their own, are reduced to selling their labour-power in order to live.

(b) That is, all *written* history. In 1847, the pre-history of societ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existing previous to recorded history, was all but unknown. Since then, Haxthausen discovered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in Russia, Maurer proved it to be the social foundation from which all Teutonic races started in history, and by and by village communities were found to be, or to have been, the primitive form of society everywhere from India to Ireland. The inner

master (c) and journeyman, in a word, oppressor and oppressed, stood) constant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carried on an uninterrupted, now hidden, now open fight, a fight that each time ended, either in a revolutionary re-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t large, or in the common ruin of the contending classes.

In the earlier epochs of history, we find almost everywhere a complicated arrangement of society into various orders, a manifold gradation of social rank. In ancient Rome we have patricians, knights, plebeians, slaves; in the middle ages, feudal lords, vassals, guild-masters, journeymen, apprentices, serfs; in almost all of these classes, again, subordinate gradations.

The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that has sprouted from the ruins of feudal society, has not done away with class antagonisms. It has but established new classes, new conditions of oppression, new forms of struggle in place of the old ones.

Our epoch, the epoch of the bourgeoisie, possesses, however, this distinctive feature; it has simplified the class antagonisms. Society as a whole is more and more splitting up into two great hostile camps, into two great classes directly facing each other: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From the serfs of the middle ages sprang the chartered burghers of the earliest towns. From these burghers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e bourgeoisie were develope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rounding of the Cape, opened up fresh ground for the rising bourgeoisie. The East-Indian and Chinese markets, the colonisation of America, trade with the colonies, the increase in the means of exchange and in commodities generally, gave to commerce, to navigation, to industry, an impulse never before known, and thereby, to the revolutionary element in the tottering feudal society, a rapid development.

The feudal system of industry, under which industrial production was monopolised by close guilds, now no longer sufficed for the growing wants of the new markets.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took its place. The guild-masters were pushed on one side by the manufacturing middle-class;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rporate guilds vanished in the face of division of labour in each single workshop.

Meantime the markets kept ever growing, the demand ever rising. Even manufacture no longer sufficed. Thereupon, steam and machinery revolutionis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 place of manufacture was taken by the giant, Modern Industry, the place of the industrial middle-class, by industrial millionaires, the leaders of whole industrial armies, the modern bourgeois.

Modern Industry has established the world-market, for which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paved the way. This market has given an

organization of this primitive Communistic society was laid bare, in its typical form, by Morgan's crowning discovery of the true nature of the *gens*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tribe*.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se primeval communities society begins to be differentiated into separate and finally antagonistic classes. I have attempted to retrace this process of dissolution in: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2nd edit., Stuttgart 1886.

(c) Guild-master, that is a full member of a guild, a master within, not a head of a guild

in. nense development to commerce, to navigation, to communication by land. This development has, in its turn, reacted on the extension of industry; and in proportion as industry, commerce, navigation, railways extend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he bourgeoisie developed, increased its capital, and pushed into the background every class handed down from the Middle Ages.

We see, therefore, how the modern bourgeoisie is itself the product of a long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revolutions i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Each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was accompanied by a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dvance of that class. An oppressed class under the sway of the feudal nobility, an armed and 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 in the mediæval commune (*d*), here independent urban republic (as in Italy and Germany), there taxable "third estate" of the monarchy (as in France), afterwards, in the period of manufacture proper, serving either the semi-feudal 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s a counterpoise against the nobility, and, in fact, corner stone of the great monarchies in general, the bourgeoisie has at las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Industry and of the world-market, conquered for itself, in the modern representative State, exclusive political sway. The executive of the modern State is but a committee for managing the common affairs of the whole bourgeoisie.

The bourgeoisie, historically, has played a most revolutionary part.

The bourgeoisie, wherever it has got the upper hand, has put an end to all feudal, patriarchal, idyllic relations. It has pitilessly torn asunder the motley feudal ties that bound man to his "natural superiors," and has left remaining no other nexus between man and man than naked self-interest, than callous "cash payment." It has drowned the most heavenly ecstasies of religious fervour, of chivalrous enthusiasm, of philistine sentimentalism, in the icy water of egotistical calculation. It has resolved personal worth into exchange value, and in place of the numberless indefeasible chartered freedoms, has set up that single, unconscionable freedom—Free Trade. In one word, for exploitation, veiled by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llusions, it has substituted naked, shameless, direct, brutal exploitation.

The bourgeoisie has stripped of its halo every occupation hitherto honoured and looked up to with reverent awe. It has converted the physician, the lawyer, the priest, the poet, the man of science, into its paid wage-labourers.

The bourgeoisie has torn away from the family its sentimental veil, and has reduced the family relation to a mere money relation.

The bourgeoisie has disclosed how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brutal display of vigour in the Middle Ages, which Reactionists so much admire, found its fitting complement in the most slothful indolence. It has been the first to shew what man's activity can bring about. It has

(*d*) "Commune" was the name taken, in France, by the nascent towns even before they had conquered from their feudal lords and masters,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rights as "the Third Estate." Generally speaking, for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England is here taken as the typical country, for its political development, France.

accomplished wonders far surpassing Egyptian pyramids, Roman aqueducts, and Gothic cathedrals; it has conducted expeditions that put in the shade all former Exoduses of nations and crusades.

The bourgeoisie cannot exist without constantly revolutionising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reb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with them the whole relations of society. Conservation of the old modes of production in unaltered form, was, on the contrary, the first condition of existence for all earlier industrial classes. Constant revolutionising of production, uninterrupted disturbance of all social conditions, everlasting uncertainty and agitation distinguish the bourgeois epoch from all earlier ones. All fixed, fast-frozen relations, with their train of ancient and venerable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are swept away, all new-formed ones become antiquated before they can ossify.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The need of a constantly expanding market for its products chases the bourgeoisie over the whole surface of the globe. It must nestle everywhere, settle everywhere, establish connexions everywhere.

The bourgeoisie has through its exploitation of the world-market given a cosmopolitan character to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every country. To the great chagrin of Reactionists, it has drawn from under the feet of industry the national ground on which it stood. All old-established national industries have been destroyed or are daily being destroyed. They are dislodged by new industries, whose introduction becomes a life and death question for all civilised nations, by industries that no longer work up indigenous raw material, but raw material drawn from the remotest zones; industries whose products are consumed, not only at home, but in every quarter of the globe. In place of the old wants, satisfied by the productions of the country, we find new wants, requiring for their satisfaction the products of distant lands and climes. In place of the old local and national seclusion and self-sufficiency, we have 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 And as in material, so also in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Th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of individual nations become common property. National one-sidedness and narrow-mindednes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ssible, and from the numerous national and local literatures, there arises a world literature.

The bourgeoisie, by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al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by the immensely facilitat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draws all, even the most barbarian, nations into civilisation. The cheap prices of its commodities are the heavy artillery with which it batters down all Chinese walls, with which it forces the barbarians' intensely obstinate hatred of foreigners to capitulate. It compels all nations, on pain of extinction, to adopt the bourgeois mode of production; it compels them to introduce what it calls civilisation into their midst, *i.e.*, to become bourgeois themselves. In one word, it creates a world after its own image.

The bourgeoisie has subjected the country to the rule of the towns. It has created enormous cities,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urban population as compared with the rural, and has thus rescue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idiocy of rural life. Just as it has made the country dependent on the towns, so it has made barbarian and semi-barbarian countries dependent on the civilised ones, nations of peasants on nations of bourgeois, the East on the West.

The bourgeoisie keeps more and more doing away with the scattered stat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property. It has agglomerated population, centralised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has concentrated property in a few hands.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is was political centralisation. Independent, or but loosely connected provinces, with separate interests, laws, governments and systems of taxation, became lumped together into one nation, with one government, one code of laws, one national class-interest, one frontier and one customs-tariff.

The bourgeoisie, during its rule of scarce one hundred years, has created more massive and more colossal productive forces than have all preceding generations together. Subjection of Nature's forces to man, machinery, application of chemistry to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steam-navigation, railways, electric telegraphs, clearing of whole continents for cultivation, canalization of rivers, whole populations conjured out of the ground—what earlier century had even a presentiment that such productive forces slumbered in the lap of social labour?

We see the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on whose foundation the bourgeoisie built itself up, were generated in feudal society. At a certain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feudal society produced and exchanged, the feudal organis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one word, the feudal relations of property became no longer compatible with the already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they became so many fetters. They had to be burst asunder; they were burst asunder.

Into their place stepped free competition, accompanied by a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titution adapted to it, and by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sway of the bourgeois class.

A similar movement is going on before our own eyes.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with it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f exchange and of property, a society that has conjured up such gigantic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is like the sorcerer, who is no longer able to control the powers of the nether world whom he has called up by his spells. For many a decade past the histor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s but the history of the revolt of modern productive forces against modern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gainst the property relations that ar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bourgeoisie and of its rule. It is enough to mention the commercial crises that by their periodical return put on its trial, each time more threateningly, the existence of the entire bourgeois society. In these crises a great part not only of the existing products, but also of the previously created productive forces, are periodically destroyed. In these crises there breaks out an epidemic that, in all earlier epochs, would have seemed an absurdity—the epidemic of over-production. Society suddenly finds itself put back into a state of momentary barbarism; it appears as if a famine, a universal war of devastation had cut off the supply of every means of subsistence:

industry and commerce seem to be destroyed ; and why ? Because there is too much civilisation, too much means of subsistence, too much industry, too much commerce. The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disposal of society no longer tend to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ditions of bourgeois property ;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become too powerful for these conditions, by which they are fettered, and so soon as they overcome these fetters, they bring disorder into the whole of bourgeois society, endanger the existence of bourgeois property. The conditions of bourgeois society are too narrow to comprise the wealth created by them. And how does the bourgeoisie get over these crises ? On the one hand by enforced destruction of a mass of productive forces ; on the other, by the conquest of new markets, and by the more thorough exploitation of the old ones. That is to say, by paving the way for more extensive and more destructive crises, and by diminishing the means whereby crises are prevented.

The weapons with which the bourgeoisie felled feudalism to the ground are now turned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itself.

But not only has the bourgeoisie forged the weapons that bring death to itself ; it has also called into existence the men who are to wield those weapons—the modern working-class—the proletarians.

In proportion as the bourgeoisie, *i. e.*, capital, is develop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is the proletariat, the modern working-class, developed, a class of labourers, who live only so long as they find work, and who find work only so long as their labour increases capital. These labourers, who must sell themselves piecemeal, are a commodity, like every other article of commerce, and are consequently exposed to all the vicissitudes of competition, to all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market.

Owing to the extensive use of machinery and to division of labour, the work of the proletarians has lost all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consequently, all charm for the workman. He becomes an appendage of the machine, and it is only the most simple, most monotonous, and most easily acquired knack, that is required of him. Hence,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f a workman is restricted, almost entirely,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at he requires for his maintenance, and for the propagation of his race. But the price of a commodity, and therefore also of labour, is equal to its cost of production. In proportion, therefore, as the repulsiveness of the work increases, the wage decreases. Nay more, in proportion as the use of machinery and division of labour increases,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he burden of toil also increases, whether by prolongation of the working hours, by increase of the work exacted in a given time, or by increased speed of the machinery, etc.

Modern industry has converted the little workshop of the patriarchal master, into the great factory of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 Masses of labourers, crowded into the factory, are organised like soldiers. As privates of the industrial army they are placed under the command of a perfect hierarchy of officers and sergeants. Not only are they slaves of the bourgeois class, and of the bourgeois State, they are daily and hourly enslaved by the machine, by the over-looker, and, above all, by the individual bourgeois manufacturer himself. The more openly this despotism proclaims gain to be its end and aim, the more petty, the more hateful and the more embittering it is.

The less the skill and exertion or strength implied in manual labour,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modern industry becomes developed, the more is the labour of men superseded by that of women. Differences of age and sex have no longer any distinctive social validity for the working class. All are instruments of labour, more or less expensive to use according to their age and sex.

No sooner is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labourer by the manufacturer, so far, at an end, that he receives his wages in cash, than he is set upon by the other portions of the bourgeoisie, the landlord, the shopkeeper, the pawnbroker, etc.

The lower strata of the Middle class—the small tradespeople, shopkeepers, and retired tradesmen generally, the handicraftsmen and peasants—all these sink gradually into the proletariat, partly because their diminutive capital does not suffice for the scale on which Modern Industry is carried on, and is swamped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large capitalists, partly because their specialised skill is rendered worthless by new methods of production. Thus the proletariat is recruited from all classes of the population.

The proletariat goes through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With its birth begins its struggle with the bourgeoisie. At first the contest is carried on by individual labourers, then by the workpeople of a factory, then by the operatives of one trade, in one locality, against the individual bourgeois who directly exploits them. They direct their attacks not against the bourgeois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but against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themselves; they destroy imported wares that compete with their labour, they smash to pieces machinery, they set factories ablaze, they seek to restore by force the vanished status of the workman of the Middle Ages.

At this stage the labourers still form an incoherent mass scattered over the whole country, and broken up by their mutual competition. If anywhere they unite to form more compact bodies, this is not yet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own active union, but of the union of the bourgeoisie, which class, in order to attain its own political ends, is compelled to set the whole proletariat in motion, and is moreover yet, for a time, able to do so. At this stage, therefore, the proletarians do not fight their enemies, but the enemies of their enemies, the remnants of absolute monarchy, the landowners, the non-industrial bourgeois, the petty bourgeoisie. Thus the whole historical movement i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the bourgeoisie; every victory so obtained is a victory for the bourgeoisie.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e proletariat not only increases in number; it becomes concentrated in greater masses, its strength grows, and it feels that strength more. The various interests and conditions of life within the ranks of the proletariat are more and more equalised, in proportion as machinery obliterates all distinctions of labour, and nearly everywhere reduces wages to the same low level. The growing competition among the bourgeois, and the resulting commercial crises, make the wages of the workers ever more fluctuating. The unceasing improvement of machinery, ever more rapidly developing, makes their livelihood more and more precarious; the collisions between individual workmen and individual bourgeois take more and more the character of collision

between two classes. Thereupon the workers begin to form combinations (Trades' Unions) against the bourgeois; they club together in order to keep up the rate of wages; they found permanent associations in order to make provision beforehand for these occasional revolts. Here and there the contest breaks out into riots.

Now and then the workers are victorious, but only for a time. The real fruit of their battles lies, not in the immediate result, but in the ever expanding union of the workers. This union is helped on by the improv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at are created by modern industry, and that place the workers of different localities in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It was just this contact that was needed to centralise the numerous local struggles, all of the same character, into one national struggle between classes. But every class struggle is a political struggle. And that union, to attain which the burghers of the Middle Ages, with their miserable highways, required centuries, the modern proletarians, thanks to railways, achieve in a few years.

This organisation of the proletarians into a class, and consequently into a political party, is continually being upset again b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workers themselves. But it ever rises up again, stronger, firmer, mightier. It compels legislative recogni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ivisions among the bourgeoisie itself. Thus the ten-hours' bill in England was carried.

Altogether collisions between the classes of the old society further, in many ways,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t. The bourgeoisie finds itself involved in a constant battle. At first with the aristocracy; later on, with those portions of the bourgeoisie itself, whose interests have become antagonistic to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at all times, with the bourgeoisie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all these battles it sees itself compelled to appeal to the proletariat, to ask for its help, and thus, to drag it into the political arena. The bourgeoisie itself, therefore, supplies the proletariat with its own elements of political and general education, in other words, it furnishes the proletariat with weapons for fighting the bourgeoisie.

Further,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entire sections of the ruling classes are, by the advance of industry, precipitated into the proletariat, or are at least threatened in their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These also supply the proletariat with fresh elements of enlightenment and progress.

Finally, in times when the class-struggle nears the decisive hour, the process of dissolution going on within the ruling class, in fact within the whole range of old society, assumes such a violent, glaring character, that a small section of the ruling class cuts itself adrift, and joins the revolutionary class, the class that holds the future in its hands. Just as, therefore, at an earlier period, a section of the nobility went over to the bourgeoisie, so now a portion of the bourgeoisie goes over to the proletariat, and in particular, a portion of the bourgeois ideologists, who have raised themselves to the level of comprehending theoretically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as a whole.

Of all the classes that stand face to face with the bourgeoisie to-day, the proletariat alone is a really revolutionary class. The other classes decay and finally disappear in the face of modern industry; the proletariat is its special and essential product,

The lower middle-class, the small manufacturer, the shopkeeper, the artisan, the peasant, all these fight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to save from extinction their existence as fra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 They are therefore not revolutionary, but conservative. Nay more, they are reactionary, for they try to roll back the wheel of history. If by chance they are revolutionary, they are so, only in view of their impending transfer into the proletariat, they thus defend not their present, but their future interests, they desert their own standpoint to place themselves at that of the proletariat.

The "dangerous class," the social scum, that passively rotting mass thrown off by the lowest layers of old society, may, here and there, be swept into the movement by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ts conditions of life, however, prepare it far more for the part of a bribed tool of reactionary intrigue.

In the conditions of the proletariat, those of old society at large are already virtually swamped. The proletarian is without property; his relation to his wife and children has no longer any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bourgeois family-relations; modern industrial labour, modern subjection to capital, the same in England as in France, in America as in Germany, has stripped him of every trace of national character. Law, morality, religion, are to him so many bourgeois prejudices, behind which lurk in ambush just as many bourgeois interests.

All the preceding classes that got the upper hand, sought to fortify their already acquired status by subjecting society at large to their conditions of appropriation. The proletarians cannot become masters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society, except by abolishing their own previous mode of appropriation, and thereby also every other previous mode of appropriation. They have nothing of their own to secure and to fortify; their mission is to destroy all previous securities for, and insurances of, individual property.

All previous historical movements were movements of minorities, or in the interest of minorities.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is the self-conscious, independent movement of the immense majorit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immense majority. The proletariat, the lowest stratum of our present society, cannot stir, cannot raise itself up, without the whole superincumbent strata of official society being sprung into the air.

Though not in substance, yet in form, the struggle of the proletariat with the bourgeoisie is at first a national struggle. The proletariat of each country must, of course, first of all settle matters with its own bourgeoisie.

In depicting the most general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t, we traced the more or less veiled civil war, raging within existing society, up to the point where that war breaks out into open revolution, and where the violent overthrow of the bourgeoisie,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way of the proletariat.

Hitherto, every form of society has been based,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on the antagonism of oppressing and oppressed classes. But in order to oppress a class, certain conditions must be assured to it under which it can, at least, continue its slavish existence. The serf, in the period of serfdom, raised himself to membership in the commune, just as

the petty bourgeois, under the yoke of feudal absolutism, managed to develop into a bourgeois. The modern labourer,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rising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sinks deeper and deeper below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his own class. He becomes a pauper, and pauperism develops more rapidly than population and wealth. And here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bourgeoisie is unfit any longer to be the ruling class in society, and to impose its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upon society as an over-riding law. It is unfit to rule because it is incompetent to assure an existence to its slave within his slavery, because it cannot help letting him sink into such a state, that it has to feed him, instead of being fed by him. Society can no longer live under this bourgeoisie, in other words, its existence is no longer compatible with society.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the existence, and for the sway of the bourgeois class, is the formation and augmentation of capital; the condition for capital is wage-labour. Wage-labour rests exclusively on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labourers. The advance of industry, whose involuntary promoter is the bourgeoisie, replaces the isolation of the labourers, due to competition, by their revolutionary combination, due to associ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y, therefore, cuts from under its feet the very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bourgeoisie produces and appropriates products. What the bourgeoisie therefore produces, above all, are its own grave-diggers. Its fall and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t are equally inevitable.

II.

PROLETARIANS AND COMMUNISTS.

In what relation do the Communists stand to the proletarians as a whole?

The Communists do not form a separate party opposed to other working-class parties.

They have no interests separate and apart from those of the proletariat as a whole.

They do not set up any sectarian principles of their own, by which to shape and mould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The Communist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working class parties by this only: 1. In the national struggles of the proletarians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point out and bring to the front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entire proletariat, independently of all nationality. 2. In the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ich the strugg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has to pass through, they always and everywhere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movement as a whole.

The Communists, therefore, are on the one hand, practically, the most advanced and resolute se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parties of every country, that section which pushes forward all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oretically, they have over the great mass of the proletariat the advantage of clearly understanding the line of march, the conditions, and the ultimate general results of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The immediate aim of the Communist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all the other proletarian parties : form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overthrow of the bourgeois supremacy, conquest of political power by the proletariat.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of the Communists are in no way based on ideas or principles that have been invented, or discovered, by this or that would-be universal reformer.

They merely express, in general terms, actual relations springing from an existing class struggle, from a historical movement going on under our very eyes. The abolition of existing property-relations is not at all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ommunism.

All property relations in the past have continually been subject to historical change consequent upon the change 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French Revolution, for example, abolished feudal property in favour of bourgeois property.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ommunism is not the abolition of property generally, but the abolition of bourgeois property. But modern bourgeois private property is the final and most complete expression of the system of producing and appropriating products, that is based on class antagonism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many by the few.

In this sense, the theory of the Communists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single sentence :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We Communists have been reproached with the desire of abolishing the right of personally acquiring property as the fruit of a man's own labour, which property is alleged to be the ground work of all personal freedom, activity and independence.

Hard-won, self-acquired, self-earned property! Do you mean the property of the petty artizan and of the small peasant, a form of property that preceded the bourgeois form? There is no need to abolish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has to a great extent already destroyed it, and is still destroying it daily.

Or do you mean modern bourgeois private property?

But does wage-labour create any property for the labourer? Not a bit. It creates capital, *i.e.*, that kind of property which exploits wage-labour, and which cannot increase except upon condition of begetting a new supply of wage-labour for fresh exploitation. Property, in its present form, is based on the antagonism of capital and wage-labour. Let us examine both sides of this antagonism.

To be a capitalist, is to have not only a purely personal, but a social *status* in production. Capital is a collective product, and only by the united action of many members, nay, in the last resort, only by the united action of all members of society, can it be set in motion.

Capital is therefore not a personal, it is a social power.

When, therefore, capital is converted into common property, into the property of all members of society, personal property is not thereby transformed into social property. It is only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the property that is changed. It loses its class-character.

Let us now take wage-labour.

The average price of wage-labour is the minimum wage, *i.e.*, that quantum of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hich is absolutely requisite to keep the labourer in bare existence as a labourer. What, therefore, the

wage-labourer appropriates by means of his labour, merely suffices to prolong and reproduce a bare existence. We by no means intend to abolish this personal appropri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labour, an appropriation that is mad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reproduction of human life, and that leaves no surplus wherewith to command the labour of others. All that we want to do away with, is the miserable character of this appropriation, under which the labourer lives merely to increase capital, and is allowed to live only in so far as the interest of the ruling class requires it.

In bourgeois society, living labour is but a means to increase accumulated labour. In Communist society, accumulated labour is but a means to widen, to enrich, to promote the existence of the labourer.

In bourgeois society, therefore, the past dominates the present; in communist society, the present dominates the past. In bourgeois society capital is independent and has individuality, while the living person is dependent and has no individuality.

And the abolition of this state of things is called by the bourgeois, abolition of individuality and freedom! And rightly so. The abolition of bourgeois individuality, bourgeois independence, and bourgeois freedom is undoubtedly aimed at.

By freedom is meant, under the present bourgeois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free trade, free selling and buying.

But if selling and buying disappears, free selling and buying disappears also. This talk about free selling and buying, and all the other "brave words" of our bourgeoisie about freedom in general, have a meaning, if any, only in contrast with restricted selling and buying, with the fettered traders of the Middle ages, but have no meaning when opposed to the Communistic abolition of buying and selling, of the bourgeois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of the bourgeoisie itself.

You are horrified at our intending to do away with private property. But in your existing society, private property is already done away with for nine-tenths of the population; its existence for the few is solely due to its non-existence in the hands of those nine-tenths. You reproach us, therefore, with intending to do away with a form of property,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whose existence is, the non-existence of any property for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society.

In one word, you reproach us with intending to do away with your property. Precisely so: that is just what we intend.

From the moment when labour can no longer be converted into capital, money, or rent, into a social power capable of being monopolised, *i.e.*, from the moment when individual property can no longer be transformed into bourgeois property, into capital, from that moment, you say, individuality vanishes.

You must, therefore, confess that by "individual" you mean no other person than the bourgeois, than the middle-class owner of property. This person must, indeed, be swept out of the way, and made impossible.

Communism deprives no man of the power to appropriate the products of society: all that it does is to deprive him of the power to subjugate the labour of others by means of such appropriation.

It has been objected, that upon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ll work will cease, and universal laziness will overtake us

According to this, bourgeois society ought long ago to have gone to the dogs through sheer idleness; for those of its members who work, acquire nothing, and those who acquire anything, do not work. The whole of this objection is but another expression of the tautology: that there can no longer be any wage-labour when there is no longer any capital.

All objections urged against the Communistic mode of producing and appropriating material products, have, in the same way, been urged against the Communistic modes of producing and appropriating intellectual products. Just as, to the bourgeois, the disappearance of class property is the disappearance of production itself, so the disappearance of class culture is to him identical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all culture.

That culture, the loss of which he laments, is, for the enormous majority, a mere training to act as a machine.

But don't wrangle with us so long as you apply, to our intended abolition of bourgeois property, the standard of your bourgeois notions of freedom, culture, law, &c. Your very ideas are but the outgrowth of the conditions of your bourgeois production and bourgeois property, just as your jurisprudence is but the will of your class made into a law for all, a will, whose essential character and direction are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your class.

The selfish misconception that induces you to transform into eternal laws of nature and of reason, the social forms springing from your presen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form of property—historical relations that rise and disappear in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on—this misconception you share with every ruling class that has preceded you. What you see clearly in the case of ancient property, what you admit in the case of feudal property, you are of course forbidden to admit in the case of your own bourgeois form of property.

Abolition of the family! Even the most radical flare up at this infamous proposal of the Communists.

On what foundation is the present family, the bourgeois family, based? On capital, on private gain. In its completely developed form this family exists only among the bourgeoisie. But this state of things finds its complement in the practical absence of the family among the proletarians, and in public prostitution.

The bourgeois family will vanish as a matter of course when its complement vanishes, and both will vanish with the vanishing of capital.

Do you charge us with wanting to stop the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by their parents? To this crime we plead guilty.

But, you will say, we destroy the most hallowed of relations, when we replace home education by social.

And your education! Is not that also social, and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you educate, by the intervention, direct or indirect, of society by means of schools, &c.? The Communists have not invented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ety in education; they do but seek to alter the character of that intervention, and to rescue education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ruling class.

The bourgeois clap-trap about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about the hallowed co-relation of parent and child, become all the more disgusting, the more, by the action of Modern Industry, all family ties

among the proletarians are torn asunder, and their children transformed into simple articles of commerce and instruments of labour.

But you Communists would introduce community of women, screams the whole bourgeoisie in chorus.

The bourgeois sees in his wife a mere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He hears that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re to be exploited in common, and, naturally, can come to no other conclusion, than that the lot of being common to all will likewise fall to the women.

He has not even a suspicion that the real point aimed at is to do away with the status of women as mer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For the rest, nothing is more ridiculous than the virtuous indignation of our bourgeois at the community of women which, they pretend, is to be openly and officially established by the Communists. The Communists have no need to introduce community of women; it has existed almost from time immemorial.

Our bourgeois, not content with having the wives and daughters of their proletarians at their disposal, not to speak of common prostitutes, take the greatest pleasure in seducing each others' wives.

Bourgeois marriage is in reality a system of wives in common and thus, at the most, what the Communists might possibly be reproached with, is that they desire to introduce, in substitution for a hypocritically concealed, an openly legalised community of women. For the rest,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abolition of the present system of production must bring with it the aboli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women springing from that system, *i.e.*, of prostitutio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The Communists are further reproached with desiring to abolish countries and nationality.

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 We cannot take from them what they have not got. Since the proletariat must first of all acquire political supremacy, must rise to be the leading class of the nation, must constitute itself *the* nation, it is, so far, itself national, though not in the bourgeois sense of the word.

National differences, and antagonisms between peoples, are daily more and more vanishing, ow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to freedom of commerce, to the world-market, to uniformity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corresponding there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roletariat will cause them to vanish still faster. United action, of the leading civilised countries at least, is one of the first condition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In proportion as the exploitation of one individual by another is put an end to, the exploitation of one nation by another will also be put an end to. In proportion as the antagonism between classes within the nation vanishes, the hostility of one nation to another will come to an end.

The charges against Communism made from a religious, a philosophical, and, generally, from an ideological standpoint, are not deserving of serious examination.

Does it require deep intuition to comprehend that man's ideas, views, and conceptions, in one word, man's consciousness, changes with every change in the conditions of his material existence, in his social relations and in his social life?

What else does the history of ideas prove, than that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changes its character in proportion as material production is changed? The ruling ideas of each age have ever been the ideas of its ruling class.

When people speak of ideas that revolutionise society, they do but express the fact, that within the old society, the elements of a new one have been created, and that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ld ideas keeps ever pace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ld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When the ancient world was in its last throes, the ancient religions were overcome by Christianity. When Christian ideas succumbed in the 18th century to rationalist ideas, feudal society fought its death-battle with the then revolutionary bourgeoisie. The ideas of religious liberty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merely gave expression to the sway of free competition within the domain of knowledge.

"Undoubtedly," it will be said, "religious, moral, philosophical and juridical ideas have been modified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ut religion, morality,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nstantly survived this change."

"There are besides, eternal truths, such as Freedom, Justice, etc., that are common to all states of society. But Communism abolishes eternal truths, it abolishes all religion, and all morality, instead of constituting them on a new basis; it therefore acts in contradiction to all past historical experience."

What does this accusation reduce itself to? The history of all past society has cons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 antagonisms, antagonisms that assumed different forms at different epochs.

But whatever form they may have taken, one fact is common to all past ages, viz., the exploitation of one part of society by the other. No wonder, then, that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past ages, despite all the multiplicity and variety it displays, moves within certain common forms, or general ideas, which cannot completely vanish except with the total disappearance of class antagonisms.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s the most radical rupture with traditional property-relations; no wonder that its development involves the most radical rupture with traditional ideas.

But let us have done with the bourgeois objections to Communism.

We have seen above, that the first step in the revolution by the working class, is to raise the proletariat to the position of ruling class, to win the battle of democracy.

The proletariat will use its political supremacy, to wrest, by degrees, all capital from the bourgeoisie, to centralise al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i.e., of the proletariat organised as the ruling class; and to increase the total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rapidly as possible.

Of course, in the beginning, this cannot be effected except by means of despotic inroads on the rights of property, and on the conditions of bourgeois production; by means of measures, therefore, which appear economically insufficient and untenable, but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he movement, outstrip themselves, necessitate further inroads upon the old social order, and are unavoidable as a means of entirely revolutionis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ese measures will of course b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Nevertheless in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the following will be pretty generally applicable.

1. Abolition of property in land and application of all rents of land to public purposes.
2. A heavy progressive or graduated income tax.
3. Abolition of all right of inheritance.
4. Confiscation of the property of all emigrants and rebels.
5. Centralisation of credit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by means of a national bank with State capital and an exclusive monopoly.
6. Centralisation of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7. Extension of factories and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owned by the State : the bringing into cultivation of waste lan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il gen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a common plan.
8. Equal liability of all to labour.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armies, especially for agriculture.
9.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 gradual aboli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by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over the country.
10. Free education for all children in public schools. Abolition of children's factory labour in its present form.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industrial production, &c., &c.

When,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class distinctions have disappeared, and all production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vast associ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 the public power will lose its political character. Political power, properly so called, is merely the organised power of one class for oppressing another. If the proletariat during its contest with the bourgeoisie is compelled, by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s, to organise itself as a class, if, by means of a revolution, it makes itself the ruling class, and, as such, sweeps away by force the old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then it will, along with these conditions, have swept away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class antagonisms, and of classes generally, and will thereby have abolished its own supremacy as a class.

In place of the old bourgeois society, with its classes and class antagonisms, we shall have an association, in which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III.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LITERATURE.

1. Reactionary Socialism.
- a. Feudal Socialism.

Owing to their historical position, it became the vocation of the aristocracies of France and England to write pamphlets against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July 1830, and in the English reform agitation, these aristocracies again succumbed to the

hateful upstart. Thenceforth, a serious political contest was altogether out of question. A literary battle alone remained possible. But even in the domain of literature the old cries of the restoration period (a) had become impossible.

In order to arouse sympathy, the aristocracy were obliged to lose sight apparently,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o formulate their indictment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exploited working class alone. Thus the aristocracy took their revenge by singing lampoons on their new master, and whispering in his ears sinister prophecies of coming catastrophe.

In this way arose feudal socialism: half lamentation, half lampoon; half echo of the past, half menace of the future; at times, by its bitter, witty and incisive criticism, striking the bourgeoisie to the very hearts' core, but always ludicrous in its effect, through total incapacity to comprehend the march of modern history.

The aristocracy, in order to rally the people to them, waved the proletarian alms-bag in front for a banner. But the people, so often as it joined them, saw on their hindquarters the old feudal coats of arms, and deserted with loud and irreverent laughter.

One section of the French Legitimists, and "Young England," exhibited this spectacle.

In pointing out that their mode of exploitation was different to that of the bourgeoisie, the feudalists forget that they exploited under circumstances and conditions that were quite different, and that are now antiquated. In showing that, under their rule, the modern proletariat never existed, they forget that the modern bourgeoisie is the necessary offspring of their own form of society.

For the rest, so little do they conceal the reactionary character of their criticism, that their chief accusation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amounts to this, that under the bourgeois *régime* a class is being developed, which is destined to cut up root and branch the old order of society.

What they upbraid the bourgeoisie with is not so much that it creates a proletariat, as that it creates a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In political practice, therefore, they join in all coercive measures against the working-class; and in ordinary life, despite their high falutin phrases, they stoop to pick up the golden apples dropped from the tree of industry, and to barter truth, love, and honour for traffic in wool, beetroot-sugar, and potato spirit (b).

As the parson has ever gone hand in hand with the landlord, so has Clerical Socialism with Feudal Socialism.

Nothing is easier than to give Christian asceticism a Socialist tinge.

(a) Not the English Restoration 1660 to 1689, but the French Restoration 1814 to 1830.

(b) This applies chiefly to Germany where the landed aristocracy and squirearchy have large portions of their estates cultivated for their own account by stewards, and are, moreover, extensive beetroot-sugar manufacturers and distillers of potato spirits. The wealthier British aristocracy are, as yet, rather above that; but they, too, know how to make up for declining rents by lending their names to floaters of more or less shady joint-stock companies.

Has not Christianity declaimed against private property, against marriage, against the State? Has it not preached in the place of these, charity and poverty, celibacy and mortification of the flesh, monastic life and Mother Church? Christian Socialism is but the Holy Water with which the priest consecrates the heart-burnings of the aristocrat.

b. Petty Bourgeois Socialism.

The feudal aristocracy was not the only class that was ruined by the bourgeoisie, not the only class whos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pined and perished in the atmosphere of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The mediæval burgesses and the small peasant proprietors were the precursors of the modern bourgeoisie. In those countries which are but little developed, industrially and commercially, these two classes still vegetate side by side with the rising bourgeoisie.

In countries where modern civilisation has become fully developed, a new class of petty bourgeois has been formed, fluctuating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and ever renewing itself as a supplementary part of bourgeois society.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is class, however, are being constantly hurled down into the proletariat by the action of competition, and, as modern industry develops, they even see the moment approaching when they will completely disappear as an independent section of modern society, to be replaced, in manufactures,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by overlookers, bailiffs and shopmen.

In countries, like France, where the peasants constitute far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pulation, it was natural that writers who sided with the proletariat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should use, in their criticism of the bourgeois régime, the standard of the peasant and petty bourgeois, 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se intermediate classes should take up the cudgels for the working-class. Thus arose petty bourgeois Socialism. Sismondi was the head of this school, not only in France but also in England.

This school of Socialism dissected with great acuteness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 production. It laid bare the hypocritical apologies of economists. It proved, incontrovertibly, the disastrous effects of machinery and division of labour; the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and land in a few hands; overproduction and crises; it pointed out the inevitable ruin of the petty bourgeois and peasant, the misery of the proletariat, the anarchy in production, the crying inequalit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 industrial war of extermination between nations, the dissolution of old moral bonds, of the old family relations, of the old nationalities.

In its positive aims, however, this form of Socialism aspires either to restoring the old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and with them the old property relations, and the old society, or to cramping the modern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within the frame work of the old property relations that have been, and were bound to be,

exploded by those means. In either case, it is both reactionary and Utopian.

Its last words are: corporate guilds for manufacture; patriarchal relations in agriculture.

Ultimately, when stubborn historical facts had dispersed all intoxicating effects of self-deception, this form of Socialism ended in a miserable fit of the blues.

German or "True" Socialism.

The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literature of France, a literature that origina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a bourgeoisie in power, and that w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his power, was introduced into Germany at a time when the bourgeoisie, in that country, had just begun its contest with feudal absolutism.

German philosophers, would be philosophers, and *beaux esprits*, eagerly seized on this literature, only forgetting, that when these writings immigrated from France into Germany, French social conditions had not immigrated along with them. In contact with German social conditions, this French literature lost all its immediat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ssumed a purely literary aspect. Thus, to the German philosoph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demands of the first French Revolution were nothing more than the demands of "Practical Reason" in general, and the utterance of the will of the revolutionary French bourgeoisie signified in their eyes the laws of pure Will, of Will as it was bound to be, of true human Will generally.

The work of the German *literati* consisted solely in bringing the new French ideas into harmony with their ancient philosophical conscience, or rather, in annexing the French ideas without deserting their own philosophic point of view.

This annexation took place in the same way in which a foreign language is appropriated, namely by translation.

It is well known how the monks wrote silly lives of Catholic Saints *over* the manuscripts on which the classical works of ancient heathendom had been written. The German *literati* reversed this process with the profane French literature. They wrote their philosophical nonsense beneath the French original. For instance, beneath the French criticism of 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money, they wrote "Alienation of Humanity," and beneath the French criticism of the bourgeois State they wrote, "Dethronement of the Category of the General," and so for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philosophical phrases at the back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criticisms they dubbed "Philosophy of Action," "True Socialism," "German Science of Soci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and so on.

The French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literature was thus completely emasculated. And, since it ceased in the hands of the German to express the struggle of one class with the other, he felt conscious of having overcome "French one-sidedness" and of representing, not true

requirements, but the requirements of Truth, not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but the interests of Human Nature, of Man in general, who belongs to no class, has no reality, who exists only in the misty realm of philosophical phantasy.

This German Socialism, which took its school-boy task so seriously and solemnly, and extolled its poor stock-in-trade in such mountebank fashion, meanwhile gradually lost its pedantic innocence.

The fight of the German, and, especially, of the Prussian bourgeoisie, against feudal aristocracy and absolute monarchy, in other words, the liberal movement, became more earnest.

By this, the long wished-for opportunity was offered to "True Socialism" of confronting the political movement with the socialist demands, of hurling the traditional anathemas against liberalism, against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gainst bourgeois competition, bourgeois freedom of the press, bourgeois legislation, bourgeois liberty and equality, and of preaching to the masses that they had nothing to gain, and everything to lose, by this bourgeois movement. German Socialism forgot, in the nick of time, that the French criticism, whose silly echo it was, presupposed the existence of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with its corresponding economic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adapted thereto, the very things whose attainment was the object of the pending struggle in Germany.

To the absolute governments, with their following of parsons, professors, country squires and officials, it served as a welcome scarecrow against the threatening bourgeoisie.

It was a sweet finish after the bitter pills of floggings and bullets, with which these same governments, just at that time, dosed the German working-class risings.

While this "True" Socialism thus served the governments as a weapon for fighting the German bourgeoisie, it, at the same time, directly represented a reactionary interest, the interest of the German Philistines. In Germany the *petty bourgeois* class, a *relique*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since then constantly cropping up again under various forms, is the real social basis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

To preserve this class, is to preserve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 in Germany. The industrial and political supremacy of the bourgeoisie threatens it with certain destruction;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on the other, from the rise of a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True" Socialism appeared to kill these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It spread like an epidemic.

The robe of speculative cobwebs, embroidered with flowers of rhetoric, steeped in the dew of sickly sentiment, this transcendental robe in which the German Socialists wrapped their sorry "eternal truths" all skin and bone, served to wonderfully increase the sale of their goods amongst such a public.

And on its part, German Socialism recognised, more and more, its own calling as the bombastic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tty bourgeois Philistine.

It proclaimed the German nation to be the model nation, and the German petty Philistine to be the typical man. To every villainous meanness of this model man it gave a hidden, higher, socialistic interpretation, the exact contrary of its real character. "It went to the extreme

length of directly opposing the "brutally destructive" tendency of Communism, and of proclaiming its supreme and impartial contempt of all class struggles. With very few exceptions, all the so-called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ublications that now (1847) circulate in Germany belong to the domain of this foul and enervating literature.

2. Conservative or Bourgeois Socialism.

A part of the bourgeoisie is desirous of redressing social grievances, in order to secure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bourgeois society.

To this section belong economists, philanthropists, humanitarians, improvers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organisers of charity, members of societi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temperance fanatics, hole and corner reformers of every imaginable kind. This form of Socialism has, moreover, been worked out into complete systems.

We may cite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as an example of this form.

The socialistic bourgeois want all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social conditions without the struggles and dangers necessarily resulting therefrom. They desire the existing state of society minus its revolutionary and disintegrating elements. They wish for a bourgeoisie without a proletariat. The bourgeoisie naturally conceives the world in which it is supreme to be the best; and bourgeois socialism develops this comfortable conception into various more or less complete systems. In requiring the proletariat to carry out such a system, and thereby to march straightway into the social New Jerusalem, it but requires in reality, that the proletariat should remain within the bounds of existing society, but should cast away all its hateful ideas concerning the bourgeoisie.

A second and more practical, but less systematic form of this socialism sought to depreciate ever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eyes of the working class, by showing that no mere political reform, but only a change in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in economical relations, could be of any advantage to them. By changes in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this form of Socialism, however, by no means understands abolition of the bourgeoi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 abolition that can be effected only by a revolution, but administrative reforms, based o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se relations; reforms, therefore, that in no respect affe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ur, but, at the best, lessen the cost, and simplify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of bourgeois government.

Bourgeois Socialism attains adequate expression, when, and only when, it becomes a mere figure of speech.

Free trad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king class. Protective duti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king class. Prison Reform: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king class. This is the last word and the only seriously meant word of bourgeois Socialism.

It is summed up in the phrase : the bourgeois is a bourgeois—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king class.

3. Critical-Utopia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We do not here refer to that literature which, in every great modern revolution, has always given voice to the demands of the proletariat : such as the writings of Babeuf and others.

The first direct attempts of the proletariat to attain its own ends, made in times of universal excitement, when feudal society was being overthrown, these attempts necessarily failed, owing to the then undeveloped state of the proletariat, as well as to the absence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its emancipation, conditions that had yet to be produced, and could be produced by the impending bourgeois epoch alone.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at accompanied these first movements of the proletariat had necessarily a reactionary character. It inculcated universal asceticism and social levelling in its crudest form.

The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systems properly so called, those of St. Simon, Fourier, Owen and others, spring into existence in the early undeveloped period, described abov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see section I.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The founders of these systems see, indeed, the class antagonisms, as well as the action of the decomposing elements in the prevailing form of society. But the proletariat, as yet in its infancy, offers to them the spectacle of a class without any historical initiative or any independent political movemen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 antagonism keeps even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s they find it, does not as yet offer to them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They therefore search after a new social science, after new social laws, that are to create these conditions.

Historical action is to yield to their personal inventive action, historically created conditions of emancipation to phantastic ones, and the gradual, spontaneous class-organis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to an organisation of society specially contrived by these inventors. Future history resolves itself, in their eyes, into the propaganda and the practical carrying out of their social plan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ir plans they are conscious of caring chiefly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class, as being the most suffering class. On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eing the most suffering class does the proletariat exist for them.

The undeveloped state of the class struggle, as well as their own surroundings, cause Socialists of this kind to consider themselves far superior to all class antagonisms. They want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even that of the most favoured. Hence, they habitually appeal to society at large, without distinction of class; nay, by preference, to the ruling class. For how can people, when once they understand their system, fail to see in it the best possible plan of the best possible state of society?

Hence, they reject all political, and especially all revolutionary action: they wish to attain their ends by peaceful means, and endeavour, by small experiments, necessarily doomed to failure, and by the force of example,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new social Gospel.

Such phantastic pictures of future society, painted at a time when the proletariat is still in a very undeveloped state, and has but a phantastic conception of its own position, correspond with the first instinctive yearnings of that class for a gener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But these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ublications contain also a critical element. They attack every principle of existing society. Hence they are full of the most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practical measures proposed in them, such as the aboli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of the family, of the carrying on of industries for the account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of the wage system, the proclamation of social harmony, the convers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State into a mere superintendence of production, all these proposals point solely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class-antagonisms which were, at that time, only just cropping up, and which, in these publications, are recognised under their earliest, indistinct and undefined forms only. These proposals, therefore, are of a purely Utopian character.

The significance of Critical-Utopia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bears an inverse relation to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proportion as the modern class struggle develops and takes definite shape, this phantastic standing apart from the contest, these phantastic attacks on it lose all practical value and all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Therefore, although the originators of these systems were, in many respects, revolutionary, their disciples have, in every case, formed mere reactionary sects. They hold fast by the original views of their masters, in opposition to the progressi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t. They, therefore, endeavour, and that consistently, to deaden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o reconcile the class antagonisms. They still dream of experimental realisation of their social Utopias, of founding isolated "phalanstères," of establishing "Home Colonies," of setting up a "Little Icaria" (c)—duodecimo editions of the New Jerusalem, and to realise all these castles in the air, they are compelled to appeal to the feelings and purses of the bourgeois. By degrees they sink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reactionary conservative Socialists depicted above, differing from these only by more systematic pedantry, and by their fanatical and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the miraculous effects of their social science.

They, therefore, violently oppose all political 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such action, according to them, can only result from blind unbelief in the new Gospel.

The Owenites in England, and the Fourierists in France, respectively oppose the Chartist and the "Réformistes."

(c) Phalanstères were socialist colonies on the plan of Charles Fourier; Icaria was the name given by Cabet to his Utopia and, later on, to his American Communist colony.

V.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S IN RELATION TO THE
VARIOUS EXISTING OPPOSITION PARTIES.

Section II. has made clear the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sts to the existing working class parties, such as the Chartists in England and the Agrarian Reformers in America.

The Communists fight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e immediate aim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the momentary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but in movement of the present, they also represent and take care of the future of that movement. In France the Communists ally themselves with the Social-Democrats (a),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bourgeoisie, reserving, however, the right to take up a critical position in regard to phrases and illusions traditionally handed down from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Switzerland they support the Radicals,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the fact that this party consists of antagonistic elements, partly of Democratic Socialists, in the French sense, partly of radical bourgeoisie.

In Poland they support the party that insists on an agrarian revolution, as the prime condition for national emancipation, that party which fomented the insurrection of Cracow in 1846.

In Germany they fight with the bourgeoisie whenever it acts in a revolutionary way, against the absolute monarchy, the feudal squirearchy, and the petty bourgeoisie.

But they never cease, for a single instant, to instil into the working class the clearest possible recognition of the hostile antagonism between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in order that the German workers may straightway use, as so many weapons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that the bourgeoisie must necessarily introduce along with its supremacy, and in order that, after the fall of the reactionary classes in Germany, the fight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itself may immediately begin.

The Communists turn their attention chiefly to Germany, because that country is on the eve of a bourgeois revolution, that is bound to be carried out under more advanced conditions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and with a much more developed proletariat, than that of England wa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of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because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Germany will be but the prelude to an immediately following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short, the Communists everywhere support ever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gainst the exis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of things.

(a) The party then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by Ledru-Rollin, in literature by Louis Blanc, in the daily press by the *Réforme*.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signified, with these its inventors, a section of the Democratic or Republican party more or less tinged with Socialism.

In all these movements they bring to the front, as the leading question in each, the property question, no matter what its degree of development at the time.

Finally, they labour everywhere for the union and agreement of the democratic parties of all countries.

The Communists disdain to conceal their views and aims. 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ic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N.B.—Most of the advertised prices of 1s. are increased now to 1s. 6d. net. and 2/- net.

THE BELLAMY LIBRARY

- IMPRISONED SOULS. WOMAN AND HER SEX ENVIRONMENT. By VIOLET ASHMOLE. Cr. 8vo, 1s. net (cloth copies can be had).
- OVER-PRODUCTION AND WAN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 and Solution. By MICHAEL FLURSCHEIM. 1s. 6d. net, cloth, 3s. net.
- STRIKE OF A SEX: A NOVEL, by GEORGE N. MILLER. Price 1s. 6d. net (cloth, 2s. 6d. net), 33,000 sold.
- A SOCIALIST OREED FOR CHRISTIANS. WITH EXPOSITIONS, by CHARLES WM. STUBBS, D.D., Bishop of Truro. Cr. 8vo, 1s. 6d. net (cloth, 2s. 6d. net).
- TEN MEN OF MONEY ISLAND, by S. F. NORTON. Revised Edition with Appendix by H. SEYMOUR. 1s. 6d. net (cloth, 2s. 6d. net).
- AFTER THE STRIKE OF A SEX; or ZUGASSENT'S DISCOVERY, by GEO. NOTES MILLER. Cr. 8vo, 1s. 6d. net (cloth, 2s. 6d. net).
- WHAT IS PROP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 by P. J. PROUDHON. Cr. 8vo, Double Volume, cloth, 4s. 6d. net, or in 2 paper vols., 3s. net.
- LAWS OF ETERNAL LIFE. Being Studies in the Church Catechism, by REV. STEWART D. HEADLAM. Paper, 1s. 6d. net (cloth, 2s. 6d. net). "MR. HEADLAM starts with the assertion that the CHURCH CATECHISM is the best MANUAL OF SOCIALISM."
- THE 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 Essays, by RICHARD T. ELY, Ph.D. Price 1s. 6d. net (cloth, 2s. 6d. net).
- WOM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y AUGUST BEBEL. Price 2s. net (cloth, 3s. 6d. net).
- RENT, INTEREST AND WAGES, or the Real Bearings of the Land Question, by M. FLURSCHEIM. Second Edition.
- KARL MARX'S THEORY OF VALUE (Complete). Forming the First 9 Chapters of "CAPITAL." Price 2s. net (cloth, 3s. net).
- A SEQUEL TO LOOKING BACKWARD, or Looking Further Forward, by RICHARD MICHAELIS. Paper cover, 1s. 6d. net.
-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Exposition of Modern Socialism, by L. GEONLUND. English Edition, Ed. by B. SHAW. cr. 8vo, 1s. 6d. net (cloth, 2s. 6d. net).
- MISS LUDINGTON'S SISTER, by EDWARD BELLAMY, with Portrait, 1s. net.
- DR. HEIDENHOFF'S PROCESS, by EDWARD BELLAMY, Portrait, 1s. net.
- LOOKING BACKWARD, by EDWARD BELLAMY. With new Copious Index and Portrait, paper 2s. net, limp cloth, 3s. net, stiff cloth boards, 3s. 6d. net. Also Cheap Edition, octavo size, paper, 1s. net.
- THE AWAKENING OF WOMEN: or WOMAN'S PART IN EVOLUTION. By FRANCIS SWINEY. Entirely Revised Ed., 1s. 6d. net (cloth, 2s. 6d. net).

Published by WM. REEVES, 83 CHARING CROSS ROAD, W.C.

PRINTED BY THE NEW TEMPLE PRESS, NOBBURY CRESCENT, S.W.16.

1920 年中文版 《共产党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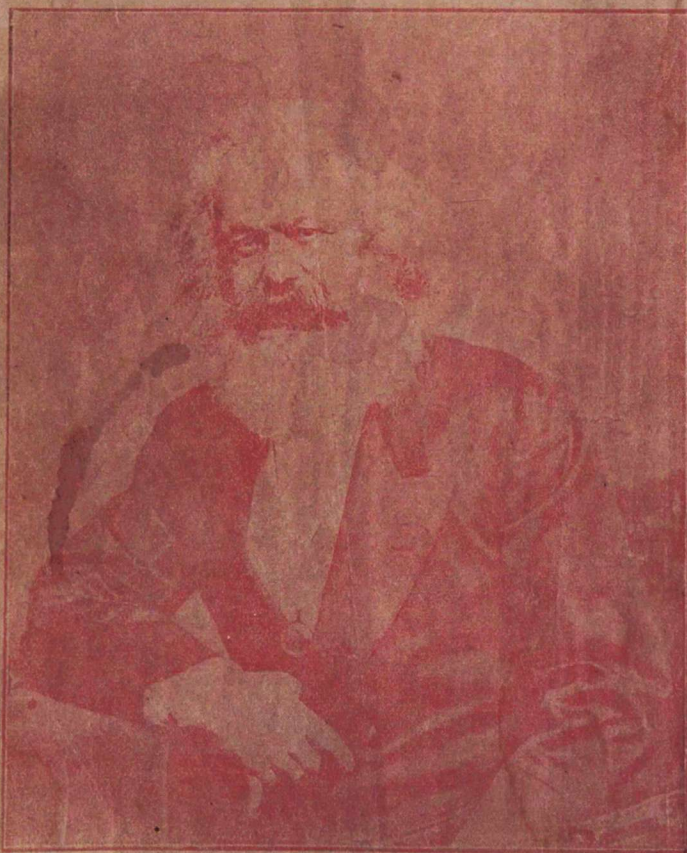
1920 年 8 月在上海出版

由陈望道翻译

種 一 第 書 叢 小 究 研 義 主 會 社

言 宣 產 黨 共

著 合 斯 爾 格 安 斯 格 馬
譯 道 學 陳



斯 格 馬

共產黨宣言

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着，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舊歐洲有權力的人都因為要驅除這怪物，加入了神聖同盟。羅馬法王，俄國皇帝，梅特涅，基佐（Gизо），法國急進黨，德國偵探，都在這裏面。

那些在野的政黨，有不被在朝的政敵，誣作共產主義的嗎？那些在野的政黨，對於其他更急進的在野黨，對於保守的政黨，不都是用共產主義這名詞作回罵的套語嗎？

由這種事實可以看出兩件事：

- 一、共產主義，已經被全歐洲有權力的人認作一種有權力的東西。
- 二、共產黨員，已經有了時機，可以公然在全世界底面前，用自己黨底宣言發表自己的意見，目的，趨向，並對抗關於共產主義這怪物底無稽之談。

爲了這緣故，各國共產黨員便在倫敦開了個會，草了下列的宣言，用英法德意佛蘭德丹麥各國底語言，公布於世界。

第一章 有產者及無產者 (有產者就是具有財產的人資本家財主原文 Bourgeois)
(無產者就是沒有財產的勞動家原文 Proletarians)

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爭鬥底歷史。

自由民 (Freeman) 和奴隸 (Slave)、貴族 (Patrician) 和平民 (Plebeian)、領主 (Lord) 和農奴 (Serf)、行東 (Guild-master) 和傭工 (Journey-man)、總而言之，就是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從古到今，沒有不站在反對的地位，繼續着明爭暗鬥。每次爭鬥底結局，不是社會全體革命的新建設告成，便是交戰的兩階級並倒。

我們略看前代的歷史，便會曉得無論何處都是組織複雜的社會裏分出各種階級，社會的地位分出各種等級。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 (Knight)、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家臣 (Vassal)、行東、傭工、徒弟 (Apprentice) 和農奴；這些階級裏，又隸屬許多等級。

從封建社會底廢址上發生的近代有產社會，也有免不了階級對抗；不過造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手段，新的爭鬥形式，來代替那舊的罷了。

我們的時代，就是這有產階級（Bourgeoisie）時代，他的特色就是把階級對抗弄簡單了。社會全體現已漸次分裂成爲對壘的兩大營寨，互相敵視的兩大階級：這就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由中世紀底農奴裏面，曾發生一種最初都市底特許市民；這些市民，便是有產階級最初的種子。

嗣後，美洲底發見，好望角底周航，新添給有產階級一些發展地；東印度和中華底市場，美洲底殖民，殖民地底貿易，交換機關和物品底增多，又都使當時的商業航海業，和製造工業，受一種空前的刺激；因此，那革命種子便在頹廢的封建社會裏急激的發展了。

在封建時代的工業組織底下，生產事業是由同行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這時，便不能

應付新市場上需要底增加了；於是手工工場組織 (Manufacturing system) 便佔了他的地位。各業行東被工場製造家這種中等階級擠倒；聯合的各行組合間底分工，也就讓各個工場底分工替代了。

接着市場一天比一天擴大，需要又一天比一天增加；這時手工工場組織，也不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汽及大機器出來演了一場生產事業底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取了手工工業底地位；豪富的實業家，產業軍底總首領，近代的有產階級，便把產業界的中等階級降伏了。

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這世界的市場，引線全在美國底發見。有了這種市場，商業，航業，陸路交通，便成就了絕大的發達；這種發達又轉而促進產業底發展。產業，商業，航業，鐵路，既這樣發達，有產階級，也照這比例發達，資本愈加增多，將中世紀留下的一切階級，都靈情推倒了。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曉得近代有產階級這種東西，全是長期發達和生產及交換方法迭次革命的結果。

有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個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個武裝的自治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共和都市（如德意），有的變成王政治下納稅的『第三階級團』（如法）；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被半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貴族底器具，大王國統一底柱石；最後，近代的產業和世界的市場，都成立了，他們就成了有產階級，那近代代議制度國家底政權，都被他們一手把持；國家底行政機關，只算辦理他們公共事務底一個委員會罷了。

從歷史上看來，有產階級也曾有過革命的功勞。

有產階級得了權勢，那封建的，家長的，山林的種種關係，便到處被他們銷滅了。結合人

和他的「生來的長上」(Natural Superiors)的封建的線索，被他們盡情剪斷了。人和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甚麼別的聯結關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人的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無數永久特許的自由換了單純的無理的自由，就是自由貿易。單簡說，有產階級，是由從前戴着宗教和政治的假面的掠奪，更變為赤條條的，沒廉恥的，迫切的，殘忍的掠奪。

有產階級，已將有名譽的受人尊敬的職業底榮光毀滅了！無論醫生，法律家，僧侶，詩人，科學家，都成了他們的工銀勞動者。

有產階級，已將家庭情愛底面帕扯碎了。家族關係，弄成了單純的金錢關係。

有產階級，已明白表示保守派所讚賞的那中世武士底蠻勇行為，他們就是懶惰逸樂，也可以做到的。他們第一表示人間底活動力是無所不能。他們做成的驚人事業，便是埃及底金字塔，羅馬底水道，中世底禮拜堂，也趕不上；他們的長途遠征，便是前代一切國民底遷

徒和十字軍，也趕不上。

有產階級，倘不將生產工具不斷的革命，牽動生產關係以及全社會關係跟着革命，那是一定不能存在的。這和前代恰恰相反，前代的一切工業階級，是須將生產底舊方法，保存不變，纔能夠存在。所以，生產不斷的革命，全社會的狀況不斷的搖動，不安和平底繼續不斷，這就是有產階級時代和一切前代不同的標識。古來凝固的，冰結的各種關係，都跟着偏見舊說一掃而去；就是新式事物，也等不到安固，早成廢物。凝結的散作煙雲，神聖的墮入穢褻。人們至此，也只得懷了冷酷的心情，應付他的遭遇和同類了。

爲了生產品增多，必須時常擴張市場，有產階級，遂布滿世界，他們到處密集，到處棲止，到處發生關係。

有產階級，壟斷了世界的市場，於是各國底生產和消費，便都帶了世界的性質。無論保守派如何憤恨，但國家的地盤，已受產業革命底影響崩壞了，舊式國民的產業，一切都已經

崩壞，或正在崩壞。他的地位就被新產業奪去了。這種新產業開始，就是一切文明國民生死關頭的大問題。這種產業底原料，現在不專靠國產，儘有國外輸來的，這種產業底生產品，不專在國內銷售，儘有供給世界各地的。從前的需要，只限於國貨就夠了；如今却要求國外的生產品。從前只株守一鄉一國，如今却也講求各國國民的交際和互助。便是智識的生產，也已經和物質的一樣。各國國民智識的創作，已成了世界的公有物。國民的偏見和狹小的度量，漸漸沒有存在的餘地。世界的文學，已從許多國民的地方的文學當中興起了。

有產階級，既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機關，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機關，於是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牽入文明隊裏。他那價廉物美的射擊力，就是中華底城壁，也被他打破了；就是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向他降伏。世界各國，因為要免得滅亡，也只得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將所謂文明輸入他們的社會，便也成了有產階級。簡單說，有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形，造成了世界。

有產階級，壓迫鄉村使他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建設許多都市，又將都市增加了比農村更多的人口；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田舍生活。他們既使鄉村屈服於都市，又同樣使野蠻和半開化的國民屈服於文明國民，農業國民屈服於資本國民，東洋屈服於西洋。

有產階級將人口，生產機關，財產底渙散狀況漸漸除去，教人口團聚了，生產機關集中了，財產聚在少數人手裏了。從此必然生出的結果，便是政治的中央集權。他將各個利害，法律，政府，稅則不同的獨立區域或勉強團結的區域，團結起來合做一個政府，一樣法典，一樣利害，一個國境，一樣稅則的國民。

有產階級得權不過百年，他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開關以來一切時代生產力底總和還要大。自然力屈服於人類，機器，工業和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航路，鐵道，電報，全大陸底開墾，河流底疏浚，好像用魔力從地下喚起似的全人類！在前代，誰曾想到這樣的生產力，居然包含在社會的勞動裏面呢？

我們從此可以曉得做有產階級基礎生產和交換機關，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裏面。這種生產和交換機關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及交換狀況，換句話說，就是農業和手工業底封建的組織，簡括些說，就是財產底封建的關係，便不能和那已經發展的生產力適合了。這種關係，便變成了許多障礙物。這種關係，便必要崩壞的，結局果然崩壞了。

於是，自由競爭，便來代替了他們的地位，適合這自由競爭的社會和政治組織，也就跟着出現；有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也就跟着得到了。

同樣的運動，又映到我們的眼裏了。有他的生產，交換，財產關係的近代有產階級社會，就是惹起這般大規模生產和交換的社會，好像術士念咒召來魔鬼，現在卻沒有鎮伏他的能力了。數十年來的工商史，只是近代生產力對於近代生產方法，對於有產階級的生存和統治權的財產關係謀叛底歷史。證明這個事實，只要舉出商業上的恐慌就夠了；這種恐慌，隔了一定期間，便反復發生，一回兇過一回，常常震動有產階級社會底全部。在這種恐慌的

時候，不但當時現存的生產品大部分破壞，連從前造成的生產力，也要一同破壞。在這種恐慌裏面，發生一種古代夢想不到的流行病——就是生產過度的流行病。社會突然現出回到野蠻的景象，彷彿饑饉驟至，又彷彿舉世大戰，衣食全要斷絕，一切工商業，現出就要破壞的狀況。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全是文明過度，衣食過度，工業過度，商業過度底緣故。在社會指揮之下的生產力，不能再促進有產階級財產制度底發達了；而且他的權力太大，無法救正那些制度，他雖然受那些制度的束縛，一旦打破了束縛，他便使有產社會全部擾亂，使財產制度根本動搖。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太過狹小，不能包含那大生產力所產出的財富。那麼，有產階級怎樣逃出這種恐慌呢？他不外：一面用強壓力毀壞生產力底大部分，一面開闢新市場，並盡量掠奪舊市場。這可以說，是朝着更廣大，更兇猛的恐慌方面走去，把防止恐慌的手段拋棄了。

如此，有產階級顛覆封建度的武器，現在卻向着有產階級自身了。

但有產階級，不但鍛鍊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還培養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就是近代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就是近代勞動階級）跟着有產階級（就是資本）照同一的比例發達了。這勞動階級，必須有工做纔能生活，必須他們的勞力能增加，增加資本纔有工做；時時須把身體賣卻。他們便是一種貨物，和別的商品一樣，免不了競爭底盛衰，行情底漲落。

無產階級底勞動，因為用機器越多，分工越細的緣故，完全失掉了個性，便自然沒得興趣。他們變成了機器底附屬品，做的全是些簡單的，呆板的，又很容易學會的小技術。因此，產出這種勞動者的費用，限定只夠支持勞動者自身和繁殖子孫所必需的衣食費就得了。但是商品底價值，總是跟着產出費漲落的；勞動也是一種商品，自然逃不出這個定理；所以工作越發簡單，工資也就越發減少。並且，爲了機器和分工越發推廣底緣故，便延長勞動時間或增加一定時間內的勞動，或增加機器底速度，使勞動者苦役底負擔越發增加。

有了近世產業，那家長式的主人屬下底小工場，就變成資本家底大工廠了。工廠裏那些勞動者，都組織得和軍隊一般。他們都已成了產業軍底兵卒，壓在營長，排長底下動彈不得。他們不但做了有產階級底奴隸，有產階級國家底奴隸，並且時時刻刻做了機器，稽查，乃至製造家財主個人底奴隸。這專制主義越發明白宣布營利是他的目的，越發是可賤，可惡，可恨。

近代工業越發達，手工裏的技術和腕力漸歸無用，男子底勞動越發被女子佔去。年齡和男女底差別，在勞動階級，沒有什麼社會效果上的分別。他們同是勞動底工具，不過費用一層因着年齡和男女有多寡罷了。

勞動者被製造家掠奪完了，到了用現金付給工資的時候，同時又被有產階級底別一部分——地主，舖主，當店等等利用了。

中等階級底下層——小商人，零賣商和歇業的商人，工匠和農夫——這些人，也漸漸沈到

無產階級裏了。這原因一半因為他們的小資本夠不上營大規模的近世產業，被別的大資本家打滅了；一半因為他們的專門技術，自從有了新生產方法，已不值半文錢。因為這樣，社會底各階級，便不住的補充到無產階級來了。

無產階級，也是經過種種時期發達起來的。無產階級發生的那一日，便是同有產階級爭鬪開始的那一日。最初是各個勞動者反抗直接掠奪自己的那資本公司；再進一步，就是工廠工人聯合反抗；更進一步，便是一個地方同業工人合力反抗。可是他們反抗，並沒向着有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只向着一些生產工具攻擊；——搗毀同他們勞動競爭的輸入品哪，敲碎新式機器哪，焚燒工廠哪，鬧的都是這等事情。他們的期望，只是用腕力來回復中世勞動者的故態。

在這時期裏，勞動者只在各處結了鬆懈的團體，內部一有齟齬，便瓦解了。有的地方團結稍為緊密的團體，那又不是他們自動的團結，全是受了有產階級底利用。當時，有產階級

爲了政治上的目的，煽動全國的勞動者，並借重他們的力量。勞動者在這時期裏，攻擊的並不是自己的敵人，是敵人底敵人，就是專制政體底遺物，地主，產業以外的富豪，小富豪等。所以歷史上一切的運動，都是有產階級的運動；所得的一切勝利，也都是有產階級的勝利。

可是一方面產業愈加發達，一方面無產階級不但人數加增，而且漸次集中結成大團體，力量加大，對於自己力量的自覺也愈深了。而且，機器又抹去各種勞動底差別，因此勞動階級間的利害關係和生活狀況，就漸趨一致；工資又幾乎到處降到同樣低的水平。有產階級裏面，又漸起競爭，商業因此起了恐慌，勞動者底工資，也因此更被動搖；而且，機器不住的進步，使他們的生活刻刻不安；勞動者和資本家個人的衝突，又漸漸帶着兩階級間衝突的彩色。於是乎，勞動者就結了團體（勞動聯合）去對抗資本家。他們聯合底目的，在於維持工資率。因爲時時須得反抗，就設了個準備糧食的永久聯合。這種對抗既成，便到處發生騷動的事了。

在這等爭鬪裏，勞動者原是時時得了勝利，但這不過是一時的事。那真正的效果，並不在眼前的利益，是在勞動者底團結繼續擴大。這種團結，很受了近代產業所造成進步的交通機關許多輔助。因為有了這樣交通機關，遠方的勞動者也互相接觸了。集合同性質的許多地方爭鬪，圍成全國一大階級的爭鬪，正有這種接觸底需要。但每次階級爭鬪，都是政治上的爭鬪。這樣團體，如果教交通不便的中世市民來團結，決非幾世紀不行；多謝鐵路與人方便，近代的無產者，只消幾年便成就了。

無產者這樣組成一階級，便自然成了一政黨；但因為勞動者和勞動者間不免互相競爭，團體還是時常顛覆的。可是一定復興起來，越發強，越發堅固，越發有力。後來逢到有產階級黨派分歧的時候，就強求立法機關承認勞動者特殊的利益。像英國底十點鐘勞動法案，便是這樣成功的。

舊社會各種階級裏許多衝突，也為無產階級底發展開闢了許多坦途。有產階級自己，

常站在戰爭中間，當初同貴族戰；隨後，同別的產業進步上利害不同的有產階級戰；又常同外國有產階級戰。在這等戰爭裏，有產階級不得不鼓勵無產階級，求他的幫助；因此便將無產階級牽入政治的漩渦中。於是，有產階級，就將自己的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供給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將和有產階級爭鬥的武器付給無產階級了。

更進一層說，我們所知道權力階級爲了產業進步的緣故，已經刻刻向無產階級墜落，至少也已經危殆不安。無產階級也因此得了智識和進步底新種子。

最後，就是在階級爭鬥要決裂的時期，那權力階級裏面（據實說，舊社會全組織裏面）分崩底經過，很帶着幾分激烈的性質；有一小部分的權力階級，竟脫離舊關係，投入革命階級——掌握將來的階級。從前有一部分貴族投向有產階級，如今也有一部分有產階級投向無產階級，那一部分能夠了解這種歷史運動有理想的資本家，更是如此。

現在和有產階級對峙的各階級當中，只有這無產階級，才算得真正的革命階級。近世

產業雖然能夠叫別的一切階級漸次衰頹，歸於消滅；但只有這無產階級，是他特別的主要的產物。

中等階級底下層，像小製造家，零賣商，工匠，農夫這些人，原也是同有產階級爭鬪，好保持中等階級的地位；他們的爭鬪並非革命的，只是保守的。不但保守，他們並且希望把歷史的機輪向後退轉，簡直是復古的。就使他們有時來革命，也是因為覺得自己將要墜入無產階級的緣故。他們不是防衛現在的地位，只是計較將來的利害，他們纔拋掉現在的立脚地，去站在無產階級的立脚地。

那班「危險階級」社會的贅疣，從舊社會最下層淘汰下來，正在腐朽的羣衆，也往往到處捲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但他們的生活狀況，很容易做保守黨陰謀所收買的器具。一切舊社會的狀況，現已沈沒在無產階級的狀況中了。無產階級，並沒有財產；他和他妻子底關係，並沒有有產階級那樣家族關係。近世產業的勞動，近世資本底逼迫，英國同法

國一樣，美國同德國一樣，無產階級都沒有絲毫國民的特性存在。法律、道德、宗教，在無產階級看起來，都是有產階級底偏見，背後都藏着有產階級利益的伏兵。

從前一切階級，且得了權勢，沒有不拚命使社會屈從他們的分配條件，好鞏固他們已得的境况。無產者若不將以前的分配方法推翻，便沒有做社會生產力底主人翁的日子。因此，從前一切分配方法，是不得不推翻的。他們並沒有甚麼自己的東西要保衛防護；他們的使命，只是破毀從前對於個人財產的一切防護和保險。

古來歷史的運動，都是少數人的運動，或是爲了少數人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運動，却與此不同。他是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大多數人自覺的獨立的運動。但現在社會最下層的無產階級，若不把官僚社會壓在上層的全部拋出九霄雲外，自己是不會翻身上達的。

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的爭鬪，實質上雖然不是這樣，形式上最初總是從一國一國的入手。各國底無產階級，必須首先處置本國底有產階級。

我們默察無產階級發展的大勢，其初只是一些私鬥，末後總是爆發起來，成了公然的革命，推倒有產階級，築起無產階級權力的基礎。

向來一切社會底形式，我們都曉得他建築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底對抗上面。但壓迫一階級，至少總還要給他能夠維持奴隸生存的條件。在農奴制時代，農奴也還可以變成都市的公民；在封建專制治下，小資產家也還可以變成大紳商。然而近世的勞動者，却完全與此相反；不但不能隨着產業同時上進，却是逐漸低下，逐漸淪沈到自己階級底生存條件以下。他竟變作貧民，於是貧困底發展，比人口和財富還要快。從此，就可曉得，有產階級已不配再當社會的權力階級，已不配再強要社會維持他的存在了。他不配做支配者，是因為他那種奴隸制，不能保障奴隸底存在，是因為他已經不是為奴隸所養，已經在不得不養奴隸的形況中了。社會已不能在無產階級底下生存了。換句話說，有產階級底存在，已不適合現社會了。

有產階級存在和權力底根本條件，在資本底成立和屯積資本底要件，在工銀勞動、工銀勞動，全靠勞動者相互競爭。但有產階級無意中促進產業的進步，却已使勞動者從競爭的孤立變成協力的團結。近代產業發達，使有產階級的生產和占有底基礎從根破壞了。有產階級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己的墳墓。有產階級底傾覆和無產階級底勝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第二章 無產者和共產黨

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究竟站在怎樣的地位呢？

共產黨，並不是爲反對別的勞動階級的黨派特別組織。

共產黨，並不是離開了無產者全體的利益，還有別的利益。

他們也不是想樹立一種自派的主義，去做無產階級運動的模範。

共產黨和別的勞動階級各黨派不同的地方，只是：（一）各國無產階級在他們國裏爭

鬥的時候，共產黨一定脫出一切國家的界限，替無產階級全體指示共通的利害；（二）勞動階級對資本階級的爭鬥，無論是發達到怎樣地步，無論甚麼時候，無論甚麼地方，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運動全體利害。

所以共產黨在實際一方面，固然是各國勞動階級中最進步最果決的一派，也就是能夠策進別的一切黨派的一派；在理論一方面，也是最能了解勞動運動底進路，情勢，以及最後的結果，纔能夠幫助無產者的大團結。

共產黨直接的目的，也和別的一切勞動黨一樣：（一）糾合無產者團成一個階級，（二）顛覆有產階級底權勢，（三）無產階級掌握政權。

共產黨學理的結論，決不像一般的社會改良家，拿發明或發見的主義理想作根據。

共產黨不過把現在的階級爭鬥，就是我們眼前所經過歷史的運動中旺盛起來的實際情勢，用普通的言語表現出來罷了。廢止向來的財產關係，並不是共產主義底特徵。

過去的一切財產關係，不斷的影響到歷史狀況底變遷，成了歷史變遷底主因。

例如法國革命，因為擁護資本家的財產，就廢止了封建的財產。

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廢止一般的財產，只是廢止資本家的財產。現代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這件東西，就是根據階級對抗，根據少數掠奪多數人的生產和分配制度底最後極完備的表現。

所以共產黨的理論，一言以蔽之，就是：廢止私有財產。

我們共產黨被人非難的，是希望廢止個人的財產權。他們以為財產是各人自己勞動底結果，應該看作一切個人的自由，活動，獨立底根據。

勤苦所得的，獨力所得的，自己所得的財產！你們所說的是小職工財產，小農夫財產，資本家時代以前財產底制度嗎？那就不消廢止了；自從大工業發達以來，已將他們破壞了，並且日日還正在破壞中。

那麼，你們所說的是現代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嗎？

你們仔細想，現在的工銀勞動，能夠替勞動者本身造點財產嗎？那是絲毫沒有的，只替資本家造了些資本；這資本即是掠奪工銀勞動的一種財產。也就是要得着新的工銀勞動經營，新的掠奪，纔得增加的一種財產。所以現在式的財產，他的基礎都是根據在資本和工銀勞動底對抗上面。試將這對抗底兩面檢查一下，資本家不單是個人人格，並且占有生產事業上社會的地位。資本却就是生產品底囤積。要善運用他，全靠多數人的共同勞作，最好是靠全社會的人共同勞作。

所以資本不是個人的勢力，是社會的勢力。

所以資本就是變為公有的財產，變為全社會底財產，個人底財產也不至於因此就變成社會底財產。不過是把財產變成社會的性質，失了階級的性質罷了。

我們更將工銀勞動檢查一下，工錢勞動底平均價格是最低的工銀。換句話說，就是衣

食住底費用，就是僅僅維持勞動者身分的生活費。所以工銀勞動者勞力所得的，只夠維持和繁殖他們貧苦的生命。我們並不是要廢止把這個勞動底生產物分配於各個人。我們並不是要廢止維持和繁殖這人類生命的分配。我們並不是廢止沒有餘力命令他人勞動的分配。但這分配上悲慘的性質，我們是要掃蕩淨盡的。使勞動者單爲了增加資本而生活，單爲了權力階級底利益而生活，這種悲慘的性質，是要掃蕩淨盡的。

在資本家社會裏活着的勞動者，不過是增加「屯積的勞動」（資本）的一個工具。在共產社會裏，那「屯積的勞動」却只是使勞動者底生活擴充，豐富，向上的一個工具。所以資本家社會，是過去支配現在；共產社會，是現在支配過去。在資本家社會，資本却是獨立而有個性，活人反來成了附屬品沒有個性。

那些資本家一聽見要消滅事物底這種現狀，就說這是消滅個性和自由！不錯，這的確是以消滅資本家底個性，資本家底獨立，資本家底自由爲目的。

現代資本家的生產制度裏所謂自由，不過是貿易自由，買賣自由。如果買賣消滅，買賣自由也是要消滅的。資本家所說關於買賣自由和一般自由底大議論，如果把他同中世買賣底束縛，商人底束縛對比，或是很有意義；拿他來反對共產黨所主張的買賣廢止，資本家的生產制度廢止，資本階級本身廢止，這就毫無意義了。

你們恐怕我們要廢止私有財產，你們現在的社會裏，十個人當中就有九人喪失了私有財產；少數人有了私有財產，十分之九的人自然一無所有了。這種財產制度，是要大多數人絲毫沒有財產，做他存在底必要條件，你們還要非難我們主張廢止他。

簡單說罷，你們非難我們，是怕我們主張廢止你們的財產。果真如此，這真是我們所希望的。

一旦到了勞動不能變為資本，貨幣，地租等獨占的社會勢力時候，就是個人的財產不能移作資本家的財產，不能移作資本的時候，你們大概要說個性消滅了。如此，你們應該承

認你們所謂「個性」就是資本家這種人，就是中等階級底財產家，這種人自然非掃蕩不可，非消滅不可。

共產主義要剝奪的，不是社會底生產分配權，只是用這種分配方法來壓迫別人勞動的權力。

反對廢止私有財產的人又會說，廢止了私有財產，一切事業就要停頓，普天下人都要變成懶惰。

照這樣說來，現在資本家社會，早應該爲了懶惰而零落了，因爲現在社會裏，勞動的人却絲毫得不着甚麼，得着一切的反而是「不勞動的人」。所以這個駁論，不過是這樣一句話：「一旦沒有甚麼資本，就不會有甚麼工銀勞動了。」

非難共產主義物質上生產及分配方法的人，又用同樣筆調，來攻擊共產主義智識上生產及分配方法。在資本家看來，正如階級的財產消滅，就是生產本身消滅，階級的教育消

滅，也就是一切教育消滅。

像他們這樣恐怕喪失的教育，在大多數人不過是一種機械動作的練習罷了。

你們把那關於自由、教育、法律，等等資本家的解釋作標準，來攻擊我們主張廢止資本家的財產，是沒有用的。你們想一下罷，你們的思想本身，不過是你們資本家的生產狀況和資本家的財產狀況底產物。正如你們的法理，也不過將你們階級的意志定為普天下底法律。這種意志底本質和傾向，也就是跟着你們階級所以存在的經濟條件決定的。

你們想把你們的生產方法和財產制度所造成的社會組織——就是隨着生產進步而興亡的歷史關係——作為自然和真理永遠不變的法則，這全是你們利己的謬想。前代的權力階級，也都有過這種謬想。你所明明見過古代財產制度的事物，你所承認封建財產制的事物，都被你們資本家的財產制度廢除了。

廢止家族制度！就是最急進的人，也以爲是共產黨不名譽主張，非常憤激。

但是請看現在的家族制，資本家的家族制，到底有甚麼根據？不過是資本，不過是私利。這種家族制完全發達的形式，只有在有產階級裏面才見得着。成全這種事情的要件，一是無產者家族實行消滅，二是公娼。

這些要件如果消滅，資本家的家族制，當然也要消滅；並且兩樣都要同資本一齊消滅。我們還要禁止父母掠奪兒女。你們以我們爲罪犯嗎？好，我們甘心作罪犯！

我們如果廢去家庭教育，建設社會教育，你們總以爲破壞了最神聖的關係。

你們的教育，不也是社會的教育嗎？那教育底方針，不是根據社會的狀況而定的嗎？社會不是已經借了學校和其他方法施展他直接或間接的干涉嗎？社會干涉教育，並不是共產黨發明的；他們不過要改變干涉底性質，使教育脫離權力階級底勢力。

因爲近世產業發達底結果，把一切無產者的家族關係撕得寸斷；他那兒女變成了簡單的商品，變成了勞動底器具；那些資本家却口口聲聲講甚麼家族，甚麼教育，甚麼親子間

神聖的關係，來沽名的譽，我們越發覺得可惡。

於是乎，有產階級底全體就會齊聲喊道：你們共產黨不是要創設婦女共有制了。

有產階級原來把他的妻只當作一個生產器具。他們總聽說過生產器具是可以公用的，所以即使斷定婦女和別的生产器具同樣，免不了公有的運命，也不是十分無理的事。

但是共產黨真正目的，是想把婦女當作一個生產器具底狀況掃除淨盡，這一點他們却不會想到。

我們資本家先生，誣陷共產黨公然創設婦女共有制，而且大發義憤，這是狠可笑的事。婦女共有制無需共產黨創設，已經從最古的時代就有的了。

我們資本家先生，對於普通娼妓不消說了，就是姦了他勢力底下無產階級底妻女還

不滿足，還要互相拐誘別人底妻，去滿足他們最大的快樂。

不錯，現在有產階級的結婚，實在是婦人共有制度。那麼，共產黨即使照他們所說的一

樣，主張婦女共有，也不過是將隱在偽善裏面的婦女共有制，變成公然合法的婦女共有制罷了。總之，現在的生產制度廢止了，從這種制度產出的婦女共有像公娼私娼等就消滅了。

共產黨更被人非難的，就是希望廢棄國家和國粹。

勞動者並沒有國家。我們不能將他們原來沒有的東西，從新去掉。勞動階級第一步事業，就是必須握得政權，就是必須起來做國民底主要階級，就是必須以自己組織一個國民。由這點看來，勞動者是國民的；但和資本家所謂國民，意義却是不同。

國民的差別和人民間的對抗，自從有了有產階級發達，通商自由，世界的市場，生產方法和生活狀況統一等，就一天一天的消滅下去了。

勞動階級如果握得政權，那些東西都要消滅得更快。因為各國（至少文明先進國）底聯合政策，是勞動階級解放底一種首要條件。

個人掠奪個人的事沒有了，那國民掠奪國民的事也就沒有了。一國裏階級對抗沒有

了，這一個國民和那一個國民底冤仇也會沒有了。

至於宗教、哲學，及一般理想家，非難共產主義的話，是不值得嚴密討論。

人底理想、意見、觀念，簡單說，就是人底自覺這件東西，跟着物質的生活狀態，社會的關係和社會的生活變化而改變，豈不是什麼人都曉得的嗎？

古來思想底歷史所可證明的，不都是智識的生產隨着物質的生產變化嗎？支配各時代的思想，總就是那時代權力階級底思想。

有些人在那里講改造社會的思想，他們所說的，不過是在舊社會中怎樣創出新思想，舊式生活狀況崩壞怎樣釀成舊思想崩壞等事實罷了。

古代的世界時滅亡時，古代的宗教就被基督教征服了。十八世紀基督教思想受合理的思想壓迫時，封建社會正和當時革命的有產階級決戰，所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不過是知識階級自由競爭的勢力罷了。

或者有人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及法律的思想，在歷史發展的道路上固然有種種變化；但宗教、道德、哲學、政治、法律，仍然遺留在這變化中間。」

或者又有人說「並且，自由、正義這些東西，是恆久的真理，不隨社會狀態變遷的。然而共產主義卻是排斥那恆久的真理，不是把宗教、道德、建設在新的基礎上，是排斥一切宗教、一切道德。所以共產主義和過去歷史上的一切經驗不能相容。」

這種詰難，不是他自己表白自己不合理嗎？一切社會過去的歷史，是在階級對抗底發展中成立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爭鬥形式，形式雖然不同，但各時代都有一件共通的事實。這事實就是社會的這一部份掠奪那一部份。所以過去各時代社會的自覺，他那表現雖有種種的形式，卻不外一個共通的形式（即概念），這是不足為怪。那形式（即概念）在階級對抗沒有完全消滅的期內，不能全然消失，也是不足為怪。

共產黨的革命，是祖宗傳下來的財產關係上最急激的破裂。所以他的發展，也當然讓

成祖宗傳下來的思想上最急激的變化。

但是我們現在不願意和反對共產主義的有產者辯論了。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勞動階級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們跑上權力階級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義底戰勝。

既達到第一步，勞動家就用他的政權漸次奪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底手裏，就是集中在組織權力階級的勞動者手裏；這樣做去，那全生產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了。起初的時候，少不得要用強迫的攻擊手段對付私有財產權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纔得達到目的。這種手段，從經濟方面看去，似乎不充足而且薄弱，但運動繼續下去，必能強盛起來，對於舊社會組織再加以一大打擊，結果就成了生產方法革命不可避的手段。

這種手段，應該看各國情形定奪。

最進步的各國大概可以用左列各項設施：

- (一) 廢止土地私有權將所有的地租用在公共的事業上。
- (二) 徵收嚴重累進率的所得稅。
- (三) 廢止一切繼承權。
- (四) 沒收移民及叛徒底財產。
- (五) 用國家資本，設立完全獨占的國民銀行，將信用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
- (六) 交通及運輸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
- (七) 擴張國有工場及國有生產機關，開闢荒地，改良一般土地使適於共通計劃。
- (八) 各人對於勞動有平等的義務。設立產業（尤其是農業）軍。
- (九) 連絡農業和製造工業，平均分配全國底人口，漸次去掉都會和地方的差別。
- (十) 設立公立學校，對於一切兒童施以免費的教育。廢止現行兒童底工場勞動。

絡教育和產業的生產等等。

這樣漸次發展下去，階級的差別自然消滅，一切的生產自然集在全國民大聯合底手中，公的權力就失了政治的性質。原來政權這樣東西，不過是這一個階級壓迫那一個階級，一種有組織的權力。勞動者和資本階級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

總之，我們要廢去階級對抗和階級所組成的舊式資本家社會，換上各個人都能夠自由發達，全體纔能夠自由發達的協同社會。

第三章 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著作

一 復古的社會主義 (Reactionary Socialism)

(甲) 封建的社會主義 (Feudal Socialism)

英法底貴族，爲了他們歷史的地位關係，曾做出幾多小冊子反對近代有產社會。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國革命和英國改革運動的時候，這些貴族再爲那可厭的暴發戶所屈服；從此就不能有嚴重的政治上競爭，只能在文字上爭鬥了。就是文字上的爭鬥，也不能有復古時代（就是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三〇年間法國復古時代）那樣高的聲浪了。

那些貴族，因爲想得世間底同情，面子上裝出忘記了自家利害的樣子，替被掠奪的勞動階級向資本家聲罪致討。他們對於那些新主人翁唱了些譏諷的歌，發了些將來必然破裂的豫言，其實都是替他們自己復讎。

封建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起來的：一半是悲哀，一半是譏諷；一半是過去底反響，一半是將來底威嚇。雖然有時用痛快銳利的批評，刺擊資本家底心窩，但全然缺乏了解近世史前進的能力，結果總不免滑稽。

那班貴族想人民再歸附他們，就用救濟無產者這名義做軍旗。但人民和他們常常接近，便看出他們裏面還穿着封建的武裝，都呵呵大笑地散去了。

法國底王黨 (French Legitimists) 和「青年英國」 (Young England) 都是好的例。

封建黨指出他們掠奪底方法和資本家不同，他們忘記了他們掠奪時候底情勢和現在全然不同，已經成了廢物。他們又以爲他們治世的時候，沒有近代這樣無產貧民，他們忘記了近世資本階級是他們自己社會組織必然的產生物。

此外他們批評資本家，並不隱藏復古的性質；他們對於資本階級主要的責備，就是資本階級統治之下，正在遺出一階級，這階級定要連根帶葉掃蕩社會上舊的秩序。

他們責備資本階級，并不一定是因爲他造出無產階級，不過因爲他造出革命的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政治上的行動，常常贊成對於勞動階級的壓迫政策；他們日常的生活，也

和他們平日說的大話相反，他們專想拾產業樹上落下的黃金果，他們專想假借真理、愛、和名譽，去換那毛、糖、和馬鈴薯的酒精。

宗教的社會主義 (Clerical Socialism) 如同僧侶和地主攜手一樣，常常和封建的社會主義結伴。

基督教底禁慾主義，原來最容易加上社會主義的彩色。基督教不是反對私有財產，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不是提倡拿慈善和貧困，獨身主義和肉底滅絕，出家生活和「母教會」來代替嗎？基督教社會主義，只是僧侶清理貴族心火的聖水。

(2) 小資本家社會主義 (Petty Bourgeois Socialism)

被資本階級剝滅了的，並不只封建的貴族階級；生存狀況在近代資本社會底空氣中朽腐滅亡的，並不只封建的貴族階級。在近世資本階級發生以前，還有中世的市民 (Burgese) 和小地主，這兩階級在工商業不很發達的各國，現在還是同新起來的資本階級並立。

在近世文明十分發達的各國，又有一種小資本家的新階級，輾轉於勞動者和資本階級之間，常常新陳代謝下去成了資本階級底附屬分子。但是這個階級底個人，常常因為競爭的緣故，陷落到無產者裏面去了；而且，近世產業越發達，他們越失去近代社會上獨立的地位，漸漸成了製造業，農業，商業的管理人，經理，事務員。

像法蘭西那樣農民占全人口過半數的國裏，偏袒勞動者反對資本階級的文人，自然拿農民和小資本家作標準去批評資本階級的統治，自然從他們中間階級的立腳點極力來擁護勞動階級。小資本家社會主義於是就出現了。西斯蒙地（*Sismondi*）便是英法兩國裏這派的首領。

這派社會主義，把近世生產狀況中許多矛盾的地方分晰得非常精密。他們把經濟學者所造偽善的辯解駁斥得非常明顯。他們把機器和分工所產出的惡結果，像資本和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生產過度和恐慌等事，論證得非常有力。他們把小資本家和農民底必

然零落，無產者底悲慘，生產界底無政府狀態，財富底分配不平等，國家間相角逐的產業戰爭，舊道德舊家庭關係舊國粹底崩頹，都明白指示出來了。

但是這一派的社會主義，他積極的目的是想把生產交換底舊方法和舊的財產關係，舊的社會狀況恢復轉去，不然，就是想把近世的生產及交換方法，裝到舊的財產關係底壳子（實在已經被新方法破裂了，或是將要破裂的壳子）裏去。這兩樣都是復古的，空想的。他們的結論是：製造業該有同行組合（Guild），農業該有家長的關係。

但是，歷史上強固的事實，早已把他們自欺的醉夢打消，這派社會主義，也就到了悲慘的末日。

(丙) 『真』社會主義 (German or 'true' Socialism)

法國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底著作，原來發生在有權力的資本階級壓迫底下，反抗這種權力的表現，不久就輸入德國去了。輸入德國的時候，恰是資本階級和封建的專制主義

開始爭鬥。

德國底學者先生，非常熱心得到這種著作，但是他們却忘記了法國底社會狀態不會同這些著作一同移來。所以這些法國底著作，對於德國底社會狀況，全然失了眼前實行的意義，成了純粹文學的景況。在十八世紀的德國學者看來，以為法國第一次革命底要求，不過是一般『普通的道理』底要求。革命的法國資本階級底意志表示，在他們看來，也不過是純粹意志底表現，就是意志自然的發動，就是一般人情底顯露。所以德國學者底著作，都是專門拿法國新的思想和本國古代哲學思想相調和，或者更可以說是結合法國底思想却不拋棄自家哲學的見地。

這種結合底方法，和翻譯外國語差不多。

中世紀那些僧侶，根據古代異教底典籍，作了加特力(Catholic)各聖僧底傳記，這是人人都曉得的。德國底學者，對於法國底著作，也是用這種方法。他們在法國底著作上面，附

了些自己無意識的哲學論。譬如，在法國評論貨幣底經濟的作用上面，他們加上些「人情離散」的議論；在法國評論資本階級國家上面，他們加上些「將校部屬底廢止」的議論；等類。在法蘭西歷史的評論上面，他們加上些「行為底哲學」「真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底德國科學」與「社會主義底哲學的基礎」等稱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於是，法國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底著作，就全然失了精義了。並且階級爭鬪底意義從此在德國人手中抹去，他們還自己以為免了法國人的偏見；他們自以為不單是代表真實底要求，還是代表真理底要求；他們自以為不是代表無產階級利害的，是代表人類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類利害的；這種人既不屬於何種階級，算不得實際的存在，只有哲學空想的雲霧中是他存在的地方。

德國底社會主義，雖然弄過這樣莊嚴的兒戲，說過賣藥的大話來遮掩他資本缺乏，不久便漸次失了那賣弄學問的稗氣。

德國（尤其是普魯士）底資本階級對於封建貴族和專制王政的戰爭，換句話說，就是由自主義運動，漸漸逼緊來了。

於是乎，所謂「真社會主義」，就得了多年希望的機會，這希望就是拿社會主義的要求，去對抗政治運動；對於自由主義，對於代議政體的政府，對於資本階級的競爭，對於資本階級的言論自由，對於資本階級的立法，對於資本階級的自由平等，一切都得了咀咒的機會了；也得了機會對民衆說替資本階級運動毫無所得，只有所失。德國底社會主義，在這危急的時候，忘記了法國評論家所豫想的近世資本社會存在以及跟隨的經濟狀況和政治組織；這些正是德國人現在才爭求的，法國人早已得到了。

所以專制政府和附屬的僧官、教授、地方貴族、官吏，都以爲這種社會主義，是對待資本階級來攻時最有用處的草把人。剛剛在德國政府對於勞動階級底蜂起投過些鞭撻和彈丸的苦九藥之後，這個社會主義，算是改胃口的甜東西。

這「真」社會主義一面這樣做了替政府戰鬥資本階級的武器，同時又直接代表德國中等階級復古的利益。在德國這小資本階級，是十六世紀的遺物，時時轉變他的形式，作社會現狀底真基礎。保存這個階級就是保存德國底現狀。但是資本階級在產業上和政治上的權力，一面集中資本，一面又有革命的無產階級起來，都是足以破壞這個階級的。這「真」社會主義便要一箭射殺雙鵝了。於是就像瘟疫似的蔓延起來。

德國社會主義是將他們可憐的「永久真理」底全身，裹在用華麗辭令文飾的，用濃情露水浸染的，空想的網衣裏面，如此他們的貨物自然是銷售很廣了。

後來德國社會主義，漸漸認識了自己的職分，那代表中等小資本階級底聲浪漸漸高起來了。

他們以德國國民為模範國民，以德國小資本家為模範人。對於這種模範人卑鄙齷齪的行爲，都加上了和他真相完全相反神秘偉大的社會主義的解釋。他們又極力反對共產

主義底「殘酷的破壞」性，把自己放在至高無上公正不偏的地位，輕視一切的階級爭鬥。現在（一八四七年）德國流行的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底出版物，除了極少數以外，大約都是這種又淺陋又薄弱的著作。

二、保守的社會主義（資本家社會主義）

(Conservative or Bourgeois Socialism)

一部分資本階級的人，想把社會的罪惡改正一些，好叫資本家社會維持下去。

經濟家，博愛家，人道家，勞動階級狀況改良家，慈善事業家，保護動物會員，禁酒會員，以及其他一切無聊的改良家，都屬於這一派。這樣的社會主義，更進一步就成了一派學說。

蒲魯東 (Proudhon) 底「貧困底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ere) 就是這樣社會主義底一個例。

社會主義的資本家，他們想取得近世社會狀況產出的一切利益，却不受那狀況必然

產出的爭鬥和危險。他們希望從社會現狀中拔去革命的離析的分子。他們想造出沒有勞動階級的資本家階級。資本階級當然以爲世界上地位最高的就最善的。資本家社會主義，用這種方便思想漸漸發展，就多少成了一些學說。他們要求勞動階級信奉這種學說，好進到那社會的新聖地，其實不過要求勞動階級甘心受現社會底束縛，拋棄一切憎惡資本階級的念頭罷了。

比這種社會主義格外實際而且更無系統的第二種資本家社會主義，他們要叫勞動者眼中輕視一切革命運動，所以說由經濟關係產出的物質現狀若不變化，政治的改革是無濟於事。但是這派所謂物質現狀底變化，並不是廢除資本階級生產關係的意義；廢除這種關係，一定免不了要革命，所以他們只想在這種關係繼續存在的基礎上，施行行政的改革。這樣的改革對於資本和勞動底關係，毫不過問，至多不過把有產階級政府底行政事務改簡單些，費用減少些罷了。

資本家社會主義，只能在語言底形式上有相當的意義。

爲勞動階級利益計，講自由貿易。爲勞動階級利益計，講保護稅。爲勞動階級利益計，講監獄改良。這是資本家社會主義最後的語言，亦是唯一真實的語言。總括說起來，就是這麼一句話：

資本階級，是爲了勞動階級底利益纔做資本階級。

三、批評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Critical-Utopia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我們現在並不是想批評一切近世大革命時援助勞動階級底著作：魯巴布夫 (Rube) 及其餘人底書。

勞動階級爲達他目的的第一直接計畫，發生在封建社會將要顛覆，到處正在擾亂的時候，這些計畫遭了必然的失敗，一是因爲勞動階級還沒有十分發達；一是因爲使他們解

放的經濟狀況，還沒有出現，那種經濟狀況，是在迫切的資本階級時代纔發生的，所以這種勞動階級最初運動的革命著作，自然帶着復古的性質；內容起些普通的禁慾主義和粗疏的社會均衡論。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就是聖西門 (St. Simon)；福利耶 (Fourier)；阿溫 (Owen) 等人底學說，像前面會說過，這都是在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爭鬪還沒有發達的時代發生的。(參照第一章)

創立這些學說的人，在當時的社會組織中，的確看見了階級對抗的狀況和離析分子的活動。但是那時的勞動階級還是十分幼稚，映到眼他們裏的，不過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基礎，沒有獨立政治運動的階級罷了。

後來階級對抗，雖然和產業同時發達，按經濟的形勢，在他們看來，物質上的狀況還沒有到可以解放勞動階級的地步。於是他們想找出新的社會科學，新的社會法律，好造出這

種狀況。

這些發明家以為歷史行動是要照他們自己所發明的行動；歷史造成的解放條件，是要照他們空想的條件；勞動者漸次自發的階級組織，是要照他們特別創造的社會組織。將來的歷史是自然解決的，在他們看來，是要照他們的社會計畫底宣傳和實行來解決。他們的計畫，為主的是勞動階級底利益，因為他是最苦的階級。勞動階級能夠在他們的眼中存在的，只由於是最苦的階級這一點。

這種社會主義家，因為階級爭鬥幼稚的狀態及他們自己環境的緣故，把自己放在一切階級對抗的上面，很高很高的位置。他們想改善社會上個個人底境遇，就是最有幸福的他們也想像以改善。所以他們的說話，總是對於社會全體，不分階級——而且往往是對統治階級說的。他們以為如果懂了他們的學說，如何不採用那最善狀況的最善計畫呢？

因此他們排斥一切政治的，尤其是革命的行動。他們想用和平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

想用小小的實驗（其實是一定失敗的實驗）而且由這個例證底力量，爲新社會的福音開闢道路。

這種將來社會空想的圖案，恰和勞動階級極幼稚時，單用空想描出自己的地位相同，也就和勞動階級第一本能所渴望的社會全體改造相同。

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出版物，也不是沒有批評的分子在內。他們攻擊那時社會上一切的主義。他們對於開發勞動階級的教育，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材料。他們提出實際的方案，例如廢止都會和鄉村底區別，廢止家族制度，廢止私人經營產業，廢止工銀制度，主張社會調和，主張變更國家底職務單是監督生產事業等，這些提案，都是消滅階級對抗的。但是在那個時候，階級對抗才開始發生，所以這些著作，不能有明白的確定的認識，所以這些提案，不能不說是純粹空想的性質。

所以這種批評的空想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和歷史的發展相背馳的。近世階級爭

圖一發達到一定的狀態，那離開了爭鬥空想的立脚地及對於爭鬥所發空想的攻擊，就完全失了實際的價值和理論的根據。所以創立這些學說的人，在許多地方雖然是革命的，他們的門徒却只是復古一派。他們死守師說，反對無產階級進步的歷史發展。所以他們總是堅持要和緩階級爭鬥，調和階級對抗。他們還在夢想那社會空想底試驗實現。有的設立孤獨的「社會主義殖民地」(Phalansteries 是福利耶計畫的)，有的設立「家庭殖民地」(Home Colonies) 有的想設立「小伊加利亞」(Icaria 是加伯理想鄉底名稱) 加增許多新的聖地，實現這些空中樓閣。他們不得不哀求資本階級的同情和金錢。所以他們漸漸地沈滅到前面所說復古的保守社會主義裏面去了；所不同的，只稍有組織的學理和相信社會科學上神奇效果的迷信，狂熱罷了。

所以他們極力反對勞動階級一切政治的行動，以為這種行動都是從不知道信仰那新福音來的。

所以英國底阿溫派反對改進黨 (Chartist) 法國底福利耶派反對社會改良家 (Reformist)

第四章 共產黨和在野各黨底關係

共產黨和英國改進黨、美國農地改良黨 (Agrarian Reformers) 等勞動階級各黨的關係，已在前章說過了。共產黨爲直接的目的戰，爲勞動階級眼前的利益戰。在這現在的運動中，也不忘記代表及留意將來的運動。

在法國共產黨是和社會民主黨聯合，和保守黨及急進的資本階級對抗。但對於社會民主黨那些從大革命得來的謬見謬想，仍然要用批評的態度對付他。

在瑞士共產黨是幫助急進黨的，但也注意到這黨是由法國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和急進的資本家兩種反對的分子結合起來的。

在波蘭共產黨是幫助那用土地革命來做國民解放主要條件的黨派。一八四六年這

黨在克拉葛 (CHAGOW) 會發動叛亂。

在德國對於資本階級有革命的行動時，共產黨是和他聯合起來同專制的王政，封建的地主及小資本階級戰爭。但一刻也不會忘記使勞動階級明白感覺有產者和無產者敵意的對抗。必使勞動者準備利用資本階級掌權時必然造成的社會及政治狀況，來做對抗資本階級的武器。也就是準備德國保守階級一旦滅亡，就立刻和資本階級本身開戰。

德國是共產黨所最注意的。因為這國裏有產階級革命底機運正在成熟了；因為這國底革命，是在歐洲文明更進步的狀態之下實行的，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法國無產階級更加發達的多；而且因為德國有產階級的革命，即時會引起無產階級的革命。

總之，共產黨無論在什麼地方，對於各種反抗社會及政治現狀的革命運動，一概援助。這些運動，總是拿財產問題作主要問題，什麼時代進步的程度夠不夠，一概不問。最後，就是到處盡力為萬國民治黨謀統一及團結。

共產黨最鄙薄隱秘自己的主義和政見。所以我們公然宣道：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現社會的狀況，叫那班權力階級在共產的革命面前發抖呵！無產階級所失的，不過是他們的鎖鍊，得到的是全世界。

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

(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共產黨宣言

五十五

一千九百二十年

八月

出版

定價大洋一角

原著者

馬格爾斯
安格爾斯

翻譯者
陳望道

印刷者及
社會主義研究社

世界各国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封面精选



K. MARKS e F. ENGELS

MANIFES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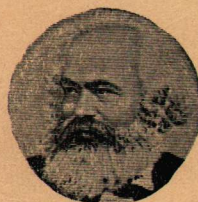
I

PARTISE KOMUNISTE

DREJTORIJA E BOTIMEVE TË KLASIKËVE
TË MARKSIZËM-LENINIZMIT
PRANË K.Q. TË P.P.SH.
Tiranë, 1954

የኮሚዩኒስት ፓርቲ

ማኒፌስቶ



በካርል ማርክስ



ፍሪደሪክ ኤንግልስ

ሎንዶን 2847 ዓ. ም.

(ኦ ኤ ኦ)

مكتبة الاشتراكية العلمية

ماركس انجلس

بيان
الحزب
الشيوعي

كارل ماركس
وفريدريك انجلس

البيان الشيوعي

ترجمة
خالدة بكباش

طبعة جديدة

دار النشر الجديد
١٩٥٥



Karl Marks
Fridrih Engels

BIBLIOTEKA MARKSIZEM-LENINIZMI

MANIFESTI
I PARTISE
KOMUNISTE



К. МАРКС
ВА
Ф. ЭНГЕЛЬС

КОММУНИСТ
ПАРТИЯЛА
МАНИФЕСТ

ماركس انجلس

بيان الحزب الشيوعي



T

En Hammerbog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Карл Маркс
Фридрих Енгелс



Манифест
на комунисти
ческата
партия

KARL MARX / FR. ENGELS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UDGIVET I ANLEDNING AF 100 AARS JUBILÆET

FREMAD

КАРА
МАРКС
ФРИДРИХ
ЕНГЕЛ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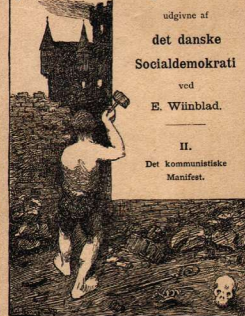
МАНИФЕСТ
НА КОМУНИ
СТИЧЕСКАТА
ПАРТИ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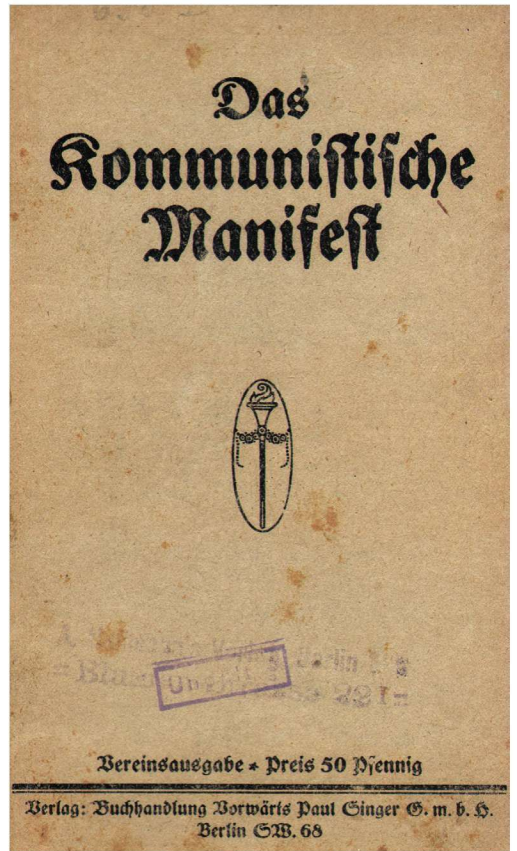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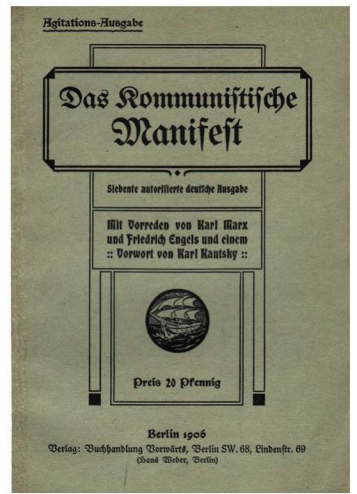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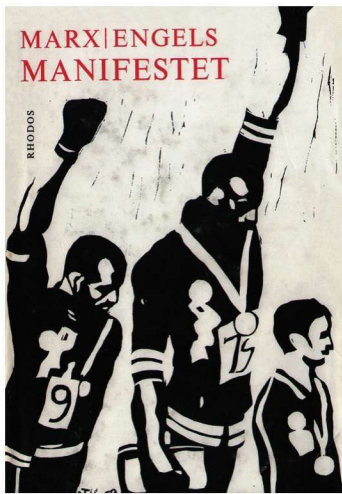
Партизга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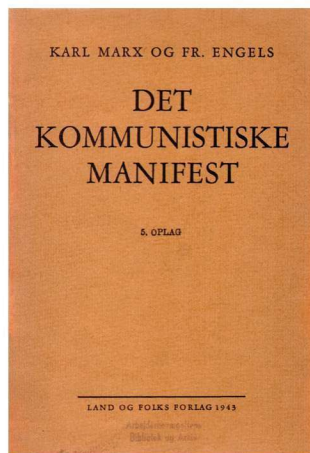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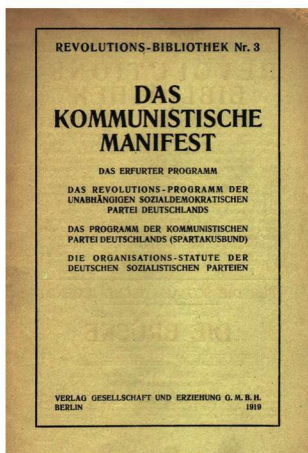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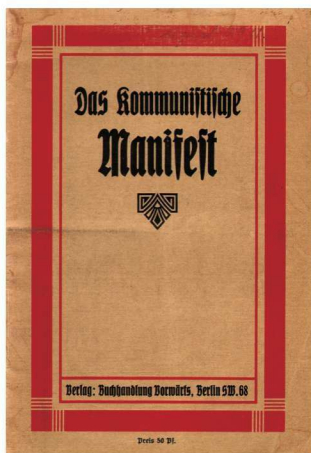
Danske Skrif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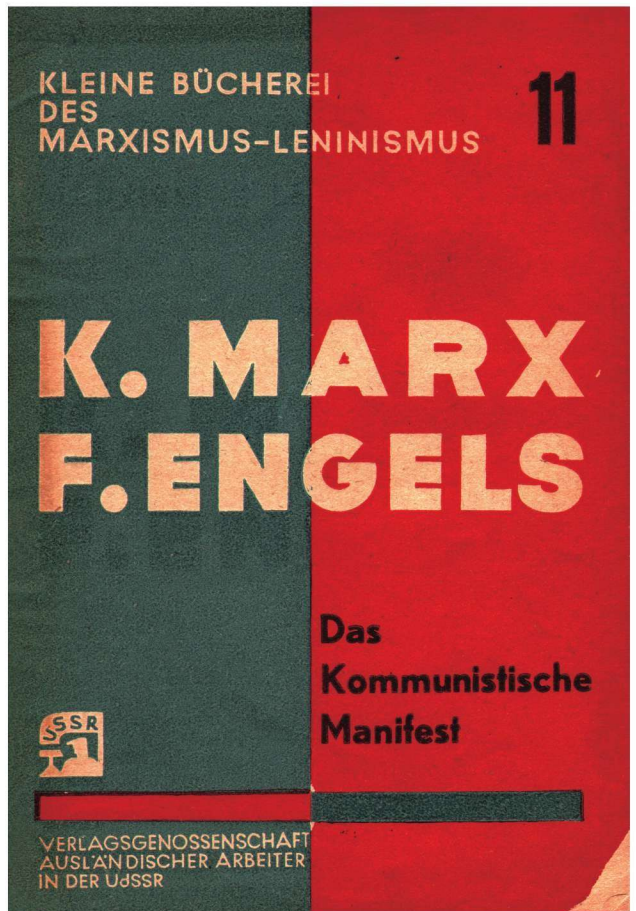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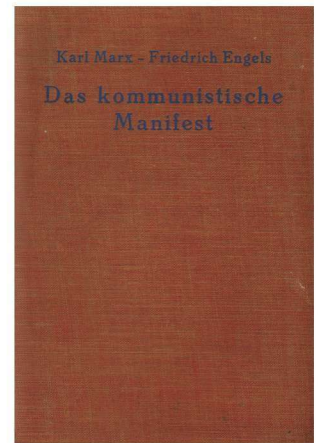
udgivne af
det danske
Socialdemokrati
ved
E. Winbl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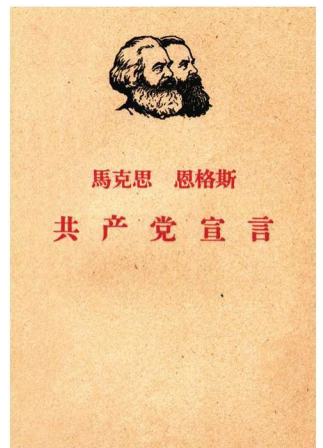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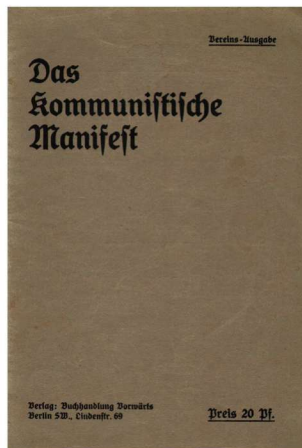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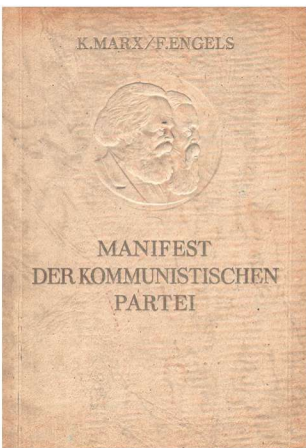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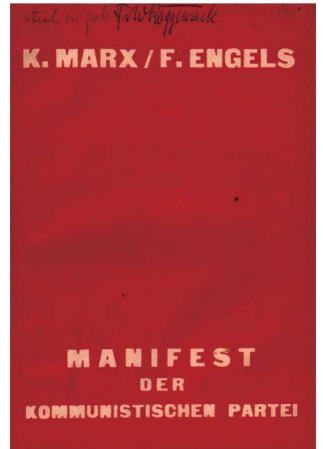
II.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出版后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伦敦用德文出版。《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理。170年来，《共产党宣言》的光辉思想一直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并深刻影响着全世界一切追求社会进步事业的人们。

一百多年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新时代，其基本思想特别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思想、

共产党人要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等，仍然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因此，《共产党宣言》仍然是我们每个共产党人必读的书籍。

170年来，《共产党宣言》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被公认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社会政治类著作。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在我国出版，此后，陆续有十多个中文版本问世。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纪念版。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我们推出了《共产党宣言》中德俄英多语种纪念版。纪念版发行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为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需要，我们此次又推出《共产党宣言》中德俄英多语种珍藏版。

《共产党宣言》中德俄英多语种珍藏版以2009年出版的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译本为基础，其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正文以及作者在不同时期撰写的七篇序言，此外收入了该书最早的德文本影印版、具有代表性的俄文本影印版、英文本影印版、首个中文本影印版，还收录了我国著名国画大师蒋兆和创作的马克思画像和恩格斯画像，以及不同国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封面图辑等。此次珍藏版对该书的封面和内文版式做了重新设计，进一步突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的重大纪念意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年5月